

中共党史170题问答



●王照琨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ZHONGGONG DANGSHI 170 TI WENDA



中共党史170题问答

王 照 琨 主 编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目 录

导 言

1. 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
2. 学习中共党史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3)

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3. 为什么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认清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 (6)
4. 旧中国是怎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有哪些特点? (8)
5.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它的失败说明了什么? (12)
6. 为什么中国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 (13)
7.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它对中国革命有什么影响? (16)
8. 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怎样认识五四运动的伟

- 大历史意义? (18)
9.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了哪几次论战?
..... (20)
10. 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哪些共产主义小组? 他们
进行了哪些活动? (23)
11.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经过是怎样的? 中国
共产党成立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26)
12.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偶然的? (27)
13.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
动相结合的产物? (30)
14.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革命纲领的依据和历
史意义是什么? (33)
15. 党成立后怎样领导工人运动并出现了第一次全国工人
运动高潮? 其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是什么? (36)
16.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的情形是怎样的?
..... (38)
17.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怎样实现的? (39)
18.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反对
了哪两种错误观点? (42)
19. 为什么新三民主义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 (43)
20.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什么
作用? (45)

21.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功绩是什么? (47)
22. 为什么说五卅运动严重考验了中国各革命阶级?
..... (49)
23.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
权的斗争表现在哪里? (51)
24. 什么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它为什么是错误的?
..... (54)
25.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怎样论述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56)
26. 为什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 (58)
27. 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60)
28. 北伐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怎样
认识它的伟大意义? (62)
29.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主要内容是
什么? (64)
30. 北伐战争开始后, 蒋介石阴谋叛变革命的活动主要表
现在哪里? (67)
31. 在大革命的后期,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要表
现在哪里? (69)
32. 为什么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在紧急关头担
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71)
3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什么?
..... (72)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34. 怎样认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正确认识这一形势有什么重要意义？…………… (74)
35. 南昌起义的简要经过是怎样的？它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77)
36. 为什么说“八七”会议使党前进了一步？…………… (79)
37. 毛泽东是怎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它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80)
38. 广州起义的简要经过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82)
39.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建立了哪些农村革命根据地？…………… (83)
40. 为什么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86)
41.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怎样变成了取消主义者？…………… (88)
42. 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伟大意义是什么？…………… (89)
43. 古田会议决议为什么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它规定的建军原则是什么？…………… (92)
44. 古田会议决议为什么强调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 (94)
45. 为什么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 (96)
46.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是什么？..... (98)
47. 红军是怎样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的？红军连续取胜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100)
48. 毛泽东关于红军的战略战术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 (102)
49.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主要错误和产生这次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104)
50.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105)
51. 王明一伙是怎样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107)
52.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哪些严重危害？..... (110)
53.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为什么连续三次产生了“左”倾错误？..... (112)
54.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14)
55. 红军长征的简要经过是怎样的？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116)
56. 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表现在哪里？党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118)
57. 红军长征后，南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是怎样坚持游击战争的？..... (121)

58.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原因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122)
59.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据是什么? 为什么关门主义是错误的? (124)
60. “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何重要意义? (127)

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61.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的形势怎样? 正确认识这一形势对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有什么意义? (130)
6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形成的? 它对于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 (132)
6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有些什么特点? (135)
64.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哪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 (136)
65. 抗日战争初期,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表现及其危害是什么? (138)
66. 抗战初期, 党内出现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141)
67. 为什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如何实现这一原则? (143)
68. 抗日战争初期, 我党是怎样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的? 建立了哪些抗日根据地? (144)

69. 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
..... (148)
70. 为什么说抗日战争时期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 (150)
71. 《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发表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
是什么？ (152)
72.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
济、文化纲领是什么？ (154)
73. 为什么说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
部分？ (155)
74. 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其发展趋势必然是社
会主义？ (157)
75. 什么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三大法宝”？它们之间的关
系是怎样的？ (160)
76.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162)
77. 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是什么？
..... (164)
78. 一九四二年党为什么开展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
伟大意义是什么？ (166)
79. 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为什么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
内容？ (169)
80. 在整风运动中为什么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方针？ (171)
81.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是怎样粉碎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

- 共高潮的？ (172)
82. 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抗日根据地军民是怎样开展反
“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的？ (176)
83.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政治路线及其基本点
是什么？ (178)
84. 为什么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
..... (180)
85. 什么是党的三大作风？为什么说它是共产党人区别于
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181)
86.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伟大意义是什么？ (184)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87. 为什么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之间
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 (187)
88.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为什么要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 (189)
89. 为什么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必须采取“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的策略方针？ (191)
90.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焦点是什么？这两次
会谈有什么意义？ (193)
91. 解放战争初期，我党为什么把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
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5)
92. 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党怎样提出了打败蒋介石的战略

- 思想？它的伟大意义是什么？……………（196）
93. 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党提出的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
和军事原则是什么？……………（198）
94. 我军怎样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取得
这一胜利的重大意义是什么？……………（200）
95.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样进行战略反攻的？它的伟大历
史意义是什么？……………（204）
96. 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是怎样出现的？它对解放战
争有什么重大意义？……………（206）
97.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提出的土地改革总路线是什么？
土地改革对于解放战争有什么重大意义？……………（209）
98. 官僚资本是怎样形成的？党为什么采取没收官僚资本
的政策？……………（211）
99. 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什么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214）
100. 什么是政策？在解放战争转入反攻后，毛泽东是怎样
论述正确执行政策的重要意义的？……………（216）
101. 我党是怎样指挥人民解放军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战略
决战的？取得这一胜利的伟大意义是什么？……………（219）
102. 为什么说蒋介石的一九四九年元旦“求和声明”是一
种“和平”阴谋？……………（222）
103.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
市的重大意义是什么？……………（224）
104.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怎样规定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

- 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226)
105.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是怎样论述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及其基本任务的? (228)
106. 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基本经验是什么?
..... (230)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107.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国内的形势是怎样的? 党面临的任务是什么? (233)
108.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人民是怎样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武装力量的? (235)
109. 建国初期, 我党怎样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了严重经济困难的? (236)
110. 建国后我党怎样没收了官僚资本和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 完成这一任务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 (239)
111.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国初期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的方针是什么? (241)
112. 建国后, 我党怎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 (242)
113. 为什么要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它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245)
114. 什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 怎样理解它的基本精神?

- (248)
115.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及其重大意义是什么？
..... (250)
116. 为什么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党怎样开辟
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 (251)
117.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及其巨
大历史意义是什么？ (254)
118. 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及其历史意义是
什么？ (256)
119. 为什么说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
..... (258)
120. 从我党同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斗争中应吸
取什么经验教训？ (260)
121. 为什么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是正确
的？ (262)
122.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什么国内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
之间的矛盾？ (264)
123.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66)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九六六年四月)

124. 如何评价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工作？这
期间我们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270)
125.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
中怎样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272)
126. 如何评价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从这次斗争中应吸

- 取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 (276)
127. 应当怎样全面地评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278)
128.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庐山会议前党中央是怎样领导全党纠正这些错误的? (280)
129. 应当如何评价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 (284)
130. 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的内容是什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哪些经济成就? (286)
131. 怎样估计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288)
132. 为什么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有了新的发展? (289)
133. 应当怎样评价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91)
134.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产生失误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什么? (293)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九七六年十月)

135. 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296)
136. 为什么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298)
137. 为什么把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作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301)
138. 怎样评价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303)
139. 我党是怎样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的? (305)
140. 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 提出了哪些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正确主张和措施? (308)

141. 怎样评价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311)
142. 什么是“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这一运动中搞了哪些阴谋活动? (313)
143. 我党怎样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组阁”阴谋?
..... (315)
144. 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是怎样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的?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 (317)
- △ 145. 怎样认识天安门事件的伟大意义? (320)
146. 为什么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从危难中挽救了党, 挽救了革命? (322)
- △ 147.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324)
148. “文化大革命”中,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党员和群众是怎样进行抵制和斗争的? (325)
- ✓ 149. 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 (328)
- △ 150. 为什么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331)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始

(一九七六年十月——)

151. 怎样认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两年工作? 为什么在党的工作中又出现了“左”的错误? (333)
152. 怎样评价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335)
- △ 153. 为什么说“两个凡是”的方针是错误的? (336)
154.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338)
- ✓ 155. 为什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 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340)
15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

- 哪些重大成就? (342)
157. 为什么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
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345)
- ✓ 158. 怎样正确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346)
159.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它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348)
160. 毛泽东思想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 (350)
161.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什么? (353)
162. 为什么不能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
中? (356)
163.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 (358)
164. 为什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359)
165. 既然剥削阶级在我国已经消灭, 为什么还要坚持人民
民主专政? (361)
166.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 它的主要特点
是什么? (363)
167. 我党提出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 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
政策及其重要意义是什么? (365)
168. 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总任务是什么? 怎样
完整地理解它的基本内容? (367)
169. 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为什么说建设高度的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战略方针问题? (370)
170. 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 为什么说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
民主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
一? (372)

导 言

1. 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中共党史，是党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胜利的历史。中共党史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研究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中共党史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曾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但是所有这些斗争，都没有给中国人民找出求得解放的出路。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英勇奋战二十八年，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党又领导全国人民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由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还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当前，全国人民正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在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避艰险，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巨大贡献。中共党史，就是研究党怎样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愈益结合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为世界各国的革命，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才能探索出中国革命的规律，制定出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以指导中国革命。在党的幼年时期，我们党曾几次犯过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对外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甚至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在同上述错误倾向作斗争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仍然是指导我们夺取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因

而，它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内正确战胜错误，光明面战胜阴暗面的历史。我们党内所以出现错误和阴暗面，是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异常艰巨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我们党所处的社会条件又十分复杂。在革命激烈斗争年代里，涌入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或少数野心家，这就很难避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错误。党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它能够保证不犯各种错误，不出现一些消极现象，而在于它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正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不断地在克服各种错误和各种阴暗面的斗争中，吸取经验，获得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从而使党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因此，中共党史也是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

2. 学习中共党史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都十分强调学习历史。毛泽东曾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二卷，521页）认真研究和学习党的历史，对于我们党、每一个干部和青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学习中共党史，可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别，企图通过学习西方，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

国，都没有也不可能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找到出路。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观察中国革命的工具，才给中国人民指明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而转入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党在半个多世纪中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和全国人民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换来的。它是一笔十分宝贵的遗产。认真学习中共党史，可以使我們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增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可以用历史经验武装我们的头脑，避免重犯错误，更好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第二，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深刻地认识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采取许多方法。而通过学习中共党史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它可以使我们结合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怎样从中国社会具体情况出发，总结革命经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我国，从而探索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的。它能够使我们更加具体地理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更加深刻地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从而提高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这

就能够使我们有一个科学的思想武器，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轨道前进。

第三，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数革命先烈、广大人民表现了不避艰险，不怕牺牲，严守纪律，顽强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这些传统和作风，是制定和实现党的革命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虽屡遭挫折而日益强大的根本原因。认真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学习中共党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传统和作风是怎样形成的，它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可以更好地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先烈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我们把这些传统作风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传之万代，就可以更好地肩负起继往开来的伟大历史任务。

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3. 为什么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认清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

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诞生的，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首先必须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这是因为：

首先，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大权。他们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对中国进行的统治，是使近代中国民族不能独立，政治不能进步，劳动人民遭受苦难，社会生产力不能发展的根源。这种社会状况决定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

其次，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

们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因而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它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因而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是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是，由于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并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它在一定时期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民主革命，而在另一时期，又有跟在买办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另一部分是买办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为帝国主义豢养并为他们服务的阶级，它同封建势力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受各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买办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的。当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时，当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时，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买办集团，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当前的反帝战线。由此可见，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甚至在一定时期建立包括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在内的反帝统一战线，这都是由中国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

再次，只有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反对一般的资产阶级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中国无产阶级担负起了革命的领导责任，它将

来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完成民主革命之后进而转入社会主义，因而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此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民主自由权利，这种社会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必须是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由于广大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武装斗争，只能首先冲破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以及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革命的道路等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出正确的革命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4. 旧中国是怎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有哪些特点？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长期是一个封建社会。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后，接着又发生了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对中国的战争，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等等。外国侵略者利用清朝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结局，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勒索了大量

赔款，割占了大片土地，取得了许多特权，最后把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这样，中国虽然在名义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实际上却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又对中国封建经济起了瓦解的作用，刺激了中国社会中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这样，中国就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半封建社会了。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具有如下特点：

（一）在经济上，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并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残酷地剥削和压榨中国劳动人民，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不仅利用战争赔款，劫夺了中国大量白银，而且还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低价购买农产品，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工业品市场，使中国的农业服务于他们的需要，造成农民和手工业的大批破产。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又根据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权利，修铁路，办航运，设立银行，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便利的原料，开办矿山、工厂、企业。他们还向中国反动政府进行大批贷款，把中国的海关和国库收入作为抵押。这样，帝国主义国家垄断了中国的工业、交通运输、金融和财政，使中国的经济成为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

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在中国培植了一个为他们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它们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帮助帝国主义倾销商品，开办企业，掠夺资源，疯狂地剥削中国劳动人民。

帝国主义的入侵，虽然破坏了封建时代的自然经济，刺

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他们害怕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会与他们争夺市场和利润，因而勾结封建势力对中国民族工业极力进行压迫和打击，致使中国资本主义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力量。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是旧中国反动统治的基础。在农村，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和中农，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土地。地主的残酷剥削，使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严重地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使工业得不到充足的原料和粮食，阻碍着中国工业的发展。

（二）在政治上，帝国主义操纵着中国的内政和军事，他们同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对中国劳动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

帝国主义国家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通商口岸，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强行设置租界和驻扎军队，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在各国划分势力范围之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派遣大批军队，驻扎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帝国主义征服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但又利用他们作为统治中国的支柱，二者互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在清政府被推翻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又操纵和支持各派军阀，为保持和扩大其势力范围连年混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中国人民享受不到起码的民主自由，这是世界所少见的。

（三）在思想文化上，帝国主义通过各种办法进行文化侵略。他们先是派遣传教士，企图通过宗教宣传使中国人民

接受他们的侵略。继而又通过办学校、出版书刊、吸引留学生等，宣扬“侵略有理”、“侵略有功”，传播腐朽的西方生活方式，培植为他们服务的买办知识分子，以便麻痹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帝国主义还竭力保护和宣扬封建主义的反动政治思想和腐朽的伦理道德，作为他们统治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

（四）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地统治中国人民，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它的对立面。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入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近代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两个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很软弱，具有妥协性和动摇性。而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具有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它比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同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这就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准备了雄厚的社会革命力量。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表明，帝国主义是封建势力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靠山，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的反动统治，是中国近代社会民族不能独立，经济停滞落后，政治不能进步，人民遭受苦难的根源。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反帝反封建，就成为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

5.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失败说明了什么？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互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不仅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侵略，还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由于这些斗争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称作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些斗争都程度不同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心屈服于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辛亥革命。

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开始，革命势力扩展到十八个省，坚持了十四年之久，在南京建立了与清朝政府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它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统治的秩序，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起了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但是，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革命是一次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单纯的农民战争。由于农民受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使它的领导者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提出正确的纲领和政策，不能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旧制度。再加上由于农民的自私性、狭隘性造成的领导集团的互相倾轧，严重地削弱了革命力量，因而在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的联合进攻下最后失败。

一九一一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使民主共和国思想深入人心，这是它最主要的历史功勋。但是，这次革命仍然很快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十分软弱的、具有极大妥协性的阶级。它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更没有发动农民，触动封建剥削制度。他们对于帝国主义一直抱有幻想，甚至企图以承认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和各种赔款，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用狭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来看待清朝反动统治，没有把汉族的封建官僚、地主看作革命的敌人，甚至把他们看作同盟者。最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力下，政权落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表北洋军阀手中，中国人民的灾难日益深重。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表明，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论是农民战争或者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找到出路。中国革命迫切需要新兴的无产阶级来领导。这样，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就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6. 为什么中国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近代社会中最先进、最革命

的阶级。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它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富有彻底的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优点之外，还有许多特殊的优点：（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遭受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少见的残酷剥削，因而它的革命性最坚决。中国社会没有欧洲那样的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因而除了少数工贼之外，整个无产阶级都是最革命的；（二）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却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和一些大企业中。这就使它便于团结战斗，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给予反动派以沉重打击；（三）中国无产阶级很大一部分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同广大农民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十分了解农民的痛苦和要求，这就为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不仅决定了它的力量远远超出了它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而且使它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第二，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只有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中国革命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它宣告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已经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已经开始。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国家

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丧失了革命性，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则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成为反动的阶级；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已经失去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这个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下，才能夺取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充分显示了它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从它诞生，就谱写了反对剥削和压迫的光辉纪录。一八五八年，在广州人民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斗争的高潮中，香港爆发了两万市政工人和运输工人的罢工。许多工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直接参加了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中法战争期间，一八八四年九月，香港工人为了反对英国当局允许法国利用香港修理战舰，补充物资而举行罢工。罢工坚持了三十五天，终于迫使英国反动当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不干涉工人”、“不装法货”的正义要求。一九一一年，许多地区的工人都举行起义，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工人罢工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一六年十七次，一九一七年二十一次，一九一八年就增至三十次。虽然这些斗争都是自发性的，但它已经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对于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工人阶级的战斗威力，震动了整个社会。它表明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开始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完全有能力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阶级。

7.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它对中国革命有什么影响？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历十月），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对于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以前，历史上发生的革命，都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劳动人民始终未能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十月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第一次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极大地鼓舞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勇气和胜利信心，而且也为各国无产阶级建立了一个革命基地。从此，无产阶级向资本主义旧世界展开进攻，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时代开始了。

（二）十月革命开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在这以前，民族解放运动通常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其结果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加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而，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十月革命则改变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国家，对内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支持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这就不仅促进了被压迫民族的觉醒，而且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成一体，冲击着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从此，民族解放运动便成为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三)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它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无比正确，宣告了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彻底破产。这就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给了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以科学的思想武器，在它的指导下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第一，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俄国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布了《和平法令》，宣布废除沙皇政府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后，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放弃沙皇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非法特权，宣布“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从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并主张援助中华民族的独立运动。这一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全国各界舆论的欢呼。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62页）

第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革命由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发展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经过苏俄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结成了一条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线，使中国革命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联系起来。这样，中国民主革命就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

部分。

第三，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正在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俄国革命道路的正确，开始由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找革命出路，转而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欢呼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表达了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和信念。从此，他们热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新结论，使中国人民走向崭新的胜利的道路。

8. 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怎样认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在中国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条件下，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它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它的直接起因，是由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一九年一月，美、英、法等国在巴黎召开了分赃的所谓“和平会议”。中国也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正义要求，反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

各项特权。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游行，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北京及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进行响应。北洋军阀政府大肆逮捕学生，疯狂进行镇压。但是，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怒。六月三日以后，首先是上海的商界和工人举行罢市罢工，声援北京学生斗争。仅六月五日一天，上海罢工工人就有五、六万人。他们提出“格政府之心，救亡国之祸”，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运动迅速扩及全国二十多个省，一百多个城市，成为包括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撤了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获得胜利。

五四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所以能够获得胜利，根本原因是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显示了它的伟大战斗力量，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在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和骨干作用。它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完全有力量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这样，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第二，五四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

动前，我国曾出现了以提倡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等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但它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逐渐发展成以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分别通过《新青年》、《少年中国》、《湘江评论》、《觉悟》、《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发表大量文章，热情歌颂伟大的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时全国出现了几百种进步刊物和许多进步团体。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宣传和探讨了社会主义革命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启发了中国人民，给了中国人民以锐利的思想武器，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所显示的伟大力量，对于这一运动胜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使开始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认识到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五四运动后，他们走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后来成为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9.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了哪几次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

了帝国主义、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恐惧。他们恶毒攻击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是“洪水猛兽”、“异端邪说”。这时，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开始分化，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开站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方面，煽动种种反动思潮。早期共产主义者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曾经同这些反动思潮进行了论战。其中主要有三次：

（一）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论战

五四运动爆发后，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来中国讲学。资产阶级对他大肆吹捧，他的忠实门徒胡适更是极力兜售实用主义，妄图以此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九一九年七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恶毒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提倡“一点一滴的改良”，“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八月，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坚决驳斥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谬论。李大钊指出，研究和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中国问题，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有解决希望。李大钊的文章给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迎头痛击。

（二）反对梁启超、张东荪贩卖假社会主义的论战

继胡适之后，梁启超、张东荪等又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一九二〇年冬和一九二一年春，他们发表了许多文章，断言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创造真正的工人政党，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硬说当务之急

是通过“劳资协作”、“阶级调和”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有了充分发展，然后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分别发表文章，批驳了上述谬论。他们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要想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唯一的出路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只要他们组织政党，进行阶级斗争，中国就能实现社会主义。

（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早期共产主义者还同以区声白、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斗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它鼓吹绝对自由，否认组织纪律，主张极端个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反对一切国家，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当时，由于许多人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不少知识分子、甚至许多工人都把无政府主义误认为马克思主义。为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从一九二〇年开始，《新青年》、《共产党》、《先驱》等杂志，都陆续发表了不少文章。一九二一年八月，《新青年》还发表了陈独秀同区声白论战的六封来往信。陈独秀在这些信中指出，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将来阶级趋于消灭，国家才失去其效用。无政府主义者空谈自由，这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经过这次论战，使许多知识分子和工人，逐步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转到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

经过上述几次论战，粉碎了各种反动思潮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进一步坚定了早期共产主义者把马克

思主义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信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10. 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哪些共产主义小组？他们进行了哪些活动？

五四运动后，早期共产主义者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一九二〇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不久，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或共产党支部、共产党小组。

我国最早出现的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〇年三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又名伍廷康）来华。他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他介绍又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就中国革命和建党问题交换了意见。八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俞秀松等建立了上海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上海小组实际上起着发起组的作用。它与各地早期共产主义者保持密切联系，并派人前去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继上海小组建立之后，一九二〇年秋，由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小组，成员有邓中夏、罗章龙、张太雷、张国焘、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等。北京小组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核心。

从一九二〇年秋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在各地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和参加的成员还有：山东：王烬美、邓恩铭等；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广东：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夏曦、郭亮等。在日本：施存统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后，又到日本与周佛海建立了日本小组。在欧洲，一九二〇年秋，北

京小组的成员张申府赴巴黎，先后发展了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等，于一九二一年春组织了一个小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几经曲折，于一九二二年夏建立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其中包括旅法支部、旅比支部、旅德支部，成员迅速扩大。

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上海小组成立后，把《新青年》改为它的机关刊物，宣传十月革命的经验，刊登了一些列宁的著作和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又出版了半秘密性的《共产党》月刊，着重介绍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从理论上指导各地的建党活动。从一九二〇年四月起，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外国著作陆续出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还通过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文化书社等形式，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加强了对工人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一批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陆续出版。在上海有《劳动界》，在北京有《劳动音》，在广州有《劳动者》等。许多小组还在工人集中的地方举办工人补习学校。一九二一年一月，北京小组由邓中夏主持成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上海小组由李启汉主持成立了“上海劳动补习学校”，武汉小组在一些工厂举办了识字班。通过这些形式，早期共产主义者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培养骨干分子。在此基础上，一些工会组织陆续产生，开始组织工人斗争。在上海，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在北京，成立了长辛店工会，一九二一年五

月，组织工人纪念国际劳动节，并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湖南，毛泽东等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开办夜校，组织工会。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等，在毛泽东的耐心教育下，终于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影响，并为工人运动献出了生命。此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还团结和组织进步青年。一九二〇年八月，上海小组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北京、长沙、广州等地也在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建立了团的组织，罗亦农、任弼时、刘少奇、李启汉等是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曾经进行了学习和讨论。早在一九二〇年初，李大钊就曾经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急需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社会主义团体。”上海小组的《共产党》月刊，着重宣传了列宁的建党学说，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号召中国无产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掀起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初，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的会员，对于建党问题进行了有组织的讨论。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中国在二年内必须成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和作战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必须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手段，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这个党要有严格的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毛泽东在复信中对蔡和森的这些意见“表示深切的赞同”，并强调指出：“唯物史

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一九二一年初，他把这些通讯先后编印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发动会员展开讨论，进一步统一思想。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表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起来，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1.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经过是怎样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党的组织来领导中国革命。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鉴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马林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筹备工作，由上海小组的李达主持；他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来上海开会（当时，法国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同国内取得联系，未能通知）。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作为陈独秀指派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他们代表全国五十几名党员。马林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开始是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〇六号举行，因法国巡捕破坏，大会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纲领把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指明党的奋斗目标是：以

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党纲还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从此，中国人民有了完全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它是以列宁的建党原则为指导，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它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有了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可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胜利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且使中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有了保障。因此，党的成立，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2.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偶然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工人阶级不断成长壮大，中国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工人阶级是在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外国资本在沿海城市开办现代企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一些官僚开办的军事工业，以及八十年代我国民族工业的出现而逐步产生的。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西方列强大批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原料，修铁路，开矿山，办企业，同时也刺激了我国民族资本的发展，由此使我国工人阶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日、美帝国也乘机扩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样，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更加壮大起来。到一九一九年，中国产业工人已有二百多万。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壮大，工人阶级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日益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一六年全国工人罢工十七次，一九一七年二十一次，一九一八年就增到三十次。但是，这些斗争还都是自发的、分散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工人中出现的一些组织（如哥老会、帮口等），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不能真正反映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只有在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才能求得解放。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立自己的政党便成为更加迫切的了。由此可见，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需要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且还必须有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十月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但是都一一失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只有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才能获得解放；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求得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十月革命使苦闷、彷徨中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开始用马列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宇宙观，出现了象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同胡适的改良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进行斗争中，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还在五四运动中，认识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并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和组织工人，使工人逐步觉悟到迫切需要领导自己进行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样，不管中外反动派怎样进行污蔑、迫害，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便成为不可阻挡的客观必然了。

第三，共产国际的帮助，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内部政治经济条件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一九二〇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已经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的建立，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一九二〇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华，同李大钊、陈

独秀联系，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推动下，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基础上，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终于光荣地诞生了。

13.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运动初步发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传播的基础上诞生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一）只有工人运动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能产生中国共产党的。

中国初期的工人运动表明，中国无产阶级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以战斗的姿态开始了反对侵略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但是，这些都还是自发的经济斗争，即使有些政治斗争，也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的。中国工人为了斗争的需要，也曾经组织了诸如帮会等工人团体。但它们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取得彻底解放。这种情况不仅说明了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说明只有工人运动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能产生共产党的。

这是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

（《列宁选集》第一卷，203页）“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选集》第一卷，242页）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科学地分析客观形势，制定出

各个历史时期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引导工人阶级不断取得胜利，最终取得解放。而自发的工人运动是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了工人运动经验和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工人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而结成工会同个别资本家进行斗争的思想。这种斗争只能暂时地改善工人的生活，而不能根本摆脱剥削和压迫。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才能使工人摆脱工联主义意识的束缚，认识到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开展反对剥削制度和反动阶级统治的政治斗争。从而使自发的工人运动提高为自觉的革命运动，并把工人运动中最先进、最觉悟的分子组成为自己战斗的司令部。由此可见，工人运动一旦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摆脱有产阶级剥削的自觉斗争，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也就产生了。”（《列宁全集》第四卷，225页）

（二）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也是不能产生中国共产党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劳动群众争取解放，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特点，就是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实践性。这一革命理论本身就是适应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创立的。马列主义是工人阶级取得解放的精神武器，工人阶级是实现马列主义的物质力量。当马克思列宁

主义仅仅停留在书本上，或仅仅被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时，还不能发挥这个革命理论的伟大作用。它只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才能产生伟大的物质力量，才能产生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的、决心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并为其解放而奋斗的先进分子，才能产生由这些先进分子组成的、率领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共产党。

事实正是如此。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世界上就已经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长壮大，工人运动还未发展起来，因而，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得到传播，也就不可能产生中国共产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和工人运动有了相当的发展，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但是，当它还未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时，这时也只是产生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和组织，还未产生共产党。只是到了五四运动之后，当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时，中国共产党才产生了。

（三）只有经过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努力，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才能产生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通过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而实现的。这是因为在旧社会，工人阶级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无法获得起码的文化知识和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创立和学习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有产阶级知识分子才有条件从事的工作。当这些知识分子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决心转到无产阶

级方面来并决心为其彻底解放而奋斗时，他们才深入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组成率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先锋队。这时，这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就成为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先进的一部分，成为工人阶级政党的骨干和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正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左翼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行传播。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使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由此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们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斗争。正是这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骨干。不久，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终于在一九二一年七月诞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最先进的领导力量。

14.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革命纲领的依据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并很快形成了工人运动高潮。革命斗争的实践，要求共产党提出明确的、具体的革命纲领，以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斗争。为了

制定革命纲领，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十二人，代表一百九十五名党员。大会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是以列宁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基本理论为依据而制定的。一九二〇年六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其基本思想是：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民族问题已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必须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建立联盟；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同时也应该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必须无条件地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一九二二年一月，共产国际又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张国焘、王烬美、邓恩铭、瞿秋白等参加了大会。大会指出，中国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的代表，明确地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其他革命阶级，推动中国革命

前进。列宁的上述指示，具体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制定自己的纲领。

党的二大制定的革命纲领，也是根据对国际形势、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正确分析而制定的。大会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世界形势，指出当前世界已划分为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帝国主义已经日益走向崩溃，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宣言深刻地揭露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宰割以及它们同封建军阀的勾结，正确地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前的革命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民主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民主和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因此，无产阶级还须“实行‘与贫苦农民的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党的二大制定的革命纲领具有重要的意义。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革命中，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的限制，都没有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而且表明了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和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具有革命的彻底性，能够反映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从此，中国人民有了革命斗争的明确方向和战斗旗帜。

15. 党成立后怎样领导工人运动并出现了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其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是什么？

党成立后，首先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为此，党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成立了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总部先设在上海，一九二二年五月以后迁至北京，总部主任，先是张特立（张国焘），后是邓中夏，并在上海、汉口、长沙、广州、济南设立了分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代表一百七十三人，代表十二个城市的一百多个工会和三十余万会员。代表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员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经过我党的努力，大会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这次大会奠定了党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基础。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工人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罢工斗争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有三十多万工人进行了一百多次罢工。

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的中国海员工人六千多人为反抗英帝国主义和封建工头的压迫与剥削，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三月全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十余万人。罢工斗争终于迫使英帝国主义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这次罢工的胜利，鼓舞和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此后，长江船员、上海邮务工人、上海日华纱厂工人、汉阳钢铁工厂工人和京汉、粤汉、京奉等铁路工人也

相继罢工，这些罢工大都取得胜利。九月，在中共湘区党组织领导下，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多工人举行罢工，取得了胜利。十月，开滦煤矿和秦皇岛启新洋灰工人罢工，在党的领导下，五万罢工工人坚持斗争，也取得了部分胜利。一九二三年二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政治大罢工，是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二月一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无理禁止和破坏。四日，在总工会号召下全路工人总罢工。七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实行血腥屠杀，五十人被杀害，三百多人受伤。汉口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都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从此，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斗争实践表明，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它特别能战斗，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许多工人领袖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和革命烈士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提高了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二）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革命积极性的迅速提高。在历时十三个月的斗争中，各地陆续建立了一百多个工会，爆发了一百多次罢工，锻炼了工人阶级队伍，在工人中发展了党的组织，密切了我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

第一次罢工高潮，特别是“二七”罢工的失败也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它告诉我们，在毫无民主权利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赤手空拳，孤军奋战，是不能战胜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结合的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实践教育了党和工人阶级，必须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结成联盟，建立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并且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16.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的情形是怎样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党员开始注意到了农民运动。

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出现于浙江。一九二一年下半年，沈玄庐等在浙江肖山县衙前乡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不到一个月，农民协会发展到肖山、绍兴两县八十多个村，开展了减租斗争。同年年底，农民协会被当地军警镇压下去。

彭湃是我党早期从事农民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他是广东海丰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但由于他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留学日本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一九二二年，他在海丰县开始从事农民运动。他脱掉长衫，用农民的语言以及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向群众宣传，受到了农民的欢迎。海丰的农民在彭湃领导下，一九二二年六月，经过串连发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会——海丰赤山农会。这个农会开始只有六人，经过斗争，农会的威信迅速提高，到九月，加入农会的人增至五百多。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海丰县总农会正式成立，彭湃当选为会长，会员发展

到十万人。农民在农会领导下开展减租、抗捐和维护农民利益的各种斗争。在海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广东陆丰、惠阳、紫金、惠安、普宁等县农民也都组织起来，成立了县农会。到一九二三年七月，全省会员增加到十三万四千余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农民革命队伍。不久，即在海丰成立了广东省农会，彭湃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广东农民运动的兴起，使地主阶级和军阀十分恐惧。一九二四年八月，军阀陈炯明以武力解散了海丰农会，海丰农民运动转入秘密斗争。但它为后来海陆丰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称彭湃为“农民运动大王”。

在湖南，一九二三年四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派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共产党员谢怀德、刘东轩去衡山岳北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同年九月成立了“岳北农工会”，成为湖南农民运动的先声。农会成立后，发展很快，会员迅速增到四万人以上。在农会领导下，农民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外运的斗争，同时酝酿减租减息。这些斗争，虽遭到湖南军阀赵恒惕及衡山地方反动武装的镇压，但却播下了农民革命的种子，为后来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党领导的初期农民运动尽管规模还不大，但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它表明我国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7.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怎样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关于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的方

针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经过共产国际的帮助，吸取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而作出的。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争取同盟军的思想，是确定国共合作方针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85页）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所阐明的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广泛争取同盟军的思想，直接帮助了我党确立统一战线的方针。他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不仅指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第一步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也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时必须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同时也应该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必须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和指示是我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理论依据。

第二，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在吸取了工人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

无产阶级必须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结成联盟，建立包括一切革命阶级、阶层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并掌握革命武装，才能推翻反动统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根据“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号召全国的工人：“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共同敌人军阀”。

第三，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对以孙中山

为首的国民党进行了全面分析和具体帮助的基础上实现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原是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松懈的政治联盟。国民党及其前身，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长期进行反对清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在群众中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中的许多人投靠了帝国主义和军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仍然坚持革命，但他一直幻想依靠军阀武力和帝国主义的帮助实现革命的目的。一九二二年八月陈炯明叛变，把孙中山驱逐出广东，使他陷入绝望之中。正当他感到走投无路时，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他看到了希望，重新振作起来。他欢迎十月革命，积极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孙中山的这种坚持革命，坚持进步的立场，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苏联代表越飞等先后来华，同孙中山商讨了改组国民党、建立军队，以及苏联帮助中国革命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也对孙中山进行了具体帮助，一方面肯定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鼓励和支持他的正确言行，同时也批评他脱离群众，幻想依靠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错误。孙中山诚恳地接受这些建议和帮助，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在上海召开了研究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开始了改组的准备工作。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与了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和草拟宣言及党纲、党章的工作。之后，孙中山采取了实际步骤，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

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等问题的决定。至此，中国共产党正式确定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方针。

18.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反对了哪两种错误观点？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三十多人，代表党员四百二十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正式决定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

大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反对了两种错误观点。一是着重反对了张国焘的“左”倾观点。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不仅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还要反对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不相信能把国民党改造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张国焘尤其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他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若产业工人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就会混乱无产阶级的思想，削弱共产党的势力，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二是反对了马林、陈独秀的右倾观点。他们认为，现在的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少、在质量上也差，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二七”罢工失败后，工人运动一时难以恢复，要搞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大会经过讨论，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立场，以及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接受了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实行国

共合作的决议，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党的三大正式确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对于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加快中国革命的步伐，推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高潮的到来，都具有伟大的意义。大会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观点，可是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仍然估计不足，对国民党力量估计过高，对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些都是三大的不足之处。

19. 为什么新三民主义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学说。它对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严重缺点。后来，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其成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之所以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因为：

第一，新三民主义具有崭新的革命内容。

新三民主义不仅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结合起来，而且在内容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民族主义方面，旧三民主义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要是反对清朝的种族压迫，而且含有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观点；对外只提出谋求“国际平等地位”的模糊口号。

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则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对内反对民族压迫，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在民权主义方面，旧三民主义主要是推翻清朝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新三民主义不仅提出反对封建军阀专制，而且主张民主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少数人所得而私”。

在民生主义方面，旧三民主义主要是提出“平均地权”，主张用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的办法，消除地主从地租和地价增涨中获得暴利的可能性。新三民主义则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原则。后来，孙中山又提出了废除地主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和凡独占性大企业等归国家经营，私人资本不得操纵国计民生，做为这两个原则的实际内容。

第二，新三民主义和我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

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革命灵魂的新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这些原则和我党提出的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不仅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符合工农大众当前的基本利益。这样，新三民主义就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战斗旗帜。

但是必须指出，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仍有本质的区别。（一）在民主革命阶段的部分纲领的不同，如新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实现人民民主权力、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等；（二）新三民主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共产主义则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三）在宇宙观

和革命彻底性上也不同。因此，共产党人在坚持新三民主义革命内容，联合国民党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20.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第一，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国共合作的实现，为我党创造了公开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的有利条件。首先，我们党营救出“二七”罢工时被捕的工人领袖，逐步恢复了各地被封闭的工会组织。然后，我党开始有组织地领导各地工人进行斗争，使“二七”惨案后消沉下去的工人运动，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一九二四年七月，党领导广州沙面工人举行了反对英帝国主义颁布的所谓“新警律”的政治大罢工。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迫使英帝国主义取消了这个“新警律”，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工人运动自“二七”以来由低潮转入高潮的信号。我党还通过国民党中央工人部，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建立起工人武装组织——工团军。到一九二四年的下半年，上海、北京、武汉、唐山、沈阳等地工人罢工相继发生，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在李大钊领导下，于郑州召开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了更好地发动和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林伟民当选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

书长兼宣传部长。这次大会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大会闭幕以后就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

第二，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继一九二三年三月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后，一九二四年五月，在我党的推动和苏联的帮助下，于广州的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委派伪装革命的蒋介石任校长，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先后担任军校的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在周恩来的组织领导下，军校中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培养了大批的军事干部，为建立国民革命军打下了基础。为了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在我党推动下，一九二四年十月，广东革命政府依靠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和工农武装，镇压了广州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商团军的叛乱，初步稳定了广州革命政权。接着，又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十月先后进行了两次东征，消灭了反动军阀陈炯明的势力，同时还平定了刘震寰、杨希闵在广州发动的叛乱。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革命军又进行了南征，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巩固和统一。革命力量的壮大，也促进了军阀内部的分化，国民革命军很快发展为六个军，为出师北伐奠定了基础。

第三，统一战线的建立迎来了农民运动的高潮。

国共合作后，国民党中央设立了农民部，林伯渠任部长，彭湃任秘书长。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自一九二四年七月至一九二五年底，以国民党农民部的名义在广州举办了五

此外

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有我党领导人彭湃、阮啸仙、谭植棠等主办，共产党人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也参加了教学，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一大批农运干部。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省农民协会，组织了农民自卫军，会员达二十一万多人。一九二四年冬，毛泽东回到湖南韶山发动农民并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一九二五年六月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开展了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一九二五年以后，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此外，国共合作的实现，也为我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国共合作建立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各地都利用扩大国民党的形式发展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我党的党员、青年团员一并加入，在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并在国民党中建立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秘密组织。广大党员的模范行动，使我党的政治影响迅速增长，大批先进分子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到一九二五年一月党召开四大时，和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三大相比，党员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这就为我党领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提供了组织保证。

总之，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了革命的发展，成为革命高潮的起点。这充分证明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21.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功绩是什么？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二十人，代表党员九百九十四

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通过了宣言，作出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组织问题、宣传工作等决议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为了加强党的队伍和领导作用，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使之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党，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大会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的主要功绩是，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提出了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

（一）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指出，无产阶级参加民族民主革命，不是做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的独立地位与目的而参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富于妥协性。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二）关于农民同盟军问题。《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东方民族革命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农民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特别重要。决议强调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党必须动员和组织农民从事政治经济斗争，否则，“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特别是这次大会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对于进一步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2. 为什么说五卅运动严重考验了中国各革命阶级？

五卅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上海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十余人。五月三十日，上海市学生及其他群众两千余人，在租界声援工人斗争，遭到英帝国主义巡捕的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由此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浪潮，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五卅反帝运动。这个运动不仅证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死敌，而且也考验了中国各个革命阶级。

（一）五卅运动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急先锋。

在五卅运动的全部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当日深夜举行会议，确定以更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六月一日，上海成立了总工会，宣布实行总罢工。上海二十万工人坚决响应总工会的号召，站在“三罢”斗争的第一线。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迅速成立了工商学联合会，实现了“三罢”，并向帝国主义提出了包括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惩办凶犯等十七项交涉条件。为了支持

上海工人斗争，北京、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济南、福州、青岛、天津、唐山、开封、郑州、广州、奉天、大连、哈尔滨等地的工人和其他群众一千二百万人参加了斗争。运动还深入到许多县镇，广东、湖北、湖南的农民也参加了斗争。其中特别是为响应上海工人反帝斗争而兴起的省港大罢工，参加斗争的有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工人二十万。这次罢工使繁荣的香港变成了“死港”，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事实证明，工人阶级的斗争最坚决、最富有团结性、组织性和斗争的策略性以及革命的彻底性。

(二) 五卅运动证明，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在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的激烈斗争中，首先起来响应，并积极声援支持工人罢工斗争的是广大的学生和市民。顾正红惨案发生后，上海文治大学等校的学生，发动了接济死伤工人的募捐活动，参加了顾正红追悼会。他们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充分运用自己的斗争手段——宣传、演讲、罢课等，同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不怕敌人的逮捕和屠杀。当中国共产党发出“三罢”号召后，上海学生联合会积极响应。他们还和上海总工会一起，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罢市斗争，终于实现了“三罢”，形成了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生，也都以战斗的姿态开展罢课斗争。事实证明，小资产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 五卅运动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这个阶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帝斗争，但是它具有妥协性和动摇性，不是革命的主要力

量，更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五卅运动发生的前夕，上海租界工部局曾提出了“增加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提案。这不仅有损于中国的主权，而且也直接危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资产阶级极力加以反对。五卅惨案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总工会和学生联合会的影响下，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也参加了“三罢”斗争。可是，后来当群众斗争日益高涨，帝国主义调集大批军舰开到上海，出动大批海军陆战队准备镇压时，再加上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上海总商会，一面提出“司法调查”、“关税会议”等进行引诱，一面又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电力供给等进行威胁，民族资产阶级立即动摇以至向帝国主义妥协，于六月二十三日首先退出了“三罢”，开店营业，并压迫工人复工。九月十八日，帝国主义又指使其走狗奉系军阀封闭了上海总工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已得的胜利，上海总工会决定停止总罢工。事实证明，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革命，但它是无产阶级的不可靠的同盟者。

23.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表现在哪里？

国共合作形成后，全国革命运动不断高涨，这就引起了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极端恐惧和仇恨。他们进行反共分裂活动，竭力篡夺革命领导权，企图把革命纳入他们的轨道。这种阴谋活动特别是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变得更加猖狂起来。其主要表现是：

（一）戴季陶主义的出现。

戴季陶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一九二五年五月，他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所谓“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谬论。七月，他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他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阉割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歪曲为以“仁爱”为核心的“道统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阶级调和，反对工农的阶级斗争。在组织上，他提出了所谓团体的“排拒性”的谬论，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戴季陶主义适应资产阶级右派的需要，为他们进行反共，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提供了理论工具。为了反击戴季陶主义，肖楚女、瞿秋白、陈独秀、毛泽东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了戴季陶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破坏统一战线，充当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走狗的反动本质，保护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右派。

（二）廖仲恺被刺杀。

廖仲恺是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他坚定地支持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同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冯自由等进行了斗争。特别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他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定地实行三大政策，在国民党和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因而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勾结邹鲁、许崇智，悍然指使暴徒暗杀了廖仲恺。这是资产阶级右派打击国民党左派，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事件。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将胡汉民逐出广东，许崇智被缴械，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

（三）“西山会议派”的反动活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国民党老右派分子邹鲁、谢持、张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并作出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

《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共产党员》等反动决议，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党部，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这个右派集团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为了反击“西山会议派”的反动活动，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党同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坚持了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大会重申，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开除了邹鲁、谢持等人的国民党党籍，责令戴季陶反省。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等许多右派，甚至受了党纪处分的戴季陶等，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就为蒋介石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四）“中山舰事件”的发生。

一九二六年三月，暗藏的国民党右派蒋介石为了篡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阴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三月十八日，蒋介石通过他的爪牙命令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又指使他的亲信，诬蔑共产党要炮轰黄埔，推翻国民政府。二十日，蒋介石宣布广州全城戒严，调动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逮捕了李之龙和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四十多人。事件发生后，毛泽东、

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坚决回击。但陈独秀害怕反击会使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引起国共关系的破裂，拒绝了这一正确意见。这就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轻易地达到了篡夺第一军的目的。

（五）“整理党务案”被通过。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才能发出等。这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篡夺领导权的又一严重步骤，理应坚决反对。但陈独秀却认为接受这一提案可以避免我党“包办”国民党的嫌疑，“有利”于两党的团结。他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完全接受这一提案，并下令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的共产党员辞职。于是，国民党右派纷纷代替共产党人当了中央各部的部长。蒋介石乘机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北伐前夕，他又自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权和军权，这就为他以后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24. 什么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它为什么是错误的？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对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种右倾错误理论。陈独秀的这种错误理论，在他一九二三年四

月和十二月间所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已经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他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的前途只能是资本主义的，革命胜利后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资本主义有了充分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壮大之后才能进行。这就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隔了一道“万里长城”。这就是他的“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

第一，无视革命时代的变化，坚持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观点。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尚未成熟，资产阶级曾经担负了反封建斗争的领导责任，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时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腐朽和反动的阶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其中买办资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失去了领导民主革命的能力。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完全无视时代的变化，仍然坚持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公式，这只能使中国革命重走失败的老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第二，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否认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认为无产阶级不仅数量上少，而且质量上也很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只能参加革命，不能领导革命。他夸大农民的落后性，否认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农民散漫、保守、苟安、生活欲望简单，“难以加入革

命”。他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他们的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革命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错误观念”，“便失去了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正是基于上述错误分析，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革命的结果“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是资本主义的前途。

第三，实践证明，这一错误理论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损失。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他的右倾错误的理论基础。在这一错误理论指导下，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对资产阶级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政策。在“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中，他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屡次妥协退让，自愿放弃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在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坚持“二次革命论”，导致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大革命遭到失败。

25.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怎样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比较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的谬论，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第一，指明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対象，文章指出，因为它们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代表最落

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上，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第二，指明了无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文章说，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由于他们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失去了一切生产手段，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特别能战斗。他们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

第三，指出了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文章认为，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贫农。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极易接受革命宣传。他们是农村中数量极大的群众，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所谓农民问题，主要是指贫农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村的自耕农和城市手工业者，分为有余钱剩米的、生活大体自给的和生活下降的三个不同部分。他们平时对革命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到革命高潮时，第一部分也可以附合革命。

第四，文章根据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并深刻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4页）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实现他们一个阶级统治的

国家，但是这是完全行不通的。这是因为现在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两个阵营激烈斗争的时代。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他们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的思想，仅仅是一种幻想。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毛泽东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中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要建立“革命民众的统治”。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所阐明的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这些思想进一步明确地回答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同盟军和前途等基本问题，为后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奠定了基础。

26. 为什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67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政治特点，是由它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掌握

着政权，控制了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利用它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以及各种特权，兴办各种企业，大量倾销商品，阻碍和压迫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封建势力利用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打击民族资本。他们的残酷剥削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购买力极低，使民族资本的工业品难以销售。官僚买办资本还经常借用政权的力量控制以至吞并民族资本的企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民族资本的压迫和束缚，使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可以成为民主革命的一种动力。

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又具有妥协性，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薄弱。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一直得不到充分发展。它的资本少，企业规模小，缺乏雄厚的经济力量；它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因此无法和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相匹敌。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必然造成它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

第二，中国民族资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它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在技术、设备、资本、动力、原料、甚至产品销售等方面，都要依赖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民族资本的许多创办人，原来就是地主、官僚、买办，不少民族资本家同时又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同时，民族资本在创办和经营过程中，要经过政府批准和保护，希望在税收等方面提供方便，在他们与工人发生冲突时，需要反动政府加以镇压等。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在革命过程中，不愿意也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往往表现

为妥协和动摇。

第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在受到帝国主义的打击、封建势力的压迫时，愿意联合工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但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剥削阶级，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因此，当工农阶级觉悟起来，勇猛地参加革命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又感到他们的利益和发展前途受到威胁，因而怀疑革命，甚至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反对工农革命。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要求我们党对其反帝反封建的一面，采取联合的政策；而对其和敌人妥协、反对工农的一面，则必须进行斗争。

27. 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到一九二七年初，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盘踞中国大部土地的三大军阀势力（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有两个（吴、孙）被歼，北伐军占领了半个中国，把革命迅速由广东推向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北伐战争迅速获得胜利的原因是：

第一，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和组织下进行的一场革命战争。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为骨干，”在北伐必经的各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四月和五月，在我党的领导下，在广州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

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积极要求迅速进行北伐，同时号召全国工农和一切革命群众支持北伐。北伐前夕，我党和苏联军事顾问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作战计划和革命口号，同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加紧工作，推动和保证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第二，广大工人、农民积极支援，直接配合了北伐战争。在北伐军出发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就组织了三千多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在北伐军所经各地，广大工农群众担任侦察、引路、破坏敌人交通、运输、救护等工作。北伐军进入湖南后，许多县成立了“反吴战争委员会”，以各种方式开展了大规模的支援前线活动。在北伐军攻占武汉前，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断绝了敌人的军火来源。当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工人立即组织纠察队，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当北伐军进抵长江下游时，上海工人在我党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工农群众高昂的革命积极性，表现了正义战争的特点，极大地支援和配合了北伐战争。

第三，我党在北伐军中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和广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北伐军中，有李富春、林伯渠等大批共产党员担任政治工作。他们是这些部队的革命核心和骨干力量。由于我党的政治工作和广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极大地提高了北伐军的战斗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的叶挺独立团，是我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部队。它机智勇敢，英勇善战，特别是在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的战斗中，威震全国，为它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此外，苏联的大力援助，也是北伐战争迅速胜利的重要原因。当时各军中都有苏联军事顾问，他们帮助制定作战计划，进行政治工作。在物资上苏联也给了大量的援助。

28. 北伐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怎样认识它的伟大意义？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一九二六年十月，全国掀起了一场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农民运动之所以迅猛地发展起来，其原因是：

（一）封建势力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是农民运动迅速兴起的根本原因。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农村仍然是封建统治占主要地位。地主阶级依赖政权和土地，压迫和剥削农民。再加上军阀、贪官污吏进行敲诈勒索，使农民终年不得温饱。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需要一场农村的大变动。因此，当北伐战争胜利推进时，广大农民立即掀起了农村大革命。

（二）我党卓有成效的组织和领导，为农民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党成立后，在主要从事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领导农民进行斗争。在广东，彭湃最先在海陆丰一带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国共合作的建立，为我党进一步发动农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党利用国民党农民部积极开展农民运动，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会员达二十一万余人，并成立了农民自卫军。一九二四年冬，毛泽东回到湖南韶山，亲自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从一九二四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九月，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

东等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农讲所的学员接受了政治、军事和实际斗争的学习和训练。他们回到全国各地，立即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北伐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担任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农委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强调全国农民运动应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为重点。

（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

北伐军所到之处，由于消灭了军阀反动军队，农民运动立即高涨起来，农会会员几倍或十几倍地增加，斗争规模也越来越大。北伐前，湖南的农会会员约四十万，受其影响的农民有一百多万。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农会会员迅速增至一百三十六万多人，受其影响的农民达一千万。到一九二七年初，湖北的农会会员也由北伐前的七万二千人，猛增至二百五十多万，江西省由原来六千多人增至三十八万多人。广东、陕西、河南、四川、福建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有较大发展。到一九二七年初，全国农民协会会员近一千万人。农民一经组织起来，就立即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这场农村大革命风暴的到来，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意义。

第一，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场农村大革命的锋芒，直指封建反动统治。首先，广大农民推翻了地主政权和地主武装，建立了农民武装，使农会成为乡村中的政权机关。农会通过各种斗争形式，剥夺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政治权力，建立了农民的政治权力。其次，在经济上开展减租、减息、减押斗争，打击囤积居

奇、抬高物价等不法行为，改善了农民生活。不少地方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插标分田。此外，农民还向一切封建宗法制度，如神权、族权、夫权等展开进攻。这场农村大革命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动摇了帝国主义、军阀和贪官污吏的墙脚，有力地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第二，它显示了农民的伟大力量，证明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运动兴起后，广大农民创造了各种斗争形式，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斗争，使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完成了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广大农民所建立的伟大功勋，充分说明在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力量。中国民主革命只有发动农民才有可能获得胜利。

第三，全国农民运动的兴起，扩大了我党在农民中的影响，同广大农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湘、鄂、赣、粤四省农民运动的开展，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革命觉悟，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使我党取得了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这就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南方各省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准备了干部条件。

29.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毛泽东的这一著作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他是为了支持已经兴起的农民运动，驳斥反革命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反对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压制而写的。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毛泽东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不推翻封建势力，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因此，“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毛泽东认为，为了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就必须来一个农村大变动。过去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大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他热情歌颂迅猛异常的农民运动，冲决一切反动势力的罗网，在几个月内，做到孙中山四十年要做而未能做到的事，这是“好得很”，是农民创造的伟大功勋，充分表现了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第二，报告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提出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指出，农村中有富农、中农和贫农，它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富农对革命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但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们可以参加革命，应向他们多做解释工作；贫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迫切要求革命。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是农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因而贫农“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这样，报告在实际上提出了党在农村中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的基本思想。

第三，论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地主权力的革命，是消灭

封建剥削制度的革命。因此，农民革命首先必须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因为没有夺取政权的胜利，则一切经济斗争就不会胜利，就无法镇压反革命的活动。所以，“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在农村独裁一切，剥夺地主豪绅的发言权，是完全必要的。而为了镇压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活动，巩固农民的权力，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建立一支广大的农民梭标队。

第四，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毛泽东热情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并歌颂它“好得很”，称赞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驳斥了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等责难。报告尖锐指出，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面前，每个人都将受到检验。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报告认为，一切共产党员和一切革命同志一定要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造成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正确态度，也是党在大革命的紧要关头应当树立的根本战略思想。

毛泽东的这一著作，有力地驳斥了一切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如何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重要的同盟军的问题，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成为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30. 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阴谋叛变革命的活动主要表现在哪里？

一九二七年初，当北伐军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军阀武装后，帝国主义在继续直接出兵干涉的同时，还改变策略，作出种种“友好”姿态，加紧分化革命阵营，拉拢资产阶级右派蒋介石叛变革命。这时，反革命野心日益膨胀的蒋介石，也妄图独吞革命胜利果实，建立蒋家王朝。从此，他决定把斗争矛头指向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以扫除其实现反革命野心的最大障碍，并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以取得靠山。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活动主要表现在：

（一）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另立中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攻占南昌后，蒋介石在这里设立了总司令部。这时，国民党中央决定把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但是蒋介石却明目张胆地极力反对，提出迁都南昌，妄图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不仅拒不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决定，还扣留了取道南昌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多人。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对下，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但这是他准备与帝国主义勾结，最后叛变革命的一个严重步骤。

（二）和帝国主义加紧勾结。迁都阴谋失败后，蒋介石遂即以南昌为反革命中心，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他和国民党右派军阀、官僚政客秘密策划反革命，派戴季陶、宋子文、王正廷等同日、美、英帝国主义勾结，美、日帝国主义也派代表到南昌与蒋介石会谈。买办资产阶级代表、江浙财阀重要头目虞洽卿也来南昌，表示在财政上支持蒋介石。

(三) 镇压工农群众和革命团体。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蒋介石唆使其爪牙惨杀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接着，又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会，指使流氓捣毁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市总工会、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总工会。与此同时，在南京、杭州、福州、重庆等地，都陆续发生了捣毁革命团体，惨杀革命群众的事件。仅重庆三月二十一日惨案中，就有一千多群众被打死打伤。

(四)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后，进一步加紧同反动势力的勾结。帝国主义答应以驻上海的二万多名侵略军，帮助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答应给蒋介石出反革命屠杀经费。青红帮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组织了“上海工界联合会”，为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网罗打手。从四月一日开始，蒋介石召开了一连串的秘密反共会议，决定正式反共。在大屠杀准备就绪以后，四月十二日，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向上海各区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蒋介石军队就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双方”枪械。十三日，上海市总工会组织了二十万工人的大罢工，并召开了十万群众的抗议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时，遭到开枪镇压，当场死亡三、四百人，伤者无数。这就是蒋介石制造的罪恶滔天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南北方的反动派也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肖楚女、汪寿华、熊雄等先后被杀。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府。从此，蒋介石代替了北洋军阀，成为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统治工具。

31. 在大革命的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哪里？

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根本错误就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继续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对资产阶级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政策。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党中央特别会议上，他在分析形势时，一方面认为军事势力有脱离民众而向右走的倾向，另一方面，他又主要指责我党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的工作，包办群众运动等，犯了“幼稚病”的“左”的错误。他硬说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国共合作的主要原因。为了维持统一战线，他反对发动群众同右派进行斗争，而是主张用纠正所谓我党对独立的“误解”、制止农民运动“过火”、反对耕地农有、组织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政府等方法，以推动蒋介石军事力量向左转。也就是说，要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牺牲工农根本利益的方法，来维持国共合作。这种“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以妥协求团结”的方针，使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日益严重。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在蒋介石反革命活动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他不但不去揭露，反而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要求人们不要听信“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谣言”，企图以此来拉住蒋介石，

实际上是为蒋介石涂脂抹粉，麻痹革命人民。蒋介石叛变后，他又吹捧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中心领袖”，要一切听从汪精卫的指挥，甘心把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

第二，在农民问题上，他否认农民阶级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对农民运动实行压制的政策。当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大革命高潮兴起之后，他跟在资产阶级后边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糟得很”。一九二六年九月，他在为中共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中，要求农民协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武装“不能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组织”，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等。蒋介石叛变后，两湖农民运动继续高涨，两省农会会员达七百多万，许多地区的农民自动起来插标分田。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下令压制农民运动，甚至下令解散农会，而陈独秀不仅加以容忍，并要工农团体接受汪精卫把持的国民党党部的领导，按照武汉政府的法令进行活动，完全放弃了我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由于陈独秀千方百计地压制农民斗争，从而使无产阶级在革命紧急关头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第三，在武装斗争问题上，陈独秀继续反对建立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张，并压制工农武装。在两湖地区反动势力日益猖獗时，共产国际发来紧急指示，要求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领导机关，充实工农领袖，动员两万党员、五万工农编成新的革命军队等，陈独秀不加分析地认为这些指示全部无法执行。夏斗寅叛变时，武汉政府准备发给工人纠察队一些枪支，陈独秀竟加以拒绝，以表示共产党没

有“阴谋”。“马日事变”发生后，湖南各县十万农军围攻长沙。陈独秀借口这样会“引起整个时局的纠纷”，下令撤退农军，使许克祥乘机反扑。而在六月三十日他所提出的“国共合作十一条”中，干脆要求我党完全解除革命武装，要求工人武装纠察队减少或编入武汉政府的军队，以减少“误会”。结果，当汪精卫叛变革命向革命人民举起屠刀时，由于人民没有武装，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终于使大革命归于失败。

32. 为什么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在紧急关头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日至五月九日在武汉召开。当时，革命正处于紧急关头。在上海，蒋介石已经叛变了革命，全国各地的反动派实行屠杀政策。以武汉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继续发展。但是，武汉政府内部的汪精卫集团，不断攻击工农运动“过火”，民族资产阶级表现了极大的动摇。这种形势迫切要求党制定正确的路线与政策，勇敢地担负起领导革命的任务，坚决支持工农运动，打击右派势力，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以挽救革命。但是，党的五大未能担负起这个责任。主要表现在：

（一）大会未能正确总结经验，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陈独秀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虽然作了一些检讨，但继续坚持右倾错误观点。如他认为“中山舰事件”时采取的无原则让步是“正确的”，仍然主张无产阶级不应领导武装斗争，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革命方法上的错误”；

提出要等到北伐战争胜利后，才能进行土地革命等。到会代表虽然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一定的批评，如瞿秋白批评他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指出无产阶级要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而不是“天然”就有领导权，“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革命”。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毛泽东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农民运动，进行武装斗争的提案，但是遭到陈独秀的拒绝，未能提交大会讨论，并把毛泽东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

（二）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许多同志还不善于分清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线，对陈独秀错误的实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再加上陈独秀表示接受大会的决议，所以，大会仍然选他为党的总书记。大会以后，陈独秀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继续推行投降主义。因此，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

3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什么？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从客观原因说，是由于敌人十分强大，帝国主义、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右派等反革命势力互相结合，远远超过了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党还年轻，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缺乏经验，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还缺乏统一的认识。在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大约有半年时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又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而

广大党员虽然革命热情十分高涨，但就全党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不高，还缺乏分辨和抵制机会主义错误的力量，使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得以贯彻，最后使革命陷于失败。

大革命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深刻的教训：

第一，中国的民主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组成由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没有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革命也不能胜利。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第二，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产阶级只有团结农民这个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为了发动农民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是坚持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基础，也是夺取革命胜利的保证。

第三，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没有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此外，大革命的失败还表明，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仅仅依靠革命的积极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作指导，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否则，党就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34. 怎样认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正确认识这一形势有什么重要意义？

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蒋介石政权是一个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政权。这表现在：

(一) 它对外实行投靠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蒋介石政权建立后，以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换取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它的支持。不久，又通过宋子文等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欢心，他宣布同苏联绝交，向一九二七年二月炮轰南京、屠杀中国军民的英美帝国主义表示道歉和赔偿。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多人，而蒋介石竟不准国民党军队抵抗。由于蒋介石政府推行卖国政策，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显著扩大。一九三一年同一九一四年相比，英国在华投资增加百分之六十，美国增加近两倍，日本增加四倍半。中国日益加深了殖民地化的程度。

(二) 蒋介石政权对内实行法西斯军事专政，残酷压迫

和剥削人民。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了一支空前庞大的反动军队和特务组织，疯狂屠杀革命人民。仅一九二七年，就有三十八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迅速形成了官僚资本，疯狂进行经济掠夺。工人在大革命中争得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被剥夺得一千二净，工资降低，劳动时间延长。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失业失学。在农村，地主阶级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农会被解散，农民领袖遭杀害，减租减息变成了加租加息，农民的赋税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这时，跟随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在经济上也逐步地陷于破产的境地。以上海为例，一九二七年底民族资本家的工厂有一千二百九十五家，到一九三一年只剩下七百九十五家，四年之内改组倒闭的工厂占原有工厂的百分之三十八。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政权代表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第二，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

这主要表现在：

（一）蒋介石叛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追随了反革命，脱离了革命阵营。革命的力量只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

（二）由于蒋介石实行残酷的反革命屠杀政策，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的摧残。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一部分不坚定分子脱党，有的叛变了革命，党的队伍由原来五万多人减少

到一万人左右。

(三) 工农运动低落。工人罢工逐年减少，而且多以经济斗争为主，多数斗争都遭失败。在农村，农民抗租斗争虽然不时发生，甚至爆发武装起义，但大多失败了。这些情况表明，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过去了。但是，革命的低潮只是暂时的。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但一个没有解决，而且愈来愈激化。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总代表的蒋介石反动政府，是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人民为敌的，其统治基础是脆弱的；革命发展的基础是雄厚的。所以，中国革命的高潮必将很快到来。

全面地认识上述形势，对于坚持革命，制定党的斗争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只有科学地认识上述形势，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才能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由于蒋介石政权代表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的社会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而必须坚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蒋介石政权的建立，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资本主义发展了，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了，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后他竟变成了取消主义者。另一些同志，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附和反革命，不能把对他们政治上的揭露和经济上的消灭区分开来，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犯了“左”的错误。

第二，只有科学地认识上述形势，才能正确地规定党的策略任务。由于当时的形势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因

而党的策略任务不是进攻，而是组织有秩序的退却，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当时，有些人被白色恐怖所吓倒，只看到革命处于低潮，而不认识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因而对革命悲观动摇，脱离了革命队伍，甚至叛变了革命。而另一些同志不承认革命已处于低潮，仍然强调进攻，结果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35. 南昌起义的简要经过是怎样的？它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南昌起义是根据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的决定而举行的。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汪精卫七月十五日叛变后，临时中央常委会迅速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参加这次起义的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二、三师，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军官教育团。此外，还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第二十五师，共三万多人。七月二十八日，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起义开始。起义部队全歼南昌守敌一万余人，胜利地占领了南昌。起义后发布《告全体官兵书》，宣告南昌起义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它的目的是“实行土地革命，为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说明起义军是

为劳动人民利益奋斗的军队。八月一日，成立了中国国民革命委员会，颁布了革命纲领，宣布继承北伐革命没有完成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南昌起义后，南京、武汉、广州的反革命势力，立即部署围攻起义军。起义部队于八月五日及时地撤出了南昌，向南进发。由于当时缺乏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和认识，而计划回到广东，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重新举行北伐。结果，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虽然打败了大批堵截的敌军，占领了不少城镇，但在到达广东的潮州、汕头地区时，在强大敌人围攻下，主力部队遭到严重损失。留下的千余人，一部退到广东的海丰、陆丰与当地起义的农民武装会合，坚持斗争；另一部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退出广东，经过江西转入湖南南部，发动湘南起义，最后转战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合。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征服的。它有力地回击了蒋介石的屠杀政策，鼓舞了各地人民开展武装斗争。

第二，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立革命军队的新时期。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开始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颁布决议，规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诞生的光荣纪念日。

36. 为什么说“八七”会议使党前进了一步？

“八七”会议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苏兆征、毛泽东、邓小平等二十多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评价这次会议时指出：“‘八七’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36页）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会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同时，从理论和政策上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指出，机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整个退让的理论”。它“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它不是由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成了国民党上层分子政治上的俘虏。如果不纠正这样错误，就不能规定将来的工作，更不能进行革命斗争。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这反映了我党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的认识，比过去前进了一步。

第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瞿秋白在代表上届中央常委会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国民党和我党分裂以后，我们要以革命的方法争取政权，用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会议指出：“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号召全党重视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暴动，自

下而上地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不重视武装斗争的严重错误，强调今后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做为当前主要任务。“八七”会议开始把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土地革命）和形式（武装斗争）统一起来，这一认识是在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而得出的。它反映了我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八七”会议后，全党进入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新时期。它所确定的正确方针，使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外的悲观情绪大为减少，对扭转党内思想的混乱状况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八七”会议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没有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进攻和必要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集聚革命力量。它在反对右倾的同时，没有注意克服已经产生的“左”倾情绪。这是它的不足之处。

37. 毛泽东是怎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它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毛泽东根据“八七”会议决议精神，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著名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党中央的特派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会议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秋收起义的具体计划，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的农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

起义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卢德铭为总指挥。九月初，在安源召开了军事会议，确定首先在湘东赣西各县发动，待各路起义胜利后，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取长沙

九月九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开始取得了白沙、醴陵、浏阳等地战斗的胜利，后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一部分叛变，使部队损失过半。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向南进发。九月二十三日在部队南下至芦溪时遭敌伏击，又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二十九日，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并确立了党支部建在连队、班排设党小组的制度和官兵平等、军内民主制度。“三湾改编”是创立我军政治工作的开端，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十月底，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

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斗争。首先，他重建了被敌人破坏的湘赣边界各级党的组织。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成立了县委，酃县成立了特别区委，莲花县成立了特别支部。其次，紧紧抓住武装斗争这个中心环节，在加强工农革命军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在工农革命军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并加强部队的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为八项注意）。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在工农革命军的帮助下，乡村普遍成立暴动队，区、县成立赤卫队，并改编了原来在井冈

山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这就初步形成了正规军、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再次，建立红色政权，领导边界军民开展土地革命。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先后成立了茶陵、遂川、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巩固了红色政权。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两支部队正式组成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井冈山会师扩大了革命武装，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四月到七月，工农红军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多次“进剿”。其中特别是龙源口战斗，歼敌千余人。根据地发展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一部分的广大地区，达到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具有伟大的意义。它是在中国革命暂时失败的形势下，将革命的退却和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的最好典范，是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全国树起了一面红旗，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它是我党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重要标志，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38. 广州起义的简要经过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广州起义，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根据中央指示，乘粤桂军阀混战、粤军主力撤离广州之机，发动的一次武装暴动。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广

耳
乙

州工人赤卫队，共五千多人。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起义开始。起义部队经过激烈战斗，消灭了敌人三个团和一部分警察保安队，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公布了政府的纲领和各项政策，选举苏兆征为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为起义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引起了国内外反动派的极大恐慌。它们互相勾结，立即向起义武装疯狂反扑。十二日，英、美、法、日等出动炮舰不断向市区轰击，海军陆战队还在沙面登陆。张发奎等调来大批反动军队，从四面包围攻击广州。起义部队在各个战线上进行了英勇还击，浴血奋战三昼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失败。张太雷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从广州撤出的起义部队和工人赤卫队约一千二百余人，在花县经过整编，一部转到海陆丰，参加了彭湃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一部转向广西农村，与农民起义武装会合，坚持武装斗争。

广州起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它是我党为反对蒋介石反革命屠杀政策所进行的又一次英勇的反击，表现了无产阶级不畏强敌的伟大气魄，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二，广州起义、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它为创建人民军队做出了贡献。三，广州起义是在中心城市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它证明在敌人统治的强大中心，是不能首先取得胜利的。

39.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建立了哪些农村革命根据地？

从一九二七年秋开始，各地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在举行武装起义的基础上，陆续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

其中主要有：

中央革命根据地。由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组成，以瑞金为中心，共二十一个县。一九二八年底，湘赣两省的敌人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新的“会剿”。毛泽东在宁冈白露村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和红四军一部分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等则率领红四军主力，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进入赣南，开辟了赣南根据地。同年三月到十二月，红四军曾三度入闽，和闽西地方党相结合，先后消灭了地方军阀武装，开辟了闽西根据地。一九三〇年二月，赣南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当地革命武装编为红三军。三月，闽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当地革命武装编为红十二军。六月，红四军、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一九三一年秋，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十一月，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赣南、闽西统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湘赣革命根据地。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后，留守井冈山的红五军经过艰苦战斗，冲破敌人重兵包围，转移到赣南，井冈山一度被敌军占领。一九二九年五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重新夺回井冈山，到一九三〇年底，湘赣根据地有很大发展。一九三一年八月，成立了湘赣边工农兵政府，革命武装扩编为红八军，后编入红三军团。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一月，方志敏等领导了横峰、弋阳起义，开辟了赣东北根据地。一九二八年十月，党又领导了闽北崇安等地的起义，开辟了闽北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初，两块根据地联成闽浙赣根据地，两地红军合编为红十军。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黄麻起义后，开辟了鄂东北根据地。一九二九年冬，河南商城、皖西六安农民武装起义，开辟了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三月，根据中央指示，三地红军改编为红一军，六月，三个地区联合成鄂豫皖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初，红一军与原在赣鄂边界蔡申熙领导的红十五军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五月，党中央在鄂豫皖区成立分局，十一月成立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红军达五万人，根据地扩大到二十二个县。

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由洪湖、湘鄂边、鄂西北等区组成。一九二八年七月，贺龙率领的革命力量在桑植、鹤峰一带开辟了湘鄂边根据地，建立了红四军（后改红二军）。一九二八年六月，周逸群等领导洪湖地区秋收起义的革命武装编为红六军，开辟了洪湖根据地。一九三〇年七月，红二军和红六军会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同年九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形成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平江起义后，红五军一部分在黄公略、王首道率领下，坚持游击战争，扩编为红八军，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当地武装发展为红十六军。一九二九年十月，红五军主力从井冈山下来，与黄公略部会合。一九三〇年五月，红五军、红十六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黄公略任副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八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十月，由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军，在百色起义，建立了第七军。一九三〇年二月，邓小平、李

明瑞、俞作豫领导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左江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四月，红八军合编于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一九三一年七月，红七军奉中央命令转移到中共根据地同红三军团会合，留下的武装由韦拔群领导坚持斗争。

陕甘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刘志丹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后，坚持在陕甘边进行游击战争。同年秋，晋西游击队到陕甘边，增强了革命力量。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陕甘游击队扩编为红二十六军，建立了陕甘根据地。

琼崖根据地。一九二九年冬，以冯白驹为首的中共琼崖特委，总结了革命受挫折的教训，转入农村斗争，革命力量迅速扩大。后来在敌人接连“围剿”下，革命武装遭到极大损失，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

此外，在广东的海陆丰、四川的宣汉、达县，江苏的如皋、南通、泰兴地区，都先后建立了小块根据地。

40. 为什么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后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这次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大会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革命的总任务是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大会规定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一切土地，耕地归农民；八、改善士兵生活，发给士兵土地和安排工作；九、取消一切军阀政府地方的税捐；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大会强调必须采用武装暴动的革命方法，建立并扩大武装部队。

第二，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提出了党的策略任务。大会认为，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但是，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工农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完结，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由于“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能解决”，因此，党的任务（指在城市）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党在苏区的任务是：建立红军，发展革命根据地，实施土地纲领。

第三，大会反对了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大会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主观原因是由于“共产党领导机关内的机会主义政策”所致，进一步批判和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同时大会也批判了一年来党的工作中“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并指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盲动主义。

大会所解决的上述问题，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明确革命斗争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这次大会后一个时期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次大会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对于

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统治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正确的政策；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对于党的工作重点需要由城市转到乡村这一关键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

41.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怎样变成了取消主义者？

大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

陈独秀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离开中央后，拒不接受党的批评教育，不检查他们的投降主义错误给党造成的严重危害，反而责备党“牺牲了他们”。陈独秀在一九二八年，拒绝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完全站在反对六大的观点上，认定“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不仅对于将来的革命性质仍旧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对目前的革命形势也估量不正确”。他同彭述之等人认定：“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而没有实际意义，主张以“召开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开始暴露了他的取消主义观点。从一九二九年七月开始，陈独秀连续给党中央写了三封信，暴露了他一整套的取消主义的政治主张，并将这三封信同时发表在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机关报上。陈独秀在信中对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性质、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他认为，蒋介石反革命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当前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他主张把工会、农会转移给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只要作宣传、教育工作，进行经济斗争。因此，他极力诬蔑红军为“流寇”，攻击党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是“土匪行动”、“破坏行动”。这说明陈独秀已经堕落到取消革命、反对革命的泥坑，他所谓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空喊。

对于陈独秀的取消主义错误观点，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严肃地进行批判，并揭露了他的反党活动，要求他必须服从党中央的决议，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但是，陈独秀拒不接受党的挽救，竟于一九二九年秋冬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形成一个反党的小组织。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他开除出党。

42. 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伟大意义是什么？

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理论，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首先在他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陆续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进行了论述。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对这一理论又进一步作了阐明和发展。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点是：

（一）关于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在中国社会经济中，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占优势，中国的农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这就为建立农村根据地提供了经济条件。中国又是一个多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国家，他们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经常产生军阀之间的分裂和战争，这就不仅削弱了反动统治势力，而且也为红色政权在白色政权包围中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还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革命力量大有回旋的余地。

第二，中国是一个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国家，许多地区，如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曾经建立农会和工会。这样，就为在这里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是由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因为当时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并且日益激化，因而革命的发展有着深厚的基础。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只有地方性的赤卫队，不能对付正式的反动军队。正因为已经有了相当力量的红军，因而就可以造成长期割据的局面。

第五，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就是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当时，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已经经过革命的锻炼，因而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是可能的。

（二）中国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

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这是因为：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没有民族独立，没有民主，没有议会可以利用，也没有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权利，反动派实行赤裸裸的军事专政，这就不仅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把武装斗争做为主要斗争形式，而且也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合法的斗争，进行中心城市起义，而一举夺取政权。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长期占领着中心城市，而广大的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中国的武装起义应当从反革命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开始。无产阶级首先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根据地，在那里积蓄革命力量，使之成为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条件，成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才能迅速发展革命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三）农村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必须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三者密切结合起来。

因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革命军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织形式。没有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便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根据地就不能开辟、存在和巩固。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就不能发动农民投入武装斗争，红军就没有来源，武装斗争就会失败，革命根据地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而不能巩固。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战略基地。没有根据地，土地革命的

成果就不能巩固和保持，武装斗争就会失去依托而变成流寇式的武装，不容易和人民群众结合成一体。所以，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是密切结合而不可分离的统一整体。它们互为前提，相互制约，互相促进。

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的建设三者结合的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就是红色政权的观念。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把三者密切结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道路，也就是在农村中发展革命，长期积蓄和发展力量，逐步扩大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从而取得全国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具有伟大的意义。

第一，它批判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思想，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思想，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最基本的问题。

第二，它科学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而取得的。

第三，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以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杰出贡献。

43. 古田会议决议为什么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它规定的建军原则是什么？

一九二九年底，在红四军召开的古田会议上，以毛泽东

为首的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两年来红四军建设的经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通称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在解决红军建设时，十分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这是因为：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它决定着军队的性质和面貌。

任何军队都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任务服务的。反动军队是反动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中国的红军则是为了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为了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工具。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按照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和思想原则来决定红军的任务，处理军队内部的关系和外部关系，就成为军队建设的最根本原则，成为完全新型军队的根本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党的领导决定着军队的性质和面貌，是红军区别于历史上任何其他军队的根本点。

第二，古田会议决议所以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也是为了克服红军内部的单纯军事观点。

当时红军内部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单纯军事观点。如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认为军队只是单纯地打仗的；瞧不起政治工作，把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甚至把军队置于党和人民之上等。古田会议决议在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时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88页）只有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坚决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才能把红军建设成真正的人民军队。

为了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原则指导红军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建军原则。这主要是：（一）红军的宗旨是：“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党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之一。为了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在红军中建立和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思想工作，不断以党的路线、纲领、政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部队。（二）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任务。后来党明确规定了红军必须同时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抗日战争时期改为生产）三位一体的任务。（三）在军民关系上，必须实行军民一致的原则，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对脱离群众和侵犯群众利益。在军政关系上，实行军政一致的原则，严格遵守政府法令，反对以军治政。在军队内部关系上，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实行官兵平等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反对打骂、肉刑和极端民主化。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实行宽待俘虏和瓦解敌军的政策。

44. 古田会议决议为什么强调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不仅解决了军队建设问题，也解决了在农村和战争环境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为了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它调强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这是因为：

第一，是由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在当时担负着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艰巨任务。为了使党能顺利地担负起这一任务，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保持党的队伍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即世界观上的一致，奋斗目标的一致，政治斗争具体工作中思想认识的一致。只有思想政治上的一致，才能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才能有党的团结，党才有战斗力。在我党领导革命斗争中，党内经常产生行动上和组织上不一致的现象。这种不一致，都是由于思想上的分歧而发生的（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的破坏除外）。为了消除思想上的分歧，决不是简单地采用组织纪律上的约束所能彻底解决的。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才能消除思想分歧，取得全党思想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因此，毛泽东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问题”。党内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是要党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去分析政治形势和估量阶级势力。

第二，是由当时党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后，红军内党的社会成分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周围也受着小资产阶级的包围。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等。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87页）为了纠正党内的这

些错误思想，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也必须大力加强马列主义思想教育，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当然，也应当指出，决议在强调党的思想政治上的建设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因为没有思想上的一致，就不会有组织上的一致，但是没有坚强的组织作保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也不能巩固。决议认为，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要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非组织观点、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教育党员自觉地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坚决执行党的决议。

45. 为什么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第一，这是由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

中国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它们互相勾结共同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主要是广大农民。其中帝国主义是封建主义的靠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赖以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因此，要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就必须推翻和消灭封建势力。而为了推翻封建统治，在政治上，要实现人民民主，建立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就是消灭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使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从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粮食、原料和广阔的市场，取得社会进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农民问题，或者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

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由于农民直接遭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也只有依靠和发动广大农民，才有可能完成消灭封建统治的任务。

第二，农民问题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内容。

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但是，如果没有广大的同盟军，单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是一句空话，革命就不可能胜利。由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无产阶级同农民建立牢固的联盟，就成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首要条件。没有工农联盟，就不会有伟大的革命力量，也不可能团结其他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就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在旧中国，广大农民和无产阶级都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中国无产阶级又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这就为无产阶级实现对农民的领导，提供了可能和十分有利的条件。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民主革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它不能领导农民，害怕甚至反对农民革命。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反映农民的要求，担负起领导农民的责任。

第三，中国的武装斗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

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国的武装斗争，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我们的军队，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农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依靠农民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援。中国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历史证明，

凡是在充分发动了农民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广大农民不仅以高度的革命热情踊跃参军，壮大了人民军队，而且努力发展生产，积极支援前线，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同农民问题的解决密不可分的。

46.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是什么？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红军，巩固根据地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我党在建立了根据地之后，便普遍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并在实践中总结出土地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党的土地革命路线。

一九二七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党立即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湘赣边区政府根据井冈山地区一年来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制定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权归政府而不是归农民。一九二九年四月，红四军到赣南以后，毛泽东在兴国进行调查研究，并根据六大《农民问题决议》，制定和颁发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公共土地。同年七月，闽西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大会指出土地革命要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保护大小商店，“不打击富农”，不使中农“受任何的损失”，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土地分配方法以乡为单位，按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对在乡村

的地主“将酌量分与土地”。这样，在总结历年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同时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分配土地的方法，就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有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必须依靠贫雇农，把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放在第一位。因为贫雇农遭受封建剥削和压迫最深，是党和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土地革命的先锋，他们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取得土地革命的胜利。（二）必须联合中农。中农是农村的小资产阶级，一般没有政治权力，程度不同地遭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中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是拥护革命的重要力量，联合中农才可以孤立地主。

（三）要把富农和地主区别开来。因为在民主革命阶段，保存富农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力，必须反对过早地消灭富农经济的“左”的倾向。但是，由于富农经济存在封建剥削，因而必须限制它，同时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四）保护中、小工商业。这不仅是由民主革命的任务所要求的，而且还因为他们对于活跃红色区域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供给人民日常必需品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所以不允许侵犯中小工商业者。（五）土地革命的目标是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集中力量打击地主阶级，同时给地主个人以生活出路。

毛泽东制定的这条土地革命路线，是党在农村中坚定的阶级路线。它正确地解决了党在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根本问题，反对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这条路

线保证了党能够联合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雇农和中农，集中主要力量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胜利地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

47. 红军是怎样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的？红军连续取胜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大为恐慌。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开始，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多次军事“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取得了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其简要经过是：

一九三〇年底，蒋介石纠集七个师十万兵力，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敌人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自江西吉安到福建的建宁一线侵入根据地。这时，中央红军只有四万人。毛泽东、朱德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十二月二十七日战斗开始。当敌军主力两个师深入赣南的龙冈、源头一带，其中一个师又分驻两处时，我军集中全部主力，在龙冈歼敌九千余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各路敌军闻讯纷纷撤退，红军乘胜追击，又歼灭敌人半个师。前后五天，红军歼敌一个半师，缴枪一万三千余支，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又纠集二十万兵力，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兵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这时，我军只有三万多人。红军采取了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五月十六日开始，我军选定在富田一带敌较弱的两个师，将其大

部歼灭，然后向东横扫，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宁，到五月三十日结束。十五天中，红军长驱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又一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

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又纠集三十万兵力，亲任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时，红军只有三万人，且在苦战后未作休整，正在福建建宁一带。我军采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歼”的作战方针，指挥红军从闽西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集结。敌人发现红军主力西移，急忙调动主力向西进攻。红军避开敌人主力，乘夜向东突击，先后将莲塘、良村、黄陂敌人较弱的三个师大部歼灭。敌军急忙调其主力向东猛扑，但到处扑空，又一再挨打，只好撤退。红军乘胜追歼，在老营盘、方石岭又接连歼敌一个师又一个旅。前后三个月，共歼敌四万三千余人，缴枪两万余支，获得巨大胜利。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纠集了六十三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前后达九个月，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一九三二年六月至十月，敌军大举进攻鄂豫皖以及洪湖，湘鄂赣区，妄图解除对武汉的威胁。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八月在七里坪重创敌军。但是由于张国焘在胜利后盲目轻敌，在敌人重新进攻面前惊慌失措，擅自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十月，红四军主力向川陕一带转移。第二阶段，自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敌军主力进攻中央根据地。这时，虽然王明“左”倾错误排挤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领导，但是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红军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方针，在黄陂、东

陂战役中歼敌近三个师，俘敌师长二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红军之所以接连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其主要原因是：

首先是因为毛泽东等制定了正确的作战原则。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根据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特点，并根据各次反“围剿”的具体情况，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分别制定了不同战术。这就使在整体上居于劣势的红军，在局部战役上则居于绝对优势，因而能够各个歼灭敌人，接连取得胜利。

其次是由于红军指战员发扬了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英勇奋战的革命精神。虽然敌人在装备上占着优势，但是红军作战目的明确，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这就弥补了红军装备不如敌人的缺欠，表现出巨大的战斗力，从而保证了作战的节节胜利。

第三，是由于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의支援。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党的教育下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因而敌人进入根据地后，到处碰壁，处处挨打。而对于红军，人民则采用带路、送情报、救护、运输等方式，从人力、物力上进行大力支援。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红军力量的巨大源泉，是取得反“围剿”胜利的重要保证。

48. 毛泽东关于红军的战略战术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思想，是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的实际，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反“围剿”经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它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毛泽东认为，指导红军作战，必须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特点。中国革命战争有如下四个特点：（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二）敌人的强大；（三）红军的弱小；（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而且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只有认清中国革命战争的这一根本规律，并由此出发，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

第二，红军必须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

毛泽东认为，把军队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充分结合起来，这是我军战略指导的根本观点，是战胜敌人的根本方法。为了实行人民战争，就要实行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威力，保证红军有雄厚的兵源和物资的供应；才能克服战争中的各种困难，从而使红军由弱变强，达到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目的。

第三，红军在战略上要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只能采取的战略方针，即在战略防御中，以战役战斗的进攻战，逐步歼灭敌人，经过长期作战并不断取得胜利，使敌人由强变弱，而我则由弱变强，待到有

利时机再进行战略反攻或战略进攻，最后消灭敌人。在敌我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企图采取战略进攻的方针，是军事上的冒险主义。

第四，红军必须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形式。毛泽东指出，这种战争形式，一方面可以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和根据地的作用，充分利用我之优点，利用一切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人的作战条件，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另一方面，可以在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阵地。为此，必须实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进行歼灭战、速决战等一整套战术。这是暂时处于劣势和装备落后的红军战胜强大敌人必须遵循的原则。

49.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主要错误和产生这次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第一次出现的“左”倾错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使“左”倾错误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其主要错误是：

第一，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间断的革命。瞿秋白认为，虽然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要完成民主主义的任务，但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混合，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这样，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由解决民权主义的任务而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混淆了民主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第二，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不断地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起义。第三，在阶级关系和革命政策上，他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区别，提出没收大资本的企业，“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们的工厂”，“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甚至提出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极端错误的政策。此外，在组织上，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

上述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许多损失，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许多同志的反对，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就在全中国各地基本结束。

产生这次“左”倾错误的原因是：（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开始滋长了一种“左”倾情绪。在批判右倾错误时，对于这种“左”倾情绪没有加以注意，反而在中央领导机关加以发展，这就导致“左”倾错误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二）对形势的错误分析。他们无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损失，革命已转入低潮的事实，主观地把局部地区发生的一些武装起义和群众迫于反动派的屠杀而举行的反抗，当作革命全面继续高涨的标志，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这就陷入了盲动主义错误。

50.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是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开始的。当时在他主持下，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错误又

一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主要是：第一，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只要勇敢地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他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和示威”，

“只要有客观的革命条件，革命的主观力量便不成问题”，把革命力量初步恢复和发展看作已经具备在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他不承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的存在。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李立三等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他片面强调工人运动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城市暴动，才能斩断“敌人的头脑”，“炸裂敌人的心腹”。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错误的观点”。第三，他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端，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由此规定了一些“左”倾政策，如主张没收民族工商业企业、消灭富农等。

基于上述错误认识，他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他一方面命令全国城市如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立即组织总罢工、总起义，另一方面，不顾红军力量的弱小，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二军团攻打长沙，红十军团攻打九江，甚至命令左右江的红军也长途北上攻打柳州，以实现他的“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为了实

现这一计划，他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时，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错误地打击了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同志。

这一次“左”倾错误使革命事业又一次遭到了严重损失。上海地下党由二千多人减至六百人，天津地下党员由五百多人减至二、三十人。红七军由于执行北上攻打柳州的任务，由一万多人降至一千多人，右江根据地也被丧失。广大党员和干部要求纠正这一错误。九月，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正常工作，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从而基本上结束了这次“左”倾错误。

51. 王明一伙是怎样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王明一伙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统治地位的。

本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解决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虽然这次会议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清算不够，但作为这次“左”倾错误的主要方面都已停止执行，而且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继续领导全党为反对“左”倾错误而斗争。但就在这时，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等一些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使下，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

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起来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他们硬说李立三的错误是“左”倾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他们的压迫下和米夫的支持下，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强行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从此开始了历时四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它以王明写的《两条路线》（又叫《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为总纲领。其错误主要是：

第一，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富农斗争与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认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他们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认为政治上中间营垒、第三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

第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问题上，他们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他们硬说，“统治阶级的统治日益削弱而走向破产的道路”，“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而“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这些省份有首先胜利的可能。党的策略任务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在反革命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采取进攻的方针，

梦想以中心城市起义取得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

第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他们根本不懂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长期性、曲折性，不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轻视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他们顽固地强调“城市中心论”，要求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去顺从和配合城市工作。在白区工作中，他们到处组织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群众的赤色团体，认为“罢工依然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容许的进攻形式。

第四，在军事问题上，王明等人反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建军思想，诬蔑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并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为单纯打仗一项。他们要求红军进行正规战，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在作战问题上，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事实，反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

此外，他们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把拥护他们的所谓“斗争干部”安插到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中去。如把夏曦派到洪湖区，派中央代表团去中央苏区，派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区，派曾洪易去赣东北等，进行所谓“反右倾”，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凡是怀疑、不满、不支持他们错误观点的人，一律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特别是在许多地区，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纠缠在一起，使党的大批优秀干部受到错误的处理和陷害，造成极大的损失。

52.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哪些严重危害？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于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主要表现为：

（一）丧失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有利形势。

一九三一年，王明上台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实行“坚决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占领了东北。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又向上海进攻。这些事变激起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不仅广大工人、农民、学生纷纷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求蒋介石政府“改弦更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一致对外。甚至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也活动起来。十九路军违命在上海奋起抗战，东北军马占山部违反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起而抗日。在抗日反蒋的浪潮冲击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蒋介石被迫“下野”。上述情况要求党采取正确的政策，推动形势向更有利于革命的方面发展。

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王明即去莫斯科，但仍遥控中央）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他们不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步骤，却认为是“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序幕”，是为了联合其他帝国主义共同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的开始，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他们认为，中间阶级提出抗日是为了欺骗群众，替已经失去人心的蒋介石效劳，要与其作“决死的斗争”。结果，蒋介石在反共口号下，很快又重新上台，向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

抗日民主运动低落下去，丧失了组织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

（二）党的白区工作遭到严重损失。

在白区工作中，王明等人违背党的以防御为主，利用合法，长期隐蔽，积蓄力量，配合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正确思想，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而在城市工作中，他们又否认革命仍然处于低潮和敌我力量悬殊的事实，盲目地鼓吹“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主张无条件的进攻。他们经常要求各大城市举行罢工、罢课、罢岗、罢操、罢市、飞行集会，使白区党组织遭到破坏和不少同志牺牲。在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认为公开合法手段是“右倾”、“合法主义”。他们不顾客观条件就把党的纲领、口号搬到公开的群众团体的宣言、纲领中去，以至很快暴露了目标，遭到敌人的破坏。一九三二年初，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九十。临时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也站不住脚，不得不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于是，王明“左”倾错误便直接在中央苏区进一步贯彻。

（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五次“围剿”是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开始的。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军队，以五十万兵力集中进攻中央根据地，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在根据地周围修筑了近三千座碉堡。这一切当然给红军带来了困难。但是，红军比过去壮大了，革命根据地更巩固了，广大军民斗志昂扬，而且又有前几次反“围剿”的经验，如果指挥正确，以十万红军打败五十万敌军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时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已被“左”倾分子所排挤。这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共

产国际军事顾问)的错误指挥下,一开始就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丢失一寸土地”。当敌人为切断中央根据地和闽浙赣根据地占领黎川后,“左”倾领导者便企图收复黎川,冒险地攻打黎川以北敌人的坚固阵地硝石和资溪桥。两战都失败,他们便被优势的敌人所吓倒,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当时正值“福建事变”,福建政府同红军成立了抗日反蒋协定。蒋介石急忙抽调北线主力前去镇压。这时,毛泽东等建议红军应抽调一部分兵力出击苏、浙、皖地区,既可以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又可配合十九路军作战。但“左”倾错误领导者拒绝了这一主张,致使蒋介石集中兵力打败十九路军之后,又全力进攻红军。一九三四年四月,蒋介石集中主力进攻广昌,兵分六路向中央根据地推进。这时,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导下,红军处处设防,分兵把口,以堡垒对堡垒,实行所谓“短促突击”,致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根据地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最终,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与此同时,其他革命根据地也由于“左”倾错误统治而陷于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

53.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为什么连续三次产生了“左”倾错误?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

(一)大革命失败后,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

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致使“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这种“左”倾情绪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已开始出现，后来发展到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这两次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由于在批判这些错误时，没有使干部从思想上认识犯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办法，而是过分地着重于个人应负的责任，这就影响了对“左”倾错误的彻底清算和纠正。

党的六大，对于解决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是有重大功绩的。但是，大会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这就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片面地发展与扩大。

（二）党内多次出现“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同共产国际领导的不正确有着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曾经对中国革命作过不少正确的指示，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作了错误的判断，并把苏联的某些经验加以绝对化（如中间力量是最危险的敌人等），这就使共产国际的一些决议和指示脱离了中国的革命实际。而在这时，我们党除去毛泽东等少数同志外，许多领导人又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全党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还不够高，许多同志缺乏分辨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王明等人正是利用这一弱点，一切从书本出发，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而许多同志又把这些误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其推行了一套“左”倾冒险主

义政策。

(三) “左”倾错误再三地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不仅处于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而且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当这些同志的世界观未得到彻底改造时，往往会反映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特点。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容易表现为主观主义。一般说来，对于具有书本知识而缺乏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来说，容易表现为教条主义。而联系生产实际的同志则容易表现为经验主义。这两种表现的共同点，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在政治倾向方面，一般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他们希望革命马上胜利，对于革命需要长期努力缺乏耐力，因而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兴趣，容易产生冒险主义。而当革命遇到挫折和失败时，又容易悲观失望，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表现为右倾观点和投降主义。在组织生活方面，容易表现为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有害于党和革命的事业。加强思想教育，努力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

54.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是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刘少奇、朱德、邓发、何克全；红一方面军总部和各

军团领导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改组中央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等二十多人。所以说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因为：

第一，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左”倾错误领导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遭到巨大损失。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突破敌人的湘江封锁线时，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八万六千人减到三万多人。而这时，“左”倾错误领导不顾蒋介石已调集四十万军队的阻截，仍然坚持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使红军面临覆没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了原来去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才使中央红军从危急的险境中解脱出来。

第二，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保证了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批判了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当时，摆在红军面前最紧急的任务，是如何摆脱敌军的包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指挥下，采用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四渡赤水，歼灭了大量敌人，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

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之后，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总之，遵义会议是党经历了十四年的斗争锻炼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55. 红军长征的简要经过是怎样的？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多人，被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雩都等地突围长征。长征开始，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遭到巨大损失，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的领导下，在云贵高原展开了灵活机动的大规模运动战，歼灭了大量敌人，使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经天全、芦山、宝兴，进入川康边境。接着，又翻越终年积雪、海拔四千多公尺的夹金山，于六月十四日抵四川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按两河口会议决定共同北上抗日。到达毛儿盖之后，中央决定把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率领，由毛儿盖出

发，经草地出班佑，向巴西地区前进。左路军由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率领，由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向阿坝前进，然后东进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是，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公然反对北上，并威逼右路军一起南下。十月，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会议，决定迅速离开险区。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于十月攻克天险腊子口。这时，中央政治局在班罗镇召开会议，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后红军又翻越岷山、六盘山，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十五军团胜利会师，首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

当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则擅自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四方面军掉头南下，重过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并公然另立中央。由于敌军的严密封锁，形势日益严重，四方面军不得不于一九三六年二月撤出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西康转移，致使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约十万人，迅速削减到四万多人。

在湘鄂川黔的二、六军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湖南桑植出发，冲破敌人的围堵拦截，经过贵州、云南，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此时二、六军团奉中央命令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于党中央再三来电督促和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的坚决斗争以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张国焘被迫放弃反党活动，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会宁，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红军长征的胜利，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

（一）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是震惊世界的英雄

壮举。红军在一年中，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实现了空前未有的战略大转移，终于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道路。

（二）长征是宣言书。它向中国和世界宣告，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在长征中，红军经历了三百多次战斗，击溃了四百一十个团的反革命武装，爬雪山，过草地，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长征结束时，虽然全国红军由原来的三十万减到三万，全国党员也只剩下四万左右，但他们是久经考验的革命骨干。有了这一批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革命就有复兴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三）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在全国扩大了革命影响，并向沿途十一个省的人民宣传，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团结抗日。红军在沿途播下的革命种子，为后来开展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长征是以敌人的失败和红军的胜利而告终的。

56. 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表现在哪里？党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关于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内容及其特点，毛泽东曾经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19页）其错误主要表现为：

（一）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实行逃跑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被胜利冲昏头脑，随后又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仓皇放弃了鄂

豫皖革命根据地，向川陕边境逃跑。一九三五年三月，又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向西退却逃跑。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四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后，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以建立新的战略基地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但是，张国焘却站在右倾的立场上，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认为红军的长征是中国革命的失败，“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退到荒僻的西康或青海地区。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张国焘采取两面派行为，表面上接受北上方针，实际上却顽固地坚持错误，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红四军向川康地区逃跑。后来，在中央的坚持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北上。但是，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张国焘又命令红四军中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新疆逃跑。在敌人追堵打击下，西路军惨遭失败，仅剩下四百余人。这是张国焘逃跑主义给革命造成的恶果。

（二）军阀主义大发展。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时，就曾经暴露了他的军阀主义作风。两军会师后，他看到中央领导的一方面军兵力大减，自恃兵力雄厚，妄图用枪指挥党，篡党夺权。一九三五年七月九日，张国焘以“川陕省委”名义，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司令部的名单。七月十八日又指使陈昌浩致电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要挟说：如果“不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毛泽东等一方面进行耐心教育，另一方面为顾全大局，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对张国焘进行迁就和让步，决定把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使张国焘妄图夺中央军委主席的阴

谋未能得逞。

（三）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虽然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但他却擅自命令四方面军的部队向川康边界的天全、芦山地区退却。并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公开另立“中央”，非法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中央政府”，还自封主席，狂妄地要党中央改为北方局。一九三七年四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党中央的教育下，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辨明了是非，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对张国焘也进行了挽救。但是，张国焘坚持错误，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只身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当了可耻的叛徒和特务。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党中央决定将张国焘开除出党。

从党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中，应当吸取如下的经验教训：

（一）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绝不允许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之上。

（二）必须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以革命利益为重，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反对“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同一切危害党的团结、分裂党的统一的行为作坚决斗争。

（三）共产党员要光明磊落，在反倾向斗争中，坚决反对

两面派行为。特别要警惕那些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阴谋家、野心家，要坚决揭破他们的阴谋诡计。

57. 红军长征后，南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是怎样坚持游击战争的？

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分局（后改为东南分局），同时还成立了以陈毅、梁柏台为正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三万多红军紧紧依靠革命群众，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个省十四个地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

当时，红军的处境是极端艰难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主力红军转移后，立即调集了大批军队，闯进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实行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向各游击区进行反复的“清剿”。敌人对闽西地区，曾使用八个师的兵力进行“清剿”，全家被杀的四万多户，五百多个村庄被烧光。江西瑞金被杀十二万人，平江十三万四千人遇难，罗田、麻城间八十里的村庄全部被烧光。在敌人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下，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出现了田园荒芜、人口稀少的惨象。

敌人的血腥镇压，没有吓倒红军和革命群众。遵义会议后，中央指示分局的任务是改变组织方式，放弃集中出动的方式，把部队组织若干支队，深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各地红军的游击队，以英勇的革命气概，紧紧地依靠群众，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九三五年三月，项英、陈毅率军退出中央苏区，在粤赣边界以大

庾岭的油山为中心展开游击战争。其他还有张鼎丞、邓子恢领导的闽西区，粟裕、刘英领导的闽浙赣区，傅秋涛领导的湘鄂赣区，黄道、叶飞领导的闽东区，高敬亭领导的鄂豫皖区等。广大指战员经常过着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断粮缺衣、无药无医的艰苦生活。一九三六年冬天，陈毅在粤赣边界的梅山被围二十余日，敌人采用搜山、烧山、移民、包围等手段，进行残酷的“围剿”。许多著名的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贺昌、何叔衡、刘伯坚、阮啸仙等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南方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的艰苦奋斗，支援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保存了革命火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后来，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

“在南方各游击区——这是 we 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363页）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又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带着丰富的游击战争的经验，组成新四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58.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原因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次大规模的爱国学生运动。

促成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原因是：

（一）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华北事变”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是一二·九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一九三五年又向华北进行新的侵略。五月，日本制造借口，从东北将大批侵略军调入关内，占领了冀东，包

围了平津。之后，日本侵略者唆使一批汉奸在河北省香河县暴动，占据县城；继而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上述一系列事件就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华北事变”。“华北事变”明显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占领华北，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的野心，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这就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

(二) 蒋介石的卖国反共内战政策，是造成这次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在华北面临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形势下，蒋介石政府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他一方面继续围攻北上抗日的红军，镇压抗日民主运动，下令“扬言抗日者杀无赦”，大批爱国者被逮捕、杀害。另一方面他对日本侵略者步步妥协，并于一九三五年六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让给日本，十二月，又指派宋哲元等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掀起了抗日爱国运动的新高潮。

(三)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抗日爱国运动。还在红军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之后，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日反蒋斗争。党的抗日救亡号召，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发展。在我党北方局的领导和当时北平进步力量带动下，北平的学生首先响应党的号召，冲破国民党的高压政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争取爱国自由”等口号，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一行动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成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冲破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深入人心。这就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起点。

第二，一二·九运动为全国抗日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这次运动不仅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而且在运动爆发后，根据党的指示，大批青年学生深入工农，宣传和组织工农，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武装，组织了許多抗日团体。这些组织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抗日斗争的骨干。

第三，一二·九运动在我国学生运动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又一次证明，青年学生是革命斗争的先锋力量，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代表了我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59.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关门主义是错误的？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确定的。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

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据，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根据是：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可能。

华北事变后，日本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共同占领的半殖民地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就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危险，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国工人、农民是坚决要求抗日的。他们是中国革命最坚决的力量。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青年学生，是抗日民族斗争最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么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资产阶级那么多的买办性。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这个阶级自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后，就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但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态度将会变化。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统一的。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这个营垒也会发生分化。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各个地主买办集团，分别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英国的走狗们是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暗斗以至明争的。虽然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争斗，但对革命人民是大有用处的。共产党人应当善于分

析、掌握敌人营垒中这种变动，“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43—144页）

第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因为：（一）由于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中国革命力量增长了。但是，反革命力量暂时还大于革命力量。（二）中国革命发展还很不平衡，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准备花费很长的时间，集聚雄厚的力量。因此，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由于遵义会议以来，对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还未来得及进行清算，因而“左”倾关门主义思想影响仍在党内浓厚的存在着。“左”倾关门主义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一）它否认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产生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不承认中间阶级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反而把当时起来抗日的中间阶级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二）他们把统治阶级的营垒看成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化的，不懂得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以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三）他们否认反革命势力还大于革命力量，否认革命的不平衡性，因而不承认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力量的必要，主张只依靠单枪匹马与强大的敌人打硬仗。他们自以为只有“革命的力量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笔直又笔直”，才是“最革命、最彻底”。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幼稚病。这种“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孤家寡人的策略，只能把子弹打在次要敌人甚至同盟者身上，把抗日力量赶到敌人那边去，得到敌人的喝采。

60. “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是什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何重要意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在西安扣留了卖国反共的蒋介石，逼蒋联共抗日。这就是轰动中外的“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西安事变”的爆发，是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化，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殖民地的威胁。这时，不仅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日本对华北经济侵略的打击，也表示了抗日的要求。不仅如此，日本的侵略也打击了国民党内的一些地方实力派，加剧了国民党内亲日派和其他派系的矛盾。“西安事变”的爆发，就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实力派，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停止内战进行抗日的反映。

第二，“西安事变”是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张、杨接受我党抗日主张的结果。瓦窑堡会议后，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中央抓紧了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战士书》，重申党的抗日主张，表示愿意同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东北军广大官兵，遵从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丢失了东北，撤到关内，成为蒋介石“剿共”的工具，其结果是损兵

折将，一无所得。严酷的事实使张学良认识到，与红军打下去没有前途，共产党和红军是全国抗日最坚决的力量。由于家乡沦陷，广大东北官兵深感亡国奴的痛苦。他们认识到只有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才有出路，因而积极响应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二、三月间，党派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谈判，达成局部协定。四月，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与张会见，具体分析了国内形势和逼蒋抗日的可能，共同商讨停战抗日协定。杨虎城率领的十七路军，也在我党多次耐心工作下，于一九三六年春季，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党派王炳南与十七路军具体商议了两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抗日等具体协定。随着西北地区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建立，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导致了事变的发生。

第三，蒋介石的反共和排除异己的反动政策，也促使张学良、杨虎城决心发动西安事变。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不仅拒绝张、杨的正义要求，还派遣二、三十万嫡系军队入陕。蒋介石还两次亲赴西安，逼迫张、杨加紧进攻红军，并提出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张、杨深知这两个方案或是使其部队被红军消灭，或被蒋介石吞并。在东北军和西北军面临危亡境地时，张、杨下定决心，于十二月十二日拘捕了蒋介石，事变终于爆发。

“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党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首先使张、杨接受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然后共同和

蒋介石进行谈判。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等条件。二十五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事变发生后，我党分析当时形势有两种发展前途：或者由此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抗日力量，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或者结束反共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实现。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这就粉碎了亲日派的阴谋，使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

第二，它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逼蒋抗日方针的重大胜利。事实证明，党中央对于华北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分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抗 日 战 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61.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的形势怎样？正确认识这一形势对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有什么意义？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际和国内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

在国际上，第一种力量是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日本不仅妄图灭亡中国，而且还企图发动对苏战争，同德、意法西斯勾结起来称霸世界。第二种力量是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他们是中国抗战的支持者和朋友。抗战爆发不久，苏联就和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随后又给中国以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日本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及其他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等还来华参加中国抗战。第三种力量是英美帝国主义。它们对于中国的抗战，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由于日本侵犯了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深怕日本独占中国，威胁他们在远东的殖民统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国抗战，以便利用中国抗战削弱日本，因而给予蒋介石一些贷

款和军援。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借款给中国一亿七千万美元，英国约为三千三百万英镑。另一方面，英美又害怕中国人民的力量在抗战中发展起来，企图利用日本消灭中国革命，并把战火引向苏联，或者希望中国和日本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人之利。所以它们又对日本采取了纵容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极力同日本寻求妥协，甚至在“中立”的幌子下，大做军火生意，不断地以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供应日本。日本在侵华战争的头三年所消耗的汽油，百分之七十是从美国买到的。英国还把船只租给日本作军事运输之用。

在国内，第一种力量是汉奸。他们是中国最反动的一部分，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日本为了“以华制华”而收买的爪牙和走狗。第二种力量是人民。其中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抗战最坚决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则是全国抗日力量的领导者及核心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也站在抗战方面。第三种力量是国民党。它既不同于汉奸，也不同于人民，它对抗战采取了反革命的两面政策。国民党的主体，是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一方面，由于日本的侵略，特别是日军进攻上海，直接侵犯了四大家族的经济利益和英美在华的利益，使日本和国民党的矛盾更加尖锐。因此，在全国人民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压力下，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抗日。另一方面，它又害怕和仇视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反对人民起来抗战。它千方百计地妄图消灭和削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保存自己的实力，甚至企图“借刀杀人”，利用日军消灭共产党。同时，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又

抱有幻想，多次与日本密谋，以便在有利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条件下，对日妥协投降。

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爆发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对于制定党的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应担负起领导抗战的责任，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打败日本侵略者。但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实行反革命的两面政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警惕和揭露英美帝国主义危害中国人民利益的阴谋，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妥协反共政策，采取又联合又斗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这样，才能引导抗战取得胜利。

6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形成的？它对于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同蒋介石反共反内战的反动政策进行不断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大体有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以后，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的三个条件下和国民党中愿与我们合作抗日的力量订立抗日协定。在党的推动下，同年五月，冯玉祥、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十一月，中华苏维埃

政府又同蔡廷锴、李济深领导的“福建人民政府”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这些组织虽然都在蒋介石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是，我党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共同抗日的行动，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九三五年随着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思想，正式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我党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中日矛盾的加深和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一九三六年九月，我党适时地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以代替过去“反蒋抗日”的口号，并决定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内战，重建两党合作关系，互派代表进行谈判，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重大的努力。

第二阶段，是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使之成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良好开端。之后，为了巩固初步实现的国内和平，促进国共合作，一九三七年二月，我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召集各界代表会议、迅速准备对日抗战、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同时，也向国民党作出停止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改变工农政府和红军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普选的民

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在我党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提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同亲日派汪精卫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接受国共合作的决议。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月和六月，党中央三次派周恩来等分别到西安、杭州和庐山，与蒋介石等就人民军队、陕甘宁边区政府、承认我党合法地位等问题，进行谈判，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准备。

第三阶段，从“七七”事变到九月二十三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便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七月十五日，党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等抗日基本主张，重申了“四项保证”，并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十七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再次前往庐山，在前三次谈判的基础上，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等进行谈判。在芦沟桥事变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抗日的态度十分动摇，仍“希望用和平的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直到“八一三”事变后，由于日本直接侵害了英美在华利益和江浙财阀的利益，在全国人民的逼迫和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接受我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开辟了全国各抗日阶级、阶层和党派一致抗战的新局面，发动了从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民族解放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我党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法宝，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大人民武装，并在国统区运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这不仅为保证党对抗战的领导，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而且有可能变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人民革命的胜利。

6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有些什么特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它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较，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它的成分和内部斗争更为复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去上述四个阶级之外，还包括开明士绅、中小地主和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着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三种政治力量。这就必然使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更加复杂，要求我党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采取正确的策略方针。

第二，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在大革命时

期，由于我党还处于幼年阶段，还不懂得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当国民党一叛变，我党就无力组织反抗，革命随之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不仅直接掌握了革命武装，还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尽管蒋介石仗其当政地位和军事优势，采用各种手段，阴谋取缔和消灭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但是，我党已经成为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党，它不仅可以而且也完全有力量粉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三，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第一次国共合作曾经以新三民主义为其政治基础，让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参加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为其组织形式。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虽然我党曾经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提出过种种方案，但都被蒋介石所拒绝。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成为没有共同制定的政治纲领和固定组织形式的党外合作，只是遇事互相协商。这反映了它比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更加松散，双方互相缺乏约束力。

第四，所处的国际环境也不相同。在大革命时期，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朋友，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反对中国革命。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国际援助。这不仅表现在社会主义苏联、各国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支持，而且由于日本的侵华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虽然它们不断向日本妥协，但为了其自身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抗战加以赞助。

64.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哪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虽然实现了一致抗战的局

面，但是由于国共两党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因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条根本不同的抗战路线。

一条是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全民族抗战的路线。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也是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采取坚决抗战，反对妥协的方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主张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行全国军队和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在全国实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和自由，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从而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只有实现这条抗战路线，才能引导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制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政策，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在延安附近的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任何妥协和动摇；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武装人民抗战；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各项自由；改革政治机构；改善人民生活等。根据上述精神，会议提出了几项基本政策：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在国统区放手发动抗日群众运动，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进行斗争；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另一条是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即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单纯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包办的抗战路线。蒋介石集团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出发，不愿实

行有利于抗日的民主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自由，千方百计地限制群众抗日运动，不允许改善人民生活，顽固地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这条路线，必然导致抗日战争的失败。

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通过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它极力强调三民主义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准绳”，强调“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制造舆论。这个纲领虽有“制止日本侵略”，“对于舆论出版、集会、结社应予以合法之保障”等空洞言辞，但它没有明确提出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全部失地，召开国民大会，组织包括各抗日党派参加的国防政府，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等为争取抗战胜利所必需的要求。因此，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我党的洛川会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两条根本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对立和斗争。

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斗争的实质，是谁来领导抗战的问题；其斗争的结局将关系到，是使抗日战争有利于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是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我党必须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片面抗战路线，争取抗战胜利。

65. 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表现及其危害是什么？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关门主义。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

立之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逐步成为右倾投降主义。

王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从苏联回国后，便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反对党中央关于全面抗战路线和政策。他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及其以后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的观点，并在他担任长江局书记时加以贯彻。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抹煞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区别和阶级斗争，抹煞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王明只承认民族矛盾，极力反对抗日阵营中有左、中、右的区分，认为这样会“引起摩擦和分歧”，主张“以抗日和降日为分野”，提出“凡抗日者皆我友，降日者皆我敌”。他甚至抹煞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认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部分优秀青年的总汇”，硬说中国没有法西斯存在，胡说蒋介石当然“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和“抗战的领袖”。王明这种缺乏阶级分析的右倾观点，实际上起了为国民党蒋介石涂脂抹粉的作用，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

第二，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弃党的领导权。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的同意，一切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在军队问题上，他提出所谓“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完全适应了蒋介石“军令统一”的要求，把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统一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在政权问题上，他主张“一切政权制度保持既有形式”，反对以“边区形式出面”。对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他认为对抗

战和统一战线有害而无利，实际上是要求我们一切听命于国民党“既有”的政府，服从于蒋介石叫嚣的“政令统一”。在群众工作中，他强调群众团体要向“政府机关”（指国民党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其领导，企图让群众团体的活动纳入国民党的轨道。这些主张，完全否定了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彻底放弃了党对抗战的领导权，适应了蒋介石限制共产党和革命力量发展的阴谋。

第三，在军事问题和党的工作中心问题上，他极端轻视游击战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上，极力夸大国民党正规战的作用，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规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方针，提出“普遍的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错误方针。他把党的工作中心不是放在组织人民武装，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上，而是醉心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运动，妄图以所谓“建议”和“赞助”去推动国民党抗战。

第四，他错误地估计抗战的前途。由于王明轻视人民的力量，夸大国民党的力量，因而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只能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是人民革命的胜利。他甚至宣称：“听信‘抗日胜利了是共产党苏维埃的天下’这种谣言的人，不但是对于中国实际情况太隔膜，而且是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斗争力量和光明前途无信心。”

第五，在组织纪律上，王明不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指示，在长江局搞独立王国。他不经中央同意，便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违背中央路线的宣言、决议，甚至不准延安以中央名义发文发电，不允许在他把持的刊物上

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严重破坏了党的统一和纪律。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它完全适合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严重地干扰、破坏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贯彻，给抗战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特别是在他负责的长江局和项英负责的东南局以及新四军的工作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违背中央的指示，不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入农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丧失了长江流域大力发展新四军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大好时机。他的错误，还从思想上解除了对蒋介石反共阴谋的警惕，导致后来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严重损失。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66. 抗战初期，党内出现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所以出现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是有其社会与思想的原因的。

第一，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抗日战争以前，我们党同蒋介石集团处于公开的敌对状态。蒋介石对革命人民实行野蛮的屠杀，对红军实行军事“围剿”。那时革命人民是容易认清他们的反动本质的，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各种阴谋和反革命伎俩，也容易看穿，并保持高度的警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昨天的敌人变成了今天的抗日合作者。蒋介石对付革命人民的策略也发生了改变。他主要地不是实行军事镇压，而是采取封官加委，从

思想上、政治上加以腐蚀拉拢等。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觉悟不高和缺乏斗争经验的人，便解除了思想武装，丧失了警惕，因而出现了以接受蒋介石的委任为荣，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以及在政权问题上的迁就倾向，甚至象王明那样去美化敌人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第二，由于政治上的不坚定性，因而过高地估计蒋介石的力量，过低地估计革命人民的力量。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是十分悬殊的。蒋介石掌握着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而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到五万人，装备很差。这时，王明等人只看到蒋介石力量的表面强大，而无视国民党的腐朽反动本质；只看见革命人民力量的暂时弱小，而不相信它可能迅速发展壮大，因而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过低地估计革命人民的力量，对我党领导的军队丧失信心，因而犯了相信敌人超过相信人民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第三，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抗战，曾经给予热情的声援，并发出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这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其反共和降日的反动性估计不足，过多地考虑避免苏联受日本的进攻，而很少考虑中国人民革命如何在抗战中的发展，因而在对于如何处理国共关系、军事战略战术问题上，都作了一些错误指示。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回国后，根本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机械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再加上他在对抗日战争的基本问题上存在错误的认识，这就使他陷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泥坑。

67. 为什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如何实现这一原则？

所谓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提出并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既统一，又独立，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争取变抗战的胜利为人民的胜利。毛泽东指出，坚持独立自主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为什么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呢？

第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虽然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在抗战初期也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是蒋介石集团却害怕人民革命力量的增长，妄图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他千方百计地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甚至在抗战中利用日本之手“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五分之二”，其目的就是为了有利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与日本妥协。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不放手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抗日战争胜利的前途就有可能被断送。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保证抗战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展阵地，逐步壮大革命力量，以便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为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也是为了反对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这种倾向不仅突出地表现在王明领导的长江局的

工作中，而且在其他一些党员中，由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也开始丧失警惕。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对于国民党蚕食边区不进行反击的现象。有的根据地竟允许国民党建立反动政权，出现了反动政权与革命政府并存的局面。甚至有的地区的游击队，因丧失警惕，而被国民党全部缴械。所以，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能克服右倾投降主义，保证党对抗战的领导。

怎样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呢？

首先，在党内必须坚决地反对和克服右倾投降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其次，在统一战线中，执行“又联合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在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问题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拒绝国民党利用派干部或其他手段控制人民军队和抗日人民政权的企图。在敌后区，坚决放手发动游击战争，迅速扩大人民武装力量，普遍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统区，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大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扩大革命影响，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68. 抗日战争初期，我党是怎样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的？建立了哪些抗日根据地？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军事方针，造成了正面战场大溃败的局面。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大规模进攻。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

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政治委员（初称政训处主任，十月改称政委）罗荣桓，一二〇师，贺龙为师长，关向应为政委，肖克为副师长，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张浩为政委（一九三八年一月由邓小平接任），徐向前为副师长。全军约三万多人。

红军改编后，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晋西北、晋东南前线。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师主力利用平型关有利地形，歼灭日军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三千多人，取得了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使八路军威名远扬。

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各部即在敌人两翼和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南，经平型关、广灵、蔚县至张家口的交通运输线上，不断袭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一一五师的另一部，在冀西收复了曲阳、唐县、平山等县，进逼保定。一二〇师一部，在雁门关至大同一线开展游击战争，几度占领雁门关，截断敌人同蒲铁路北段的后方联络线。十月十八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第三营，奇袭代县以南的阳明堡敌人飞机场，焚毁敌机二十四架。十一月四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和一一五师主力，在广阳镇歼敌一千多人。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从出师至十月初，共与敌军作战达百余次，歼敌一万一千多人，缴获步枪一千三百多支，轻重机枪七十六挺，毁敌机二十四架及汽车、坦克六百

多辆。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陷之前，八路军在华北地区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作战。太原失守以后，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逃，从此，“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378页）随之，我军在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正确作战方针的指导下，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陆续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月，聂荣臻率一一五师一部，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八路围攻”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冀西阜平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不久，又扩展到冀东、冀中地区。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刘伯承、徐向前率一二九师，于一九三七年冬挺进晋东南太行、太岳地区，先后进行了阳明堡、神头村、响堂堡等战役，粉碎了敌寇三万多人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发动的“九路围攻”，创立了晋东南根据地。后来又派兵进入冀南地区，建立了冀南根据地，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晋绥抗日根据地。贺龙、关向应率一二〇师，于一九三七年冬进入晋西北地区，开展雁北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反攻太原的战斗。一九三八年春建立了晋西北根据地，八月又建立了大青山根据地，为晋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山东抗日根据地。我党于一九三七年冬，先后在泰安县徂徕山和文登县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鲁中

和胶东根据地。不久，在鲁西北聊城等县开辟了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冬，一一五师一部进入山东，巩固和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立的老根据地。一九三七年九月，边区工农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共辖二十三个县，林伯渠任主席。陕甘宁边区是我军的后方，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

华中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月，留在湘、赣、闽、浙、粤、鄂、豫、皖八省边境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政委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下辖四个支队，约一万二千人。新四军建立后，一九三八年春，正当国民党军队向西溃逃时，我军挥戈东进，深入华中敌后，在大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从五、六月起，陈毅、粟裕率一、二支队，在南京以东地区，连续进行一百多次战斗，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五月，新四军江北部队在张云逸等率领下，进入皖东巢湖、无为、定远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解放了淮南两侧和津浦铁路南段两侧地区，建立了以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以苏南和江北两根据地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

在东北，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杨靖宇为总司令、赵尚志为副司令、李红光为参谋长的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一、二、三路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转战于吉林、黑龙江和辽东一带山区。这支由汉、满、朝鲜族人民组成的部队，不畏

强暴，不避艰险，顽强战斗，不仅打击了日寇在东北的统治，也牵制了日军向关内进攻的力量。

在华南，还建立了东江抗日根据地和海南岛抗日根据地。抗战一周年时，八路军、新四军共毙伤敌伪军三万四千零七人，俘敌伪军两千零九十四人，抗击敌军四十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点八。到一九三八年底，八路军发展到十五万六千多人，新四军发展到两万五千人。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人口达五千万以上。抗战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抗战，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力量，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侵华计划，促进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

69. 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

这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论述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37页）毛泽东从这一基本历史特点出发，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的四个特点，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结论。

第一，敌强我弱。中日战争是一个弱国对强国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无论在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方面，中国都不如日本。一九三七年，日本钢产量是五百八十万吨，军火工业发达，军队有一百多万人，飞机达四千多架，武装

给养力强。而中国只有很少轻工业，钢产量只有九万吨，作战飞机三百零五架，军火工业十分落后。国民党虽有三百多万军队，但军队制度腐败，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战斗力极弱。我八路军、新四军虽有很好的政治军事素质，但数量极少。这种强弱对比的形势，不仅决定了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决定了中国抗日战争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战争。

第二，敌退步我进步。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处在进步的时代进行的进步的正义战争。从国际来说，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巩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日益强大。就国内来说，中国人民已经觉醒，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特别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这是中国抗战必胜的基本因素。它决定着中国抗战的力量必然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最后战胜日本。而日本的侵略战争则是退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它已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代，内外矛盾日益加深。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发动冒险的侵略战争寻找出路，只能是最后的垂死挣扎。尽管它暂时还很强大，但战争的进程及其结果，必然加速它的灭亡。

第三，敌小我大。中日战争是大国对小国的战争。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能够支持长期战争；日本是个小国，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不足，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

第四，敌寡助，我多助。中国抗战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唤起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而日本侵略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必然引

起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遭到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抗日战争就是上述四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的比赛。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了日本在中国能够横行一时，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能速胜。但是，在战争进程中，敌之强，必为其退步、小国、寡助等不利因素所减弱，而发生相反的变化，由强变弱，最后遭到失败；我之弱，必为我之进步、大国、多助等有利因素所补充，并逐步由弱变强，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亡国论”夸大敌强我弱的矛盾，看敌人如神物，视自己为草芥；“速胜论”则相反，夸大其他矛盾，看不到敌强我弱的特点。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只看到一个或几个矛盾，并把它夸大为全部或主要的矛盾，因而他们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和机械论。从全面的和发展的观点来分析，正确的结论应当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

70. 为什么说抗日战争时期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般说来，游击战只是对正规战起配合作用，是战术问题；决定战争最后命运的是正规战。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通常作为一种战术的游击战，却具有关系整个战争全局的战略地位。这是因为：

第一，只有进行人民游击战争，才能坚持抗战的持久性。

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小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缺乏一举退敌的力量。担负正面战场的几百万国民党军

队，一触即溃。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不可能一下子打败日本侵略者。但是，中国处在进步的时代，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在敌后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独立自主地在外线单独作战，成为持久抗战的主要形式，对正面战场起着战略支持的作用，促使相持阶段的到来。没有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牵制、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正面战场就会迅速失败，就没有持久抗战，也不会有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二，抗日游击战争是大规模地进行的，它有一整套战略战术。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国，因此，在抗战初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敌人占地甚广的情况。但是，由于日本是个小国，它以少兵临大国，兵力不足，只能占领一些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这就必然在其占领地区出现许多空隙。我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的敌后游击战，就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它不是单纯地作战，还要担负起创立抗日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等任务。这样，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一般的游击战，而是有防御和进攻、分散进行游击战和集中进行运动战、如何建立根据地和粉碎敌人的“围剿”等战略战术，使之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抗日游击战还要向正规战发展，担负着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任务。

游击战在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它不会停留在原来的地位上，而将逐步提高。在战略防御阶段，游击战争大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人的正面进攻有后顾之忧，促使相持阶段的到来。在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正

规战宣告结束，运动战和阵地战已经下降到辅助地位，我党领导的游击战则成为持久抗战的主要形式，游击战上升为主要地位。随着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游击队将向正规部队发展，游击战也将向阵地战发展，从而担负起实行战略反攻，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任务。

71. 《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发表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是什么？

《新民主主义论》一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发表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当时，中国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兵力大量消耗，内外交困，改变了对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而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英美由于欧洲战争爆发，惧怕日本配合德国在东方进攻，极力缓和同日本的矛盾，对国民党实行劝降的方针。由于这种国际形势的影响，再加上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惨败和对人民力量的恐惧，蒋介石集团便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一方面制造一系列屠杀八路军、新四军的惨案和军事摩擦，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还发动反共宣传攻势。他们组织一批反动政客、无耻文人和托洛茨基分子，大叫“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宣扬“一次革命论”，胡说“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了，为他们取消共产党，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维护其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大造反革命舆论。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安，对国家的前途表示深切的忧虑。做为中间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不满

意蒋介石集团的政治独裁和经济垄断，但又害怕革命力量的增长，幻想出现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此，中国向何处去？在当时就成为十分尖锐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全部见解，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书。

《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内容是：（一）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根本变化，提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结论。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已经走不通，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然后达到社会主义，才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二）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批判了国民党顽固派所谓“一次革命论”的反动叫嚣。（三）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发表的重要意义是：

第一，它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上对我党的攻击，批判了民族资产阶级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促进和加强了革命人民的思想统一。

第二，它正确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步骤以及二者的区别和联系，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政策，批判了党内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左”右倾错误思想，从而加强了全党的思想统一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政策统一。

第三，科学地总结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斗争经验，特别是我党领导中国革命

的经验。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地划分为新旧两个历史范畴，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宝库。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此以前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系统地全面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纲领、道路以及相应的一整套政策，表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为完整的科学体系。

72.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是什么？

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称作“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是毛泽东在深刻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的基础上，对我党领导的第一阶段革命的科学概括。

它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人民民主和自由。实现这一任务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农民主要是指贫农。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动力和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只有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团结其他革命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的对象既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就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它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发生的，因而它已经不是旧式的、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目的的革命。这个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则是它发展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个政权的形式，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这种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实行“节制资本”。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73. 为什么说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自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中

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已经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成为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从革命阵线来说，它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是因为：

第一，从国际条件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新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64页）因为这种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是反对和打击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就是推翻国际资本主义，即推翻整个帝国主义的统治。这样，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在斗争目标上就统一起来了。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允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允许，所援助。因此，中国从“五四”运动以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便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同盟军了。

第二，从国内条件来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革命前途发生了变化。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其中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

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它在革命中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它不仅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且还有跟随大资产阶级成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成为一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建立了本阶级的革命政党，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61页）这就使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74. 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其发展趋势必然是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选集》

为什么只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

第一，这是由中国革命所处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互相勾结，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和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首先是打倒帝国主义，以求得民族独立，推翻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民主。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排挤和压迫，它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在政治上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经济上就是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实行“耕者有其田”；保护民族工商业。这说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不是反对一般的资本主义和没收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按其社会性质来说，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第二，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旧中国，虽然也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它不是主要矛盾。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解决了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才能上升为中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经过民主革命斗争的胜利，夺取了政权，建立国营经济，并在革命斗争中提高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和组织上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必要的准备。

第三，实践证明，企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列起来，只能使中国革命遭到挫折。这是因为，如果把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加以并列，不仅会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推到敌人一边去，使本来凶恶的敌人的力量更加强大，而且过早地提出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等社会主义口号，也不会为广大农民所接受，中国革命必然由于脱离人民群众而陷于失败。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几次“左”倾错误所产生的恶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趋势必然是社会主义呢？

第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它丧失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企图，不仅为帝国主义所不允许，也为中国无产阶级所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劳动人民，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后，决不允许在两个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迫切要求摆脱一切剥削和压迫，走向社会主义。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结果，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主要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比重的不断增长，其他阶级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承认，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

济比重的不断增长等。所有这些，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就可以保障中国革命稳步地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

75. 什么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三大法宝”？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97页）历史的经验证明，能否正确地处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将关系到革命的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这“三大法宝”是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一）统一战线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同盟军的问题。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凶恶、强大的。要战胜他们必须组织起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在特殊条件下，这个统一战线还包括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第一，必须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反对牺牲工农大众的利益去迁就资产阶级的右倾错误，也要反对只注意工农而忽视争取中间力量的“左”倾错误。第二，必须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一方面要反对忽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可能性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又要反对对其妥协调摇性不进行斗争的右倾错误。第三，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历来是革命的对象，但它们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在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无产阶级可以暂时同附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的大资产

阶级集团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必须看到大资产阶级仍然是反动的，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在被迫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当党执行这一策略时，革命就取得胜利。否则，革命就遭到挫折。

（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统治，因而，中国革命只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用先进思想提高农民的觉悟，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长期进行革命战争，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发展与缩小，更是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进与后退。

（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没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组织上巩固统一的、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革命风格的党，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就不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党领导人民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是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验表明：当党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时，党的发展和巩固就前进一步；否则，党的发展和巩固就要后退。所以，把党建设成一个能够正确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党，将是关系着党的

事业的兴衰、成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统一战线只有以武装斗争为支柱，才能存在和发展，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则必须以统一战线，特别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才能发展壮大。而党则是掌握这两个基本武器实行对敌斗争的指挥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其作用。我们党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从而迅速发展壮大，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76.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土地政策是：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将其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什么把减租减息做为我党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呢？

第一，这是根据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变化所决定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时，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也表示要求抗日，蒋介石集团对日本的态度也开始变化。因此，党的基本策略，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推动国民党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团结和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我党在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中，即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

地的政策。一九三七年八月，党的洛川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第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我党领导抗日的主要依靠力量。虽然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和联合地主阶级共同抗日，我党暂时放弃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农民还要向地主交租交息，但是为了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抗日战争，也必须减轻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的生活，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尽力实行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政策，以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

事实证明，减租减息政策起了推动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当时，各根据地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或“一分减息”，即地租按抗战前的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或一分。一九四二年一月，党中央总结了各根据地的经验，公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地主必须减租减息，农民也要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也要保障佃农对土地的佃耕权；要求农民把眼前利益和将来利益、局部利益和全民族利益结合起来。减租减息斗争不仅推动了各个阶级抗日，减少了地主阶级对农民抗日的阻力，同时也使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调动了农民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农民纷纷参军参战，使根据地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粉碎了日寇、敌伪和顽固势力的进攻。

77. 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是什么？

在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以后，蒋介石集团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地掀起反共高潮，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激烈起来。这时，正确地制定和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方针，就成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斗争的重要条件。一九四〇年三月至十二月，毛泽东连续发表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重要文章，提出并阐明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

（一）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政权，积极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尽可能地开展各种群众运动以及争取知识分子等等。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最坚决的力量。只有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和分裂，更好地争取中间势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坚固的基础。

（二）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是一种动摇的力量，而且他们中的各个部分也有区别。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有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有矛盾，他们还要抗日，要争取政治权利。开明士绅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分子。他们虽然同农民阶级有矛盾，但是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有矛盾，他们不赞成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政策，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共同建立

抗日民主政权。在同顽固势力斗争中，有些人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参加，有些人则保持中立。地方实力派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他们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不赞成在他们统治的地区建立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同蒋介石顽固派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也有矛盾。他们除了可以共同抗日外，在我们同顽固派激烈斗争时，还可以暂时保持中立。

在中国，中间势力有着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党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争取这部分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必须有一定的条件：一是我们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是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三）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他们虽然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降日派有所区别，但是他们极端仇视人民革命力量的增长，从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企图。然而只要他们还没有脱离抗日阵营，就应该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而且这种时间越长越好。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抗日，也有利于争取在他们影响下的群众。因此，对他们应采取联合的政策。但是，对于他们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军事上作坚决的斗争。

为了同顽固派进行有效的斗争，毛泽东制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斗争的防御性。有利，即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这是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原则，在打退顽固势力的进攻之

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要“适可而止”，不可无休止地斗下去。这是斗争的暂时性。实行这种斗争原则，才有可能限制顽固派推行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的范围，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使顽固派处于孤立的地位，并且使他们能够留在统一战线内，避免大规模内战的发生和统一战线的全面破裂。

上述策略方针，是毛泽东把无产阶级坚定的原则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它准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状况，巧妙地利用了各种矛盾，可以保证我党有成效地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壮大自己，始终处于有利的地位。它既批判了党内“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错误，也批判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错误，使全党在极其复杂的斗争情况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牢牢地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78. 一九四二年党为什么开展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全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为什么开展这次整风运动呢？

第一，开展整风运动，是战胜严重困难的基本环节之一。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使八路军减少了近十万人，根据地人口由一亿下降至五千万以下。再加上一九四〇年起华北地区连年遭灾，敌后军民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

冬天没有被盖，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先后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精兵简政、进行整风、开展生产运动等十项基本政策。其目的在于广泛发动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便从思想上、政治上、物质上创造战胜困难的条件。其中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在精神和物质上成为战胜困难的两个基本环节。

第二，开展整风运动，也是进一步肃清教条主义影响，统一全党思想的需要。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当时党内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这些不正之风的存 在并不是偶然的。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其中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遵义会议后，对于王明的错误，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进行了纠正，但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彻底批判和清算，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还经常妨碍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党的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还不一致。王明还始终坚持错误，直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又再版了他的《两条路线》小册子，继续散布其影响。

第三，开展整风运动，也是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需要。抗战以来，我党吸收了几十万新党员，其中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这些同志有着可贵的革命积极性，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但是也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这些思

想成为党内不正之风滋长蔓延的土壤，经常妨碍党的路线的正确贯彻。如果不对党的思想和作风进行整顿，就不能保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党就不能担负起领导人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夺取胜利的重任。

当时开展整风运动，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有可能。从主观条件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党内有了一批久经锻炼、政治上成熟的骨干力量，马列主义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抗战以来，毛泽东、刘少奇等写了许多著作，为整风运动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从客观条件看，当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我们在敌后已经站稳了脚跟，总的形势变化不大。因此，进行整风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

这次整风运动具有伟大的意义。

（一）它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彻底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使广大党员从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受到一次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教育。使大批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端正思想路线，掌握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方法。

（二）经过整风，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的优良作风，各项工作出现了生动活泼、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就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准备了

条件，为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整风运动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次伟大实践。历史证明，用整风的形式解决党内矛盾，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也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79. 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为什么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又以反对主观主义作为这次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这是因为：

第一，主观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而主观主义则相反。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教条主义，一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特点是轻视和脱离实际，只从抽象的概念和公式出发，根本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用千篇一律的公式到处生搬硬套。经验主义的主要特点是认为只有自己的经验才是靠得住的，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实际的指导意义，把自己局部的经验当作普遍真理，不顾客观实际到处搬用。二者的共同点都是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学风相对立的。

第二，主观主义是产生“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党成立以来，出现的历次“左”右倾错误，究其思想认识根源，都是由于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认识不符合中国实际所造

成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无视时代的变化，无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完全可以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等事实，用已经过时的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结果自愿放弃领导权，造成大革命的失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则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根本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到处生搬硬套，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主观主义地制定了一套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结果使苏区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而王明的教条主义学风，直到一九四二年整风前仍然在党内存在。只有反对主观主义，提倡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才能彻底肃清“左”右倾错误的影响，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制定和执行。

第三，宗派主义、党八股也是主观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形式，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特别是教条主义在语言文字上的表现形式。由于主观主义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必然受到坚持真理的干部和群众的反对。主观主义者为了推行错误的一套，在组织上经常是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破坏党的团结，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在宣传上，由于他们脱离实际，必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窒息朝气蓬勃的党风和新鲜活泼的文风。为了批判和肃清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00页）

80. 在整风运动中为什么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为什么在整风运动中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呢？

第一，这是由整风运动的性质和目的决定的。党的整风运动，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总结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错误，吸取教训，以便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把党的战斗力提高一步。对于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还没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愿意医治，愿意改正，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因此，“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方针。

第二，由于党内出现的各种错误，都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复杂原因。我们党内出现的错误，一般都是由于理论水平 and 思想认识水平不高，思想路线不端正等原因造成的。对于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郑重的态度应当是，分析犯错误的内容和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讨论改正错误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认识，也可以使全党同志吸取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

第三，这一方针是在总结党内斗争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在党的历史上，对于党内斗争问题，曾经出现过各种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把党内斗争同敌我之间的矛盾混淆起来，对于凡是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一律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片面地强调一切不妥协和机械的纪律，废弃党内民主和正常的批评，利用过火的斗争做为推行其错误路线的手段。党内斗争的右倾错误，则采取自由主义的方针。他们对党内矛盾不讲原则，听任各种错误泛滥，主张无原则的党内和平。所有这些，都给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恶果，最终都没有达到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统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在批判了上述错误方针的基础上而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

81.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是怎样粉碎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的？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联共抗日，但是他的反共反人民的阶级本质并没有改变。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

来后，由于日本诱降活动和英美劝降活动的加紧，也由于对人民力量发展的恐惧，蒋介石集团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三年初，蒋介石集团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的反动组织，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法”、“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动文件。在国统区，他们设立许多集中营，大批囚禁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解放区和游击区，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惨杀我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战员的惨案。到一九三九年冬和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发展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座县城，并企图进攻延安；同时，阎锡山在晋西北集中六个军的兵力，大举进攻我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屠杀大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一九四〇年三月，蒋介石指使朱怀冰等部和已经叛变投敌的石友三部，分三路向晋东南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发动进攻。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我党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给予迎头痛击。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从华北敌后调回，协助留守兵团打退了胡宗南部的进攻，并驱逐了绥德警备区五县专事摩擦反共的何绍南部，使陕甘宁、晋绥两根据地联成一片。在山西，抗日决死队在薄一波等领导下，给阎锡山部以重大打击，并转入晋西北的太岳区，正式编入八路军。

在太行区，我军歼灭朱怀冰部三个师，并击溃石友三部。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军事上被粉碎。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配合军事进攻，还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展开了进攻。

为了批驳国民党的反动谬论，系统地向全国人民说明我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见解，毛泽东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

二、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打退。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国民党又把进攻矛头指向华中的新四军。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蒋介石指使其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污蔑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黄河以南的我军在一个月內撤至黄河以北。党中央一面据理驳斥国民党对我军的污蔑，一面为了照顾抗战大局，答应将皖南新四军转移到长江以北。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进行北移。七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被事先布置好的八万多国民党军队包围。我军虽然进行了七昼夜的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除了约两千人突围外，少数被俘，其余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等被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发布反动命令，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进攻新四军其他部队。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高峰。

对于国民党的滔天罪行，我党坚决予以反击。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勾结日伪联合“剿共”的罪行，提出要求蒋介石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惩办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

专政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同时，我党在延安和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揭露和声讨国民党的反动罪行。驻重庆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在军事上，一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扩编为七个师，并且命令新四军各部在八路军的支援下，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党的严正立场与合理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爱国华侨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蒋介石在政治上十分被动，不得不表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并诱骗我党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以掩盖其反共罪行。我党代表坚决拒绝出席，以示抗议，使蒋介石更加孤立。这样，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遂被击退。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由原来的十万人发展到十三万五千人。

三、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制止。

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发动的。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污蔑人民军队是“新式军阀”，解放区是“封建割据”，叫嚣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为其新的反共高潮进行舆论准备。六月，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唆使特务假冒“民众团体”的名义，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同时，蒋介石还调动驻守河防部队六个师，加上原有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几十万军队，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而且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掀起

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针对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党于七月四日和六日，由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的挑衅活动。九日，延安各界群众三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各解放区军民纷纷集会，声援保卫边区。全国人民以至国际舆论，一致反对蒋介石制造内战的罪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停止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82. 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抗日根据地军民是怎样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的？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即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间，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了百分之六十的侵华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我解放区实行空前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敌人把华北、华中各地分成“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我解放区），分别施以不同的进攻政策。在敌占区以“清乡”为主，建立伪政权，强化法西斯保甲制度，妄图肃清抗日力量；对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恐怖和怀柔政策并用，逐渐侵占抗日根据地；对解放区以军事“扫荡”为主，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解放区军民的生存条件。

为了粉碎敌人的猖狂进攻，各解放区军民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英勇斗争。

（一）在解放区反“扫荡”斗争中，我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协同作战，以广泛的游击战迎击敌人的进攻。当

敌人集中兵力“扫荡”时，我主力部队立即跳到敌后袭击敌人的老巢，或者化整为零，待机歼敌。留下少数主力部队同地方武装和民兵相结合，实行坚壁清野，开展群众性的地雷战、地道战和交通战等，大量杀伤敌人。当敌人分股“清剿”时，我主力部队便转入内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而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例如，一九四一年八月，日寇集中十万兵力，由敌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茨指挥，对晋察冀北岳地区实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我主力部队迅速地转移到敌后，由地方武装和民兵到处狙击与袭击敌人，使敌分进合击扑空。当敌人分股“清剿”时，我主力部队立即回师反击，一股一股地消灭敌人。敌人被迫撤退时，我军再用伏击战打击敌人。两个多月，我军作战八百多次，毙俘日伪军八千多人。在反“扫荡”斗争中，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在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的指挥员，身先士卒。副总参谋长左权便是率军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附近与敌寇战斗中光荣牺牲的。

（二）在游击区，根据党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采取充分发动群众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反“蚕食”斗争。在面对敌人点线的正面，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相结合组成联防线，随时给敌人以坚决打击，逼其撤走。在敌人点线的后面，则以武装深入，发动群众斗争，使敌人腹背受敌，顾此失彼。对于敌人的交通网、封锁沟和堡垒，游击区群众则广泛采取地雷战、破袭战、地道战和地面游击战相结合的办法，切断交通线，填平封锁沟，摧毁敌碉堡。一九四二年，仅冀南人民群众就毁掉围墙四十多道，烧毁桥梁

二十多座。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晋西北地区军民还开展了锄奸活动，摧毁了伪政权三百六十八所，制止了敌占区的扩大。

(三) 在敌占区，为了瓦解敌伪，粉碎敌人的“清乡”政策，我党创建了敌后武装工作队的斗争形式。武工队一般以三十人至五十人为一队，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并且还是群众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武工队经常发动和组织群众，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如包围敌人碉堡向敌军喊话，给伪军“上夜课”；占领敌人的会场，揭穿敌人的欺骗宣传；访问伪军家属等。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宪兵队、特务和死心塌地的汉奸；摧毁伪政权、伪情报网、伪合作社；截击抢粮的敌伪军，解放被敌人抓去的壮丁、民夫等。在武工队的积极打击下，使敌人的“治安区”永远不安，其抢掠物资计划也无法实现。如敌人一九四二年拟定在华北征粮二千万石，结果只得到十分之一。在武工队的军事、政治攻势下，敌伪士气日趋低落，厌战情绪日益增长，敌伪的“清乡”政策屡遭失败。

从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七月，我军作战四万二千二百多次，毙伤日伪军二十六万多人，俘虏日伪军六万五千多人，日伪投诚、反正者达二万一千多人。经过这一时期的英勇斗争，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蚕食”和“清乡”等反动政策，使解放区胜利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并且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83.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政治路线及其基本点是什么？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

甲

乙

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的。到会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一百二十一万党员。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指明了党为了争取光明的新中国所必须实行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101页）这条政治路线的基本点是：

第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打败日本侵略者。抗战初期，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造成正面战场大溃败。相持阶段，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接连发动反共高潮。抗战后期，它又和美帝国主义加紧勾结，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阴谋取消人民军队，准备抢占抗战胜利果实，使中国继续遭受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必须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事实证明，这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的根本前提。

第二，实现这条政治路线的根本途径，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为此，（一）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因为人民军队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柱石，解放区则是它的战略基地。（二）必须发动农民。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的可靠的同盟军，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来源。为了发动农民，必须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继续实行减租减息，将来实行“耕者有其田”，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三）必须冲破国民党的限制，防止和克服右倾思想，真正做到“放手”。

第三，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政治路线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没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84. 为什么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党章的最大特点。

为什么七大党章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呢？

第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适合我国情况的唯一科学的指导思想。

我们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革命，尤其象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提供现成的公式。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具体应用于中国实际，才能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制定出指导我国革命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我党许多卓越的领导人，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毛泽东则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我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理论上成熟了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第二，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全党同志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正确。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其他错误，其中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中，全党同志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经过认真学习，总结经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正确。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我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也说明我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全党已经实现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团结。

85. 什么是党的三大作风？为什么说它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

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94—1095页）

所谓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把它精辟地概括为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或实事求是，是党的唯一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是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的思想基础，也是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实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才能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所谓密切联系群众，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负责，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制定，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把它化为群众的实际行动。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充分发扬民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检查、总结我们的思想和工作，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清洗政治灰尘，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它是共产党人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正确方法，是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锐利武器。这三大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不断地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它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不断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为什么说三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呢？这是因为三大作风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的特点，体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是其他阶级及其政党所不能

具备的。

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革命性最彻底、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它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而它具有最宽广的胸怀，大公无私。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必要掩盖事实真相，也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观点，能按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做到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相反，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他们行将被社会发展的潮流所淘汰，不敢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唯心主义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他们不可能说明剥削和压迫的真象，必然歪曲事实，掩盖真相，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言行一致。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个共产党员想问题，办事情，都必须以符合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做到有事要同群众商量，时刻同群众打成一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引导群众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认识路线。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总是视自己为高人一等的贵族，视人民群众为“群氓”，极其害怕人民群众的觉醒。因此，他们不可能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

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工人阶级政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也是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的表现。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是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因为他们代

表的只是一小撮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利益，手中没有真理，身边没有群众，如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在人民面前彻底垮台。所以，有无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也是我们党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

86.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伟大意义是什么？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多端。正是有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使我国人民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极端复杂的形势下，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我党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从而巩固和发展了革命阵地，粉碎了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第二，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奋战的结果。抗战初期，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造成了正面战场的大溃败。相持阶段到来后，蒋介石又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正是有了人民军队，才建立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坚持了抗战。特别是在相持阶段中，我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同时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历史证明，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力量。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三，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面临的敌人是强大而凶恶的，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作战是不可能取胜的。正是由于我党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不仅充分发动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害的阶层和政治力量，而且还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同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了临时的联盟，从而广泛地调动了一切可以团结抗日的力量，比较顺利地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第四，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尤其是强大的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十天左右击溃了近百万的日本“关东军”，缩短了对日作战的时间，最后取得了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抗日战争的胜利，保卫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它生动地证明，一个经济落后的弱国，只要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就可以打败帝国主义强国。这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鼓舞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革命斗志。

（二）长期的艰苦的抗日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也锻炼和发展了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到抗战结束时，我军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多万人，解放区人口达一亿三千万。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空前壮大，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锻炼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抗战结束时，我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大党，并且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并取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四）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削弱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胜利信心。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87. 为什么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随之解决。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美帝国主义妄图取代日本，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

还在抗战后期，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这一阴谋，一方面打着“援助中国抗战”的幌子，给蒋介石大量贷款、物资，派遣大批“军事顾问”、“专家”渗入国民党的军、政、特务组织，使蒋介石集团成为其统治中国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妄图让我党交出军队，以扫除实现其阴谋的最大障碍。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由于在经济上、军事上占据优势，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更加膨胀。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便成为实现它的反革命野心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方面，它变本加厉地扶植蒋介石，给予大批军事贷款和援助。美国总统杜鲁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公开声称：要为蒋介石提供三十九个师的武器装备以及大批军用物资。从抗战胜利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给予蒋介石的军事援助达十七亿七千万美元，大小军舰二百七十一艘，飞机二千架，扩充了蒋介石的内战资本。同时，美国还直接派遣海军陆战队十四万多人，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这表明美国已经迫不及待地妄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

第二，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疯狂抢占抗战胜利果实。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后，国内的斗争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是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130页）八月十二日，即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要我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伪军“擅自行动”，而却指使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远东美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也命令日本政府，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投降。蒋介石为篡夺胜利果实，扩大内战资本，竟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并给许多汉奸卖国贼封官加委。大汉奸周佛海就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他甚至命令日军在原地“作有效的防卫”，对于已解放之地区，“应由日军将其收回”。由于美帝的支持和日伪军的配合，蒋介石不仅抢占了上海、南京、杭州、天津、北平等大城市，而且还在

九、十月间侵占我解放区县城、村镇数十座。蒋介石妄图在全国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

第三，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极力准备发动内战。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一面玩弄和平阴谋，一面在美帝的支持下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内战，妄图用武力消灭人民军队。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动用了美国在中、印境内的所有飞机和大批军舰，将在西南、西北，以及印、缅边境的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华北等地。一九四六年六月，由美国空运、海运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已达五十四万人。就在我党代表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第二天，蒋介石密令各战区印发他在一九三三年编印的《剿匪手册》。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间，国民党军队不断进攻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的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上党地区。十月，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正规军已达八十万人。内战危险已经十分严重。

上述情况表明，抗战胜利后虽已解决了中日民族矛盾，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尚未解决。中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

88.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为什么要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年中，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准备自卫战争的同时，曾经领导全国人民为巩固国内团结，保障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是蒋介石的基本

方针。既然如此，党为什么还要领导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呢？

第一，这是根据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而确定的。抗战即将胜利时，一方面，蒋介石积极投靠美帝国主义，妄图在它的支持下在全国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美帝国主义也需要积极支持蒋介石，把它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以便使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他们互相勾结，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把军队运往内战前线，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另一方面，由于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同时，蒋介石把它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的数百万军队运往内战前线也需要时间，立即发动内战还存在许多困难。于是，蒋介石在积极部署内战的同时，又大肆玩弄“和平”阴谋。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他连发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蒋介石的阴谋是，如果共产党不去谈判，就可以把破坏和平和发动内战的罪责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去了，他们就可以趁机压我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假如我们不听蒋介石的，他还可以利用谈判来麻痹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根据这种形势，我党采取针锋相对，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策略方针，在积极准备自卫战争的同时，争取和平民主，以戳穿蒋介石的和平阴谋。

第二，抗战胜利后，实现和平、民主，是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经历了多年战争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保障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祖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特别是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迫切需要和平休养生息。我党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尽

力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制止内战爆发，或使内战限制在局部范围，或者推迟全面内战的爆发。

第三，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也是为了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争取中间力量的需要。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国统区不少人对美蒋的反动本质和内战阴谋认识不清。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有的被美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力量所吓倒，害怕发生内战会引起美国干涉，因而要我党用让步换取和平，甚至要我们党放下武器与国民党“合作”，有的被美国的虚假民主和“友谊”所欺骗，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找所谓“第三条道路”，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在人民当中还散布和平主义、改良主义。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觉悟，帮助中间力量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也必须通过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揭露美蒋反动派。

89. 为什么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必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策略方针？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报告科学地论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了我党关于和平和战争的方针。报告针对蒋介石准备内战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策略，提出了我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策略方针。

我党为什么必须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策略方针呢？

第一，这是在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及其反革命策略进行

深刻分析的基础上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方针。

报告指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蒋介石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以军事镇压与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来对付革命人民的。我们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去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即蒋介石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以主要精力准备用革命战争去消灭反革命战争；同时，对于蒋介石的“和平”阴谋，也要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彻底予以戳穿。毛泽东说：“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132页）

第二，只有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策略方针，才能保卫人民的根本利益。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时刻梦想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全国恢复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要一切对人民负责。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是广大人民几十年来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成果。“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谁要想轻而易举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力抢去或骗去，那是办不到的。”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保卫革命的果实，人民革命的胜利才有希望。

第三，这一方针也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陈独秀实行右倾投降主义，对资产阶级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不敢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结果在一九二七年

的几个内，把人民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报告要求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牢记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不要再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则，革命人民又将陷入黑暗的深渊。

90.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焦点是什么？这两次会谈有什么意义？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日，我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为代表，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谈判。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我党又派周恩来等参加了由国民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代表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斗争焦点是：

第一，关于军队问题。在重庆谈判中，我党认为，军队问题的解决，必须和政治民主化联系起来。在政治民主化未实现之前，可先行整编军队，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按七比一进行缩编，人民军队可缩编为二十四个师，以至二十个师，国民党军队保持一百二十个师。而国民党政府则以“统一军令”为借口，坚持要我党先交出军队，然后再给予“民主”，最后只同意把人民军队缩编为十至十二个师。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国民党仍然顽固地坚持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再实行国家民主化，实际上要把人民军队化到蒋介石政府中去。我党则坚决主张，军队国家化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应当首先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双方的军队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

第二，关于政权问题。我党认为，在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合法地位的前提下，可以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提出

了四种解决方案。我方还决定自动退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解放区，以促成协议之达成。而国民党则以“统一政令”为借口，拒绝了我方提出的四种方案。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国民党仍然顽固地坚持国民党政府只能“扩大”，不能改组；坚持国民党的中央集权，反对自治制，实际上是妄想让几个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去“做官”，放弃革命和民主运动，使其一党专政合法化，取消解放区的人民政权。我党则坚决主张，必须实行人民民主，组成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同时实行地方自治，以保障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在上述两个问题上都未达成协议。但是这两次会议仍有重要的意义。

（一）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求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和努力。在谈判中，我党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了必要的让步，揭露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击破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从而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国际舆论的同情，国内外人民的拥护和中间力量的支持，提高了我党的政治威望。

（二）两次会谈虽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未达成协议，但是经过我党的努力，在重庆谈判签订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蒋介石被迫承认了我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建国的基本方针，表示要以此为基础长期合作，避免内战，保障人民民主自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等五个决议，虽与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

有很大差距，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民，不利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这样，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它就输了理，使之陷于更大的被动。

91. 解放战争初期，我党为什么把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党的土地政策，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而发生变化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曾经以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在这个指示中，党中央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汉奸、地主、豪绅、恶霸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为什么必须进行这种改变呢？

第一，把减租减息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这是我党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实行的政策转变。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为了争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地主阶级抗日，当时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蒋介石极力挑动和准备内战，妄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农村中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也随之激化起来。为了准备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我党必须发动农民。为此，需要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

第二，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一九四六年春，我党曾在各解

放区，特别是新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农民强烈地提出了土地要求。当时在不少地区，如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的农民，已经直接平分的地主的土地。在高涨的农民运动面前，地主阶级中的汉奸、豪绅、恶霸分子纷纷逃往国统区，咒骂农民运动，并组织武装还乡倒算。在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党必须坚决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回击阶级敌人。因此，实行这种政策的转变是完全必要的。

事实证明，把减租减息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在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解放区，铲除了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迅速掀起了参军、生产热潮，巩固了解放区，极大地增强了解放区的自卫力量。

92. 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党怎样提出了打败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它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先后向华东、东北、华北等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战争初期，由于敌我双方在军队数量上、武器装备上相差悬殊，许多人对战争的前途抱有怀疑和忧虑。一些国内外朋友也深为我们担心。在中国革命处于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和他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坚定地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为我党和全国

人民提出了打败蒋介石的战略思想。

为什么必须打败蒋介石呢？这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反对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在美蒋反动派面前，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打败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成为黑暗的世界，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将被断送。只有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全国渴望的和平民主才能实现，人民利益才能保卫，民族独立才有保障。

为什么能够打败蒋介石呢？这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及四大家族反动统治的反革命战争。它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对，军队士气不高；其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都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而人民解放战争则是爱国的正义的战争，必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军队士气高昂，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团结一致。这些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决定了我们可以克服困难，转弱为强，最后战胜蒋介石。正如毛泽东所说：“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46页）

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更是从理论上进一步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毛泽东指

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193页）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教导人们必须从本质上而不要从现象上，从长远观点而不要从暂时的观点去认识和估计敌人，从而树立起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同时，毛泽东一贯教导人们，在一个一个具体斗争中，必须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作真老虎，善于斗争，讲究斗争艺术，树立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把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结合起来，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

我党所提出的关于打败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具有伟大的意义。（一）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敌、顽强战斗的坚强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表现了在革命紧要关头，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强决心。（二）它扫除了那种惧怕美帝，对敌人估计过高，对人民力量缺乏信心，软弱无能的右倾思想，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我党提出的这一战略思想，成为鼓舞人民打败蒋介石，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

93. 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党提出的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是什么？

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了粉碎美蒋反动派的进攻，党中央

不仅提出了打败蒋介石的战略思想，而且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先后发出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的总结》等指示中，也提出了战胜敌人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解决了如何打败蒋介石的问题。

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就是，“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广泛的反对美蒋的统一战线。这是我党一贯坚持的政治方针，也是七大政治路线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发展。

为了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关键在于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这就要求在农村，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同时，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在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中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争取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要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打败蒋介石的军事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敌人使用许多个旅分几路向我军进攻时，我军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灭敌军的一个旅。坚决反对那种轻视敌人，平分兵力对付各路敌人，以致一路也不能歼灭，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的错误的作战方法。在战术的部

署方面，当我军已经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包围诸路中的一路时，也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从敌军的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猛烈攻击，取得全胜，然后迅速扩大战果，各个歼灭敌人。

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可以使战略上处于劣势的我军，在每个局部上，每个战役中处于绝对优势。其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才能最有效的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个团少一个团，被歼一个旅少一个旅；才能在武器弹药、兵源等方面最充分地补充自己，并使敌人士气沮丧，人心不振，而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才能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部队，或避开敌军的增援部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为了贯彻这个原则，在作战形式上，必须坚持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为此，若干地方的暂时丧失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必须“以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因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两失。这就是歼灭敌人和城地得失的辩证法。

94. 我军怎样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取得这一胜利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凭借在军事上的优势，气势汹汹地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我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经过一年的激烈战斗，就粉碎了国民党的

进攻，改变了战局。

(一) 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军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这是敌人全面进攻的高潮。我军为避开优势敌人的打击，采取诱敌深入，主动撤离了一些城市和地方，以运动战的打法，歼灭了大量敌人。

中原解放区的我军，在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领下，主动进行了战略转移。向东突围的部队，胜利地进入了苏皖解放区。向西突围的部队创立了豫陕和鄂西北游击根据地。华东野战军苏北部队，在陈毅、粟裕、谭震林领导下，在苏中泰兴、如皋、海安一带，采取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摆脱被动，争取主动，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的原则，创造了“七战七捷”，歼敌五万六千余人的战绩。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于八月间分数路向开封至徐州间的陇海路出击，歼敌一万六千余人。与此同时，我晋绥、晋察冀、东北各区解放军，都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军进一步开展了大规模运动战，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等指挥下，于一九四六年底和一九四七年初，在盐城、宿迁等地，歼敌约三万人，在鲁南战役歼敌五万多人。之后，主力部队毅然放弃临沂，大踏步地北上，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在鲁中进行了莱芜战役，歼敌六万余人，生俘敌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员李仙洲，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一次歼敌七个整旅的光辉范例。我东北民主联军在林彪、罗荣桓等指挥下，北满部队于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三月“三下江南”，歼敌一万五千多

人。南满部队于一月五日至四月四日，进行了“四保临江”的作战，歼敌三万四千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转战豫北、鲁西南、豫东和皖西北地区，歼敌四万一千余人。与此同时，晋绥、晋察冀部队都取得了许多胜利。在这四个月中，敌我各得失城市八十座，我军共歼敌四十一万余人。

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八个月中，我军共歼敌七十一万人。敌人虽占领了一百零五座城市，但由此也使它背上了“包袱”，不得不分兵把守。蒋介石战线太长和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机动兵力大为减少，士气日益下降，进攻能力减弱，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粉碎。

（二）从一九四七年二月至六月，我军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

蒋介石重点进攻的地区有两个：一为山东解放区，一为陕甘宁解放区。它的意图是：在陕北，攻占延安，打击我中央首脑机关和消灭我西北解放军；在山东，压迫我华东野战军至胶东狭窄地区而消灭之，以解除对其心脏地区京沪的威胁；然后再分东西两翼北上，打通天津、平绥两路而会师于山海关、张家口地区，分别聚歼我其他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针对这种情况，人民解放军的对策是：在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继续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在其他地区，我军即可乘机开始局部反攻，收复失地，并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指挥的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多人，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进犯。当时，西北野战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二万多人，不及敌人的十分之一。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西北野战军在延安以南进行了胜

利的阻击战，杀伤敌五千多人，然后中共中央于十八日主动撤离延安。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指挥下，采取“蘑菇战术”，从三月至八月，又连续在青化砭、蟠龙、羊马河、陇东、榆林、沙家店等地取得胜利。上述七战七捷，共歼敌三万余人，敌在陕北的重点进攻已破产。

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开始的。敌人以十三个整编师约二十五万多人，沿临沂、泰安向鲁中地区推进。四月，我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指挥下，攻克泰安，全歼守敌二万四千余人。敌人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北犯。我军分出四个纵队分别箝制敌的左右两翼，而以主力五个纵队，选择中路进犯至坦埠以南的敌整编七十四师。从五月十三日起，经三昼夜浴血战斗，将敌全部围歼于孟良崮地区，计歼敌三万二千余人，师长张灵甫被击毙。六月底至七月初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向我沂蒙山区的又一次进攻，迫使敌军由鲁西南西撤。至此，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基本上被粉碎了。

我军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所取得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在这一年中，我军暂时放弃了一些城市，但却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敌人屡战屡败。我军则连战连捷，总兵力由一百二十万人增到一百九十五万人。这一伟大胜利，为我军进行战略反攻，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二，解放战争第一年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它生动地说明，尽管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只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军事方针，我军就

可以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95.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样进行战略反攻的？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什么？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是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开始的。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八月中旬跨越陇海路，飞越汝河、淮河，于八月底进入大别山，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八月二十二日，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由晋南强渡黄河，向豫西地区挺进，东慑洛阳，西逼潼关，牵制敌人，支援了刘邓大军南下。九月七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跨越陇海路，进军豫皖苏，孤立了开封、郑州之敌。这三支大军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至淮河的广大地区，恢复和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四个月中共歼敌九万五千余人。这个行动，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整个战略部署，从根本上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党中央之所以实行战略反攻的决策，是建立在对敌我双方情况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第一，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英勇作战，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一九四七年七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由四百三十万降为三百七十万人，其中正规军由二百万人下降为一百五十万人。它在后方的机动兵力只有二十一个旅，且分布在新疆、甘肃、四川、西康等省。蒋军兵源枯竭，后方空虚，士气低落，充满着失败情绪。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一百二十余万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达一百

万以上。尽管我军在数量上仍处于劣势，但机动作战的兵力却处于相对优势。我军连战连胜，士气高昂，人民拥护，无后顾之忧，装备也大有改善，整个解放区军民充满了胜利信心。这就为我军实行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第二，实行战略反攻，可以打破敌人的反革命战略计划，使敌人陷于被动。解放战争第一年，蒋介石集团向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虽然遭到失败，但是，他的反革命战略方针，仍然妄图把战争引向解放区，阴谋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和物力，使我不能持久。我军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主动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这不仅可以直接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使我军在外线大量杀伤敌人，并扩大革命战争的规模 and 影响；也可以把敌军部分主力调出解放区，我军部分主力和地方部队则可以在内线进行局部反攻，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使敌人陷于全面被动。

第三，对于我军战略反攻的方向，党中央作了全面的分析。党中央所以选择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作为战略反攻的首要目标，是因为：（一）这一地区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控制中原，是军事战略要地，可以给敌人以更大的威胁。（二）这一地区处于三省交界处，敌人守备空虚。（三）这一地区过去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便于我军立足生根。

基于上述的科学分析，党中央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确定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基本任务。

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具有伟大的意义。

（一）它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许多年来，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革命力量总是处于战略防御，我军战略

反攻宣告了战略防御地位的结束。它将成为蒋介石二十年来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也是帝国主义一百多年以来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二）我军战略反攻将极大地鼓舞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促进中间力量向左转变，加速全国革命胜利的步伐。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主张，得到了各界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这表明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日期已经为期不远了。

96. 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是怎样出现的？它对解放战争有什么重大意义？

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一年中，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打了败仗，同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国统区各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第一，第二条战线的出现，是蒋介石卖国、内战、独裁政策同广大人民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时，蒋介石为了获得更多的“美援”，变本加厉地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即《中美商约》），规定美国人享有在中国境内居住、旅行、经商、开工厂、办教育以及从事宗教活动等权利，把中国的主权出卖得一干二净。在经济上，由于四大家族和美国垄断资本的疯狂掠夺和排挤，民族工业大批破产。据一九四七年一月统计，国统区二十个大城市，

半年内工商业倒闭二万七千多家。工人大批失业，青年大批失学，农民大批破产。一九四六年灾区遍及十九个省，灾民达一亿人。为了维持内战开支，蒋介石滥印钞票。“法币”发行额由日本投降前的五千亿元，到一九四七年七月猛增至十六万亿元，结果造成通货膨胀。一九三七年一百元“法币”可买两头牛，到一九四七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国统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政治上，蒋介石极力加强法西斯统治。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十月，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决议，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十一月十五日举行的伪国大制定了伪宪法，只有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均声明不予承认，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一九四七年二月，蒋介石集团强迫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谈判代表撤退延安。这一切都反映了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面目。

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怒，国统区人民的斗争日益高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上海摊贩因反抗国民党不准营业，举行三千人的请愿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屠杀，引起全市性的反蒋群众运动。接着，为抗议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国军人强奸北平大学女学生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迅速扩大到各大城市，国统区人民斗争出现了新高潮。

第二，第二条战线的出现，是我党领导国统区人民同蒋介石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结果。一九四七年春，党中央提出了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这就是：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基

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开始的学生运动，迅速发展为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五月初，上海各校学生举行反内战示威，八千多工人、学生包围国民党警察局，并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这一爱国运动又扩大到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促进了整个反蒋民主运动的高潮。与此同时，我党中央多次指示，利用各种形式，开展蒋管区农村的斗争。农民抗征、抗租斗争迅速高涨，有的发展到武装起义。仅据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统计，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民变武装发展到数十万。在台湾，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爆发了武装起义。起义从台北市发展到台湾全省，起义群众还组织了人民武装和自治政府。这次起义虽因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但却表现了台湾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此外，城市中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在蒋介石反动、暴政的压迫下，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鼓舞下，纷纷觉悟过来，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反蒋统一战线。

第二条战线的出现，对人民解放战争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一）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蒋统一战线空前巩固和扩大，蒋介石反动派在全国人民面前已经彻底孤立，使它处于全民包围之中。（二）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它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汇合在一起，推动着人民革命的发展，显示着中国革命新高潮已经到来。

97.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提出的土地改革总路线是什么？土地改革对于解放战争有什么重大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提出的土地改革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12页）

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

（一）土地改革的对象，是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

（二）土地改革必须紧紧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因为贫农（包括雇农）遭受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最为严重，它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中农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同情，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因此，土地改革也必须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并允许一部分中农比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要高的土地量，决不允许侵犯中农的利益。

（三）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时，应当是有步骤、有分别的进行。所谓有步骤，就是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决定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晨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在老解放区，由于土地已经平分，只需要调整一部分土地就可以了。在半老区，由于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应当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在新区，由于反动势力还很大，群众还未充分发动，可以先实行减租减息。在实行土地改革时，也可以首先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然后再分配包括富农出租的土地和平分富农多余

的土地。所谓有分别的，就是必须区分地主和富农，区分大、中、小地主，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在平分土地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原则下，可以有区别地给予不同情况的人们以不同的待遇。

（四）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一方面，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尽可能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反对破坏和浪费。另一方面，在土改完成后，必须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组织互助合作，掀起生产高潮。

在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的指引下，各解放区陆续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并在一九四七年冬和一九四八年春形成高潮。到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在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东的山东和苏北等老区和半老区，以及所包围的小块新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这些地区约包括一亿五千一百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约占一亿二千五百万。大约有一亿人口分得了三亿七千五百万亩土地。中农也普遍获得了利益。

土地革命的胜利进行，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铲除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社会基础。它在经济上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在政治上，普遍建立了村、乡、区人民政权，加强民兵武装，打击反革命活动，巩固了解放区，使解放战争有了可靠的后方。

第二，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东北的辽东、热东两个专区，在平分土地后，不到半个月就有二万人参军。晋冀鲁豫解放区，一九四七年参军者达三十万人。山

甲

乙

东农民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就有民工五百八十余万人支援前线。这就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第三，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掀起了农业生产高潮，从物质上支援了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的实行，翻身农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发展了，亩产量也提高了，手工业和副业也有较快发展，改变了解放区农村的经济面貌。这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而且广大农民以积极交售公粮、做军衣等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从物质上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98. 官僚资本是怎样形成的？党为什么采取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

所谓官僚资本是指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垄断资本。这种垄断资本与国民党的反动政权结合在一起，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因而是一种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形成。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窃取全国政权后，就同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相勾结，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建立了中央银行，接着又掌握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建立了他们的金融机构。他们在残酷屠杀人民的内战中，凭借政权和强制地掠夺，搜刮军费，滥发公债，进行军火交易，大发战争横财。与此同时，他们还采用加入“官股”的方式，吞并大批民营工商业，或以加入“商股”的办法，把“国营企业”归为私有，拚命掠

夺财富。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抗战时期大发国难财而空前膨胀。国民党政府借口“非常时期”，拚命掠夺，加强了它们的垄断地位。在金融方面，它们通过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作为金融统治机构，不仅控制了西南、西北地区的工商业，而且大量发行货币，造成通货膨胀。据统计，一九三七年六月，法币发行量十四亿四千万元，到一九四〇年则为六十亿元，增加了四倍，结果造成物价飞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在商业方面，四大家族进一步控制了国内外贸易，先后设立了贸易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专卖事业管理局等垄断组织，对工业品、农产品实行专卖和统购统销，用贱买贵卖的方法获取暴利。在工业方面，四大家族通过一九三八年一月设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等，一面扩大官办工业，一面采用政治强制或乘民族工业危机大肆加以吞并。以资源委员会为例，抗战前它共有十一个单位。到一九四五年受它支配的单位共有一百二十五个。其中九十六个生产单位中，属于它自办的只有二十一个，其余都是采用吞并、接管等办法掠夺来的。在农业方面，四大家族通过农业品的统购统销掌握了农业和主要经济作物，同时采取大量增加田赋征实（一般占农民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向农民施放高利贷和大量征用土地等办法，控制了农业，残酷剥削农民。

日本投降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获得恶性发展而达到顶峰。其主要手段是，利用“接收”的名义，把日伪的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加以霸占。例如，它接收了敌伪的正金银行、住友银行、朝鲜银行、中央储备银行等大批金融组织机构及其财产。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统治区的三千四百八十

九家银行中，由国民党控制的官营银行已达二千四百四十六家，占银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真正的民营银行已寥寥无几。它接收了敌伪工厂二千四百一十一家，并建立了许多全国性的工业、商业独占组织和区域性的独占组织。它霸占了大量土地。最著名的有日本华北垦业公司，土地达五十余万亩，军粮城农场稻田四十三万亩，华北农业实验场二十七万亩等。四大家族实际上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主。此外，它还通过规定二百元伪币兑换一元法币等手段，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掠夺。之后，它便利用内战，大量发行公债、纸币、贷款、大量征税等手段进行掠夺。这样，四大家族的财产迅速达到了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解放前夕，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拥有二百九十一一个工矿企业，掌握全国钢铁百分之九十，煤百分之三十三，电力百分之六十七，水泥百分之四十五，以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属。它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机构和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以及百分之四十四的轮船吨位。它还拥有十几个垄断性质的分公司等。

官僚资本的上述掠夺和发展，都是在帝国主义支持和合谋下进行的。四大家族的工厂、矿山、铁路、航空等，都有帝国主义的投资。在抗日战争前大多是“中英合办”、“中德合办”，抗战后大多是中美合办。官僚资本的商业机构，更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总买办。它或者与外国合股经营，或者四大家族单独开办，贩卖帝国主义的商品，帮助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原料。可以说，四大家族的财富，不过是帝国主义因为四大家族卖国有功而给的一点酬劳。

由上可见，官僚资本主要不是靠生产积聚发展起来的，

而是依靠反动政权，通过内战、商业投机、通货膨胀以及各种经济统治的办法，以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排挤、兼并中小资本主义企业而存在和发展的。官僚资本是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党采取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是完成民主革命的一项任务，也是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个重要步骤。

99. 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什么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党之所以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这是中国民主革命性质和任务决定的。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就其结果来说，虽然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就其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来说，它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54页）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同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并不是一个东西。他们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资产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它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排挤和打击，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因而，

成为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只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才能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

第二，保护民族工商业，有利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57页）尽管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非常软弱，并具有动摇性，但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的，在工农联盟不断巩固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建立起较长时间的革命联盟的。这样就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顺利地取得革命的胜利。

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在经济上有利于发挥民族工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积极作用。旧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微弱，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不仅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甚至许多日常生活需用的工业品都是从外国进口的。为了促进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对于不操纵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鼓励民族工商业的一定发展，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第三，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也是民主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

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实行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对于统一战线之

扩大都起了推动作用。相反，革命事业就要受到损失。例如，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对民族工商业实行罚款、没收，片面强调工人福利等“左”的政策，结果，造成了根据地工商业萧条，工人失业，不仅给根据地的经济造成了困难，而且政治上不利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利于团结广大小资产阶级。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中也曾经出现过没收和平分工商业的现象，结果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为了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必须严格区别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必须把对资产阶级中右翼分子的反动倾向的打击同经济上消灭区别开来；必须防止过高的劳动条件和过高的所得税；必须防止土改中侵犯工商业者的错误，坚决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同时，也要防止不加限制，任其自由泛滥的右的偏向。

100. 什么是政策？在解放战争转入反攻后，毛泽东是怎样论述正确执行政策的重要意义的？

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从而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贯重视执行党的政

策的重要性。一九四七年底，当解放战争转入反攻后并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形势下，党和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正确执行政策的极端重要意义。当时，随着解放战争转入反攻后，新解放区迅速扩大，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普遍展开，在一些地区的工作中发生了“左”的和右的偏向，主要是“左”的偏向。其主要表现是：（一）在土地改革中，扩大打击面，把没有或只有轻微封建剥削的中农，划到地主、富农里去，侵犯了中农利益；（二）侵犯民族工商业，出现了要求平分民族工商业和社会上一切财产的绝对平均主义错误；（三）在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四）在镇反中，出现了乱打乱杀的现象，不注意区分恶霸、非恶霸和大、中、小地主的界限等。为了纠正上述错误偏向，毛泽东在党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上，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又陆续发表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工商业政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重要文件。其基本思想是：

第一，论述了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96页）

“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84页）

第二，重申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

策。毛泽东指出，许多同志所以在工作中发生“左”的或右的偏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时，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我党进行一切工作的总的根据。如果忘记了总路线和总政策，在贯彻执行具体政策时，就会成为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就会迷失方向，左右摇摆，使革命遭受损失。毛泽东重申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是通过各项具体政策去实现的。因此，党又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规定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以及其他各项政策。

第三，强调了党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斗争策略，规定了各项具体政策的界限。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时，必须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和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对象，采取有步骤的、区别对待的斗争策略，反对千篇一律的工作方法。在土地改革中，把土改地区分成为老区、半老区和新解放区，按其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工商业政策中，要严格区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没收的政策，对民族工商业必须采取保护的政策。同时，对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政治上反动倾向的打击同经济上的消灭要加以区别。在镇反工作中，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不是消灭地主个人。除少数罪大恶极分子外，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

党所制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了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尽量缩小打击面，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只有这样，才能尽量减少革命的阻力，加快革命胜利的步伐。

101. 我党是怎样指挥人民解放军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取得这一胜利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我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了战略决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我党是怎样指挥人民解放军同蒋介石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呢？

第一，正确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及时把握战略决战的时机。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即到一九四八年秋，敌我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显著变化。这时，我军已增至二百八十多万人，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和战斗锻炼，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攻坚能力大大提高。解放区的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后方巩固，兵源丰富，各主要解放区相继联成一片，可以进行战略上的直接支援。相反，敌人的总兵力已降至三百六十五万人，而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只有一百七十万人，并分别被我军分割包围于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原五个战场上，被迫实行“重点防御”。同时，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国民党内部互相咒骂，一片混乱。这种形势表明，虽然敌军在数量上仍超过我军，

但总的形势对我十分有利。我军通过组织大规模的战役，大量歼灭敌人，必将加快改变敌我力量的进一步变化，加速敌人的灭亡。因此，我军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党中央和毛泽东毅然抓住时机，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第二，党中央和毛泽东纵观全局，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曾在南京举行军事会议。会议确定的作战指导计划是，巩固华北，确保华中，东北或撤或守举棋未定。他们在战略上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据点的时间，以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以加强华中防御。党中央根据敌军意图和各战场的情况认为，如果把决战的方向先指向华北战场，我军则会受到华北、东北敌军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使我军陷于被动。如果把决战方向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因此，党中央决定首先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东北战场。在东北，我军主力部队有七十万人，地方部队三十万人，而敌人包括非正规部队只有五十五万人，并分别孤立于长春、沈阳和锦州。如果先消灭东北之敌，既可以粉碎敌军战略收缩的企图，又能利用东北工业支援全国战争。这就使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同时，又有利于全局的发展。

第三，针对三个战场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作战方针。

党中央根据东北战场的具体情况，确定的具体作战方针

是，集中主力先打锦州，置长春、沈阳之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攻打锦州就能调动敌人，迫敌决战，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进而全歼东北敌军。党中央总结了打徐州的经验，即根据淮海战场上敌军以徐州为中心，进行“一点两线，重点密集”的部署，及便于机动、迅速驰援的特点，确定我军的作战方针是，首先集中兵力歼灭位于徐州东部的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并用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阻击敌人的援兵。对于华北战场，党中央根据我军在辽沈、淮海已取得胜利，敌军已成惊弓之鸟的形势，和敌军分别困守于北平、天津、张家口三地区之特点，决定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待完成部署后再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党中央确定的上述作战方针，保证了三大战役的胜利。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通过三大战役共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大片国土，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

第二，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三大战役中，不仅有一百六十多万主力部队，七十万地方部队参战，而且还有各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援。据不完全统计，支前民工达五百四十万，担架十一万副，各种车辆八十二万辆。

第三，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地抓住了决战时机，选择了决战方向，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制定了各次战役的计划，规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军事指挥艺术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102. 为什么说蒋介石的一九四九年元旦“求和声明”是一种“和平”阴谋？

正当我军进行三大战役，蒋家王朝面临即将全面崩溃的绝境下，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在美国的支持下，极力组织其残余军事力量进行顽抗，一面散布了许多和平妥协的言论，并指使一些与革命阵营有联系的“自由主义人士”，劝说我党将革命就此止步。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还亲自出马，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不久又宣布“引退”，把副总统李宗仁推到前台。我党及时识破了美蒋反动派的这一阴谋诡计，彻底戳穿了他的“和平”阴谋。

为什么说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是“和平”阴谋呢？

第一，从蒋介石“求和声明”发表的背景看，在我军的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美帝国主义早已预感到蒋介石的失败是难以挽回了。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美国国务院和他的驻华使馆，就研究过如何改变对华政策问题。他们认为，蒋介石已“愈来愈众叛亲离”，“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意志已荡然无存”。为了维护美国在华的殖民统治，他们一面仍继续在军事上支持蒋介石，同时越来越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企图使用某些既同美国又同国共双方都有联系的人们，通过“和谈”打入革命阵营进行破坏，以挽救危局。以李宗仁为首的国民党桂系军阀就是美国选中的玩弄和平阴谋的一个工具。本来，李宗仁的桂系军阀同蒋介石之间既有一致的地方，又存在矛盾。一九四八年四月，李宗仁就在美国的支持下，违背蒋介石的意志当选为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当蒋介石面临败局已定的形势下，李宗仁便摆出主和派的姿态，更加起劲

地散布“恢复和谈”的论调，实际是逼蒋下台，力图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最高权力。而这时的蒋介石，由于人心丧尽，一面无可奈何地不得不容忍李宗仁的“和平”活动，但又极力抓住国民党的实权不放；一面又希望在“和谈”的掩盖下，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重整残军，进行反扑。这样，在美国的总导演下，李宗仁和蒋介石各怀鬼胎，便上演了一出假和平真战争的双簧戏。

第二，从蒋介石“求和声明”的内容来看，一九四九年的“元旦文告”声称：“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党的公意是从。”在这个蹩脚的声明中，蒋介石尽管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可怜相，但他的反动本质仍暴露无遗。它告诉人们，国共和谈是可以的，但是必须以保持国民党的反动宪法、法统、军队，维护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为先决条件。这当然是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容忍，也完全暴露了他的“和谈”是虚假的。就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认为，“彼已表示让步，但并未给予充分之退让。”一月十四日，我党发表声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即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等。这一声明得到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彻底戳穿了蒋介石的“和平”阴谋。蒋介石不得不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告“引退”，实际仍控制军政大权。

第三，从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后的实际行动来看，

他一面发表“求和声明”，但同时却极力加固长江防线，阻止我军南下。他还计划在三至六个月内，重新组编二百万兵力，准备反扑。此外，蒋介石政府还在昆明、上海、南京制造惨案，对要求和平的学生、市民进行镇压。李宗仁上台后，一面表示愿意以我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但是，当经过谈判拟定了《国共和平协定》让其签字时，却又加以拒绝。这就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和平”要求完全是虚假的。美蒋求和阴谋终被彻底戳穿。

我党粉碎蒋介石和谈阴谋的斗争说明，一切反动派不论在他们居于优势时，还是行将灭亡时，总要以反革命的两手对付革命人民的。革命人民必须不怕恫吓，不受欺骗，针锋相对地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才能取得胜利。

103.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从现在起要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

第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标志着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已经结束。

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党的工作重心即转入了乡村，开始了在农村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积蓄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经过二十二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已经丧失殆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

原各大解放区已经联成一片；我们已经取得北平、天津、沈阳等许多大城市。对于即将陆续解放的地区，将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占领乡村。这说明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已经终结，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胜利即将到来。这是党领导全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胜利。

第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给我党提出了新的斗争任务。

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城市后，在我党面前摆着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首先要以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要把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作为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工人和其他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政权才能巩固。同时，由于城市是敌人长期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为了搞好城市，必须学会同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学会同帝国主义作外交的斗争。我们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也要学会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学会这些斗争，并取得胜利，人民的政权就不会巩固，革命的胜利果实就会丧失。为了取得这些斗争的胜利，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一切可以同我们合作的力量。

第三，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严峻的考验。

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城市，我们党即将成为执政的党，这就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党取得了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

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向党的队伍施放糖衣炮弹。这就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为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使全体共产党员认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必须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104.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怎样规定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第一，会议分析了全国胜利后的基本国情，提出了使我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

会议认为，全国革命胜利后，我国现代化的工业只占全国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将占百分之九十。这说明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经济成分上，将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复杂的经济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在阶级关系上，中国革命在取得全国胜利，并在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还存在两种基本矛盾，一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还必须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但又必须限制其自由泛滥，因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根据以上情况，党的任务就是，努力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使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改变我国经济成分的复杂状况，并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

矛盾，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规定了实现这一转变的经济任务和各项经济政策。

会议认为，为了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首先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在党的领导下，又有社会主义的国际援助，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将可能是相当快的。在经济政策上，会议指出，由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企业而构成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它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对于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应当积极地逐步地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引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应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同时，应当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把它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为了进行经济建设，对外必须实行统制贸易。上述政策，指明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

第三，提出了保证实现上述转变的军事、政治等任务。

这主要是，采取不同方式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实现全国的解放和统一；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大力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争取和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按照平等的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只要帝国主义一天不改变敌视我国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地位。上述工作将保证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05.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是怎样论述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及其基本任务的？

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是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发表的。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深刻地总结了革命的历史经验，全面阐明了即将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性质、任务及其政策。

第一，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80页）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这个政权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因为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民主革命的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就要失败。这个政权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不论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只有工农联盟搞好了，才能团结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在刚刚建国以后还有其重要性。但是，他们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毛泽东用近百年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一切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二，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这主要是：

（一）实行人民民主，镇压反动派的反抗和破坏。毛泽东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人民有言论、集会、结

社等自由权，有权选举自己的政府。人民内部不能这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人民中有的犯了法，也要处罚和坐班房，但这是个别的情形，和对反动派专政的性质是不同的。专政是对敌人的。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但是，只要他们能接受改造，也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将消亡。但这是将来的事。目前，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必须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对于反动派的破坏行动要坚决实行镇压。

（二）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二十八年来，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不仅需要学会我们所不懂的东西，而且要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引向社会化的道路。此外，还要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和改造工作，以便将来有条件时，实现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毛泽东指出：“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86页）

（三）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毛泽东指出，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反动派的影响。他认为，国内外反动派的思想影响，不仅现在还很大，而且在长时期内还将存在，不能很快消灭。我们必须运用人民民

主专政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采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帮助人们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106. 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基本经验是什么？

中国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了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都具有伟大深远的意义。

第一，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个胜利永远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国家获得了独立，人民获得了解放。中国人民受侵略受压迫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此，四分五裂和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并为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

第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历史发展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东方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阵线，使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衰亡，社会主义的兴盛。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里首先胜利的革命，它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中国革命则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里影响最大的革命。它必然极大地鼓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斗

争勇气和胜利信心。

第三，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它又一次生动地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无论在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它都是指导人民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它在许多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提供了新结论，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许多新经验。

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是：

（一）必须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要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它要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找到适合本民族特点的革命道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百折不挠地领导人民进行坚决斗争，并勇于克服“左”右倾错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二）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建设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同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并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长期的武装斗争，就不能战胜敌人，就不能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

（三）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要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最大限度地孤立、

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革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它曾经得到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援助。但是，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首先要立足于本国革命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历经千辛万苦才取得的。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107.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国内的形势是怎样的？党面临的任务是什么？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开始了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是错综复杂的。

在国际上，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增强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斗争进一步高涨起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些都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但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仍然存在，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为了称霸世界，疯狂地推行战争政策。它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恨之入骨。为了恢复它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不仅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进行最后的挣扎，还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在国内，人民战争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盘踞在西南、华南的某些省

份和台湾等沿海岛屿，并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等待战机，卷土重来。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退时潜伏下来的土匪、特务和各种反革命分子，以各种方式在进行破坏和捣乱。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大约有三亿人口的地区尚未进行土改，封建地主阶级还没有完全打倒，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十分尖锐。在经济上，我们所面临着的国民经济，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破坏之后，又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洗劫和美帝国主义的掠夺，以至到处都是百孔千疮。在刚解放的地区，农村破产，许多工厂、矿山企业停产，投机活动猖獗，市场混乱，人民的生活十分贫困。

根据这种情况，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巩固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在军事上，必须彻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在政治上，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发动革命群众剿匪反霸，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建立革命秩序，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在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完成土地改革，彻底铲除封建地主的土地剥削制度；在对外关系上，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争取世界和平，并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以便为实现党的任务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

108.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民是怎样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武装力量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民党反动派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还保存着白崇禧、胡宗南两股反动武装。为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在建国前夕至一九四九年年底，发动了三个比较大的战役，即湘粤战役、广西战役和西南战役。

（一）湘粤战役。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兵分三路，直捣湘南、湘西及广东残敌巢穴。西路大军于十月二日攻克芷江（县名）。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解放了湘西的广大地区。中路大军，于十月三日向衡阳地区的白崇禧部队发动进攻。我军歼敌主力三个师又两个团，解放了衡阳、宝庆。东路大军，于九月下旬自赣南出发，挺进广东。十月十四日解放了广州。接着我军又将粤敌余部围歼于广东的阳江、阳春地区。至此湘粤战役胜利结束。湘粤战役历时一个月又十三天，歼敌十万多人。

在进行湘粤战役的同时，十月十七日，第三野战军解放了厦门岛，歼敌四万余人。十月中旬，第一野战军一部进驻新疆迪化（乌鲁木齐），解放了西北地区。

（二）广西战役。白崇禧部队在湘粤战役中遭受重大打击后，便向他经营多年的老巢广西逃窜。为了全歼白军，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于十一月六日，由湘、桂、黔地区分三路直捣柳州、梧州，并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解放桂

林，敌人纷纷向雷州半岛逃窜。十二月四日解放南宁，十一日解放睦南关。残敌除二万余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均被我歼灭。广西战役历时一个月零六天，歼敌十七万三千人，国民党反动派最后的支柱——白崇禧部队完全覆灭。

（三）西南战役。这是以第二野战军为主力，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于十一月一日发动的。我军迅速解放了黔东广大地区，十一月十五日解放了贵阳。十一月三十日解放了重庆。接着又和平解放了云南、西康。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对被围于成都的胡宗南部发起总攻，全歼敌军四十万，解放了成都。西南战役历时五十七天，歼敌九十万人。

从一九五〇年四月起，我军又进行了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舟山群岛。同年春，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谈判，以便和平解放西藏。经过一个月的谈判，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月十六日，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规定进驻拉萨。至此，除台湾省和一些沿海岛屿外，全部国土都获得解放，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空前未有的大统一和大团结。

109. 建国初期，我党怎样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了严重经济困难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承受的国民经济，是一个经过帝国主义掠夺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以及长期战争破坏的烂摊子。由于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军费开支很大，城市失

业人员达四百多万，农村有四十万灾民需要救济，而当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赶不上支出的需要，财政出现赤字。再加上投机资本的乘机捣乱，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初掀起了四次物价大涨风。为了战胜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党采取了一系列坚定有效的措施。

第一，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指出：在我党进入城市后，必须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做为中心。根据这一方针，在城市党依靠工人阶级，努力恢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在农村，土地改革后，积极组织农民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农业生产；在流通领域，确立国营经济在市场的领导地位，建立和发展国营商业，建立和发展供销社，加强工农业产品的收购、调运工作，保证市场的主要物资供应，并建立对市场的管理制度。

第二，坚决打击投机资本家的不法活动，稳定物价。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首先打击了最猖獗的金银外币的投机活动，并宣布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接着，上海军管会查封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法办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投机商二百三十八人，给投机资本家以沉重打击。随后，在国家控制大量物资的基础上，选择有利时机，在市场上抛售、打击投机活动。在一九四九年十月至十一月的第三次物价大涨风中，国家在上海抛售棉纱二万件，棉布三十万尺，粮食抛售仅十一月七日一天，就有九百一十多万斤，相当于平日销售量的十倍以上，从而使物价迅速下降。为了在全国控制物价，十一月二十五日，党中央部署在上海、北京、沈阳、天津、西安等大城市，将调集的物资同时大量抛售，使投机资本家遭到致命打击。

第三，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一九五〇年二月，政务院召开全国财政会议，研究解决我国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三月三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收入中的主要部分，统归国库，集中使用，争取财政收支平衡；（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把重要物资集中起来，以便调剂供求，控制市场价格，同投机资本作有效的斗争；（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把所有分散在各个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国家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从而减少市场货币流通的数量，并增加国家能够运用的资金。这三种统一，从财政、贸易、管理三个方面互相配合，避免了财力物力的分散和浪费，达到了集中使用的目的。这对于扭转当时困难的财政经济局势起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加强征收工商税和农业税，发行公债，节约开支，并储存了大量的粮食、棉花和纱布，缩减了货币流通量，从而使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从一九五〇年三月开始，物价就出现下降的趋势。六月以后，便持续稳定下来。从此，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局面。

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财政收支的接近平衡和金融物价的趋于稳定，标志着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基本上确立。这个胜利，从经济上巩固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创造了重要前提。

110. 建国后我党怎样没收了官僚资本和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完成这一任务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没收官僚资本，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迅速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是摆在我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

第一，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在新解放地区，各级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共同纲领的规定，立即全部没收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商店、银行、仓库、轮船、码头、邮政和其他企业，归国家所有。到一九四九年底，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达两千八百五十八个，拥有生产工人七十五万多人。一九五一年一、二月，政务院颁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和《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清理了隐藏在一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股份和其他应该没收的财产。这样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被彻底地剥夺了。

第二，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对于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为了避免生产的停顿和企业的破坏，我党实行了先接管下来的办法，保留原来的技术组织和生产管理组织，进行监督生产，然后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一九五〇年二月，根据政务院指示，各国营企业陆续建立了由工人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使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同时吸收原有的部分企业行政人员，保留了原来的技术人员继续为生产服务。在此基础上，清除封建把头和其他封建制度，取消原来企业中奴役工人的制度。改革企业行政领导机构，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第三，统制对外贸易和海关管理，接管和征用帝国主义在华企业。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我国政府收回了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包括沿长江和内地陆路各关），建立了对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这就把我国的大门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摧毁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权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我国政府逐步接管和征用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残存的一千多家企业，并没有没收，仍然允许其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理。可是，由于这些企业过去是依靠帝国主义的特权发展起来的，特权被废除后，它们就失掉了依靠。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以后，使这些依靠进出口商品和原料的企业，也就陷于瘫痪状态。有些企业（例如银行和洋行）无法经营下去，纷纷申请歇业；有些企业（例如开滦煤矿）的外国资本家自行放弃经营；有些企业（例如颐中烟草公司）自动转让给中国，以抵偿它们在中国的债务；有些企业则由我国作价收购，转让给我国政府。一九五〇年，美帝国主义无理接管我国在其统治区的公共财产。我国政府颁布命令，清查管制了美国在华的一切财产，征用英法在华的一些企业，使之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

没收官僚资本和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由于没收官僚资本，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这不仅完成了民主革命阶段遗留的一项重大任务，同时又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的重大步骤。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被摧毁，就结束了外

国侵略者在经济上掠夺、奴役我国的历史，保障了我国经济的独立自主。

(二) 没收官僚资本和接管帝国主义企业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111.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国初期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方针是什么？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会议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九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六人，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七人，列席会议的有四十二人。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聂荣臻等分别作了关于土改、外交、统战、财经、军事方面的报告。此外，安子文作了《关于党的组织情况与巩固党的组织问题》的发言。

第一，会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争取在三年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指出，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但还不是根本的好转。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为争取在三年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是关系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战胜帝国主义封锁和国民党破坏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的大问题。为了取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

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要做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

第二，规定了建国初期党在政治上的战略策略方针。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深刻地分析了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和各阶级的动态，阐述了党在建国初期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这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要四面出击。他指出：“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4页）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在建国初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对于巩固人民革命胜利成果，迅速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12. 建国后，我党怎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还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一)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正当全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时，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接着，美国第七舰队又侵占了我我国领土台湾，并纠集英、法等十五个仆从国，打起“联合国军”的旗号，扩大朝鲜战争。美帝发动侵朝战争的目的，是妄图灭亡朝鲜，进而侵占中国，实现其独霸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迅速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十九日开赴朝鲜前线。

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于一九五〇年十月至一九五一年五月，连续发动了五次大规模战役，共歼敌十九万余人，把美国侵略者赶回到“三八”线，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的局势。同时，我国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人民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做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和捐献飞机、大炮以及慰问志愿军和志愿军家属的活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推动了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朝中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者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举行停战谈判。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中朝人民军在三年中，共歼灭敌军一百零九万，其中美军三十九万，击落敌机一万二千二百余架。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保障了中朝两国的安全和独立，加强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与革命团结。中朝人民用劣势装备打败了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帝国主义，戳穿了美帝纸老虎的本质，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斗争胜利的信心。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

策和战争政策，对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二) 土地改革运动。在抗美援朝的同时，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在二亿六千四百万农业人口（总人口约三亿一千万）的新解放区（主要是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了土地改革的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条路线，对富农的政策，由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样做有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有利于孤立地主，使土地改革的打击面由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减少为百分之三至四，起到保护中农，使中农安心生产和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

在土改过程中，党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在步骤上，大体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引导农民发展生产等几个阶段。土地改革从一九五〇年冬开始，到一九五三年春，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尚待解放的台湾省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连老解放区在内，全国共有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和其他大批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三千万吨以上粮食的苛重地租。

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同时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

了条件。

(三)镇压反革命运动。建国初期，国内还有大量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主要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其中，仅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溃散武装就有二百多万。这些反革命残余势力散布在各个角落，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捣乱。特别是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更加猖狂地活动起来。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开始，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压反革命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高潮。

党中央制定了镇压反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即实行专门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镇反路线，制定了“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共杀、关、管了三百万反革命分子，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给蒋介石残留的反革命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这一胜利也保证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安定的社会条件。

113.为什么要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它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三反”运动，是从一九五一年底到一九五二年上半年，

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五反”运动，是与与此同时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为什么要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呢？

第一，这是为了打退资产阶级向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猖狂进攻的需要。

建国后头两年内，我国财政经济状况获得了迅速的好转。特别是由于工商业的调整，新区土地改革的迅速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由于国家建设规模的扩大和抗美援朝战争需要的工业品增加，一九五一年我国市场上出现了一派兴旺景象。不仅国营经济有了迅速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很大发展。这时，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反动本质也随之恶性膨胀起来。他们为了追求非法暴利，不惜拉拢腐蚀国家干部，里应外合地盗窃国家资财。如上海大康药房资本家王康年，设立“外勤部”，专门拉拢干部和采购人员，先后有二十五个机关六十五名干部被拉“下水”。一部分干部对资产阶级的进攻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追求安逸，不求上进，当官做老爷，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有的接受贿赂，向资本家提供经济情报，造成国家资财的严重浪费。有的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经不起考验，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大量贪污。如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凭借职权，利用盗窃机场建筑费、救灾粮、扣民工工资等手段，共贪污一百七十一万元，堕落为罪大恶极的大贪污犯。上述问题严重地败坏了党的传统作风，影响着党的威信，破坏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如不打退

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将受到严重腐蚀，我党作为执政党将受到严重损害。

第二，这是为了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和国家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

当时，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和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已经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危害。据北京、上海等九个大城市统计，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工商业户都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为。他们有的编造假账目偷税漏税，影响国家的税收。有的在承包国家建设工程和接受加工订货时，偷工减料，谎报成本，以假冒真，牟取暴利。仅北京、天津、青岛等地不法资本家承包华北军区后勤军用雨衣一项，就使国家损失一百万元。有的资本家甚至用破烂棉花做成含有大量细菌的“急救包”，用坏肉做成罐头卖给志愿军，结果造成志愿军不必要的伤亡。有些地区的资本家，甚至组成了“星四聚餐会”、“会计师座谈会”、“联谊会”等，密谋向社会主义进攻。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保护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也必须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在党内和国家干部中首先开展了“三反”运动。一九五二年一月，在全国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五反”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六月，这次运动获得了伟大胜利。

“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一次重大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在政治上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纯洁了党和国家机关的队伍，牢固地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

位，提高了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二）在经济上限制了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活动，极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工人对私营工商业的监督和管理，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这一运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大家认识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本质，增强了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能力，树立了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在社会上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114. 什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怎样理解它的基本精神？

一九五二年底，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和我国具体情况提出的。它体现了我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怎样认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呢？

第一，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这条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向全党提出的一项光荣任务。这就是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改造非社会主义工业，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在旧中国，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和落后，没有真正的机器制造业，没有现代的国防工业，是一个贫穷的农业

国。这是近百年来我国贫穷落后，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一九五二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已经恢复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但是，整个生产水平还非常低，经济仍然落后。一九五二年，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七，钢产量只有一百三十多万吨，占世界第十八位。毛泽东曾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30页）“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399页）。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由贫穷的农业国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第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农业、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建国以后的事实，特别是“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说明这种主要矛盾的转变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消灭我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使广大个体劳动者摆脱私有制的束缚，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

道路，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

第三，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路线。两者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物质基础。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的、技术的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前提。如果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的自由泛滥必然破坏社会主义工业化，个体的、狭小的农业必然在原料、粮食供应、市场、资金的积累、劳动力等各方面阻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行。

总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目的和实质，就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为解放生产力创造条件。

115.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及其重大意义是什么？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七年），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编制的，经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这个计划是实现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即比较大型的六百九十四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

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计划公布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特别是工人、农民都以实际行动为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到一九五七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地提前并超额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一九五六年就已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已经建立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包括制造飞机、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冶金设备、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等新的工业部门，在我国建立起来了。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充分说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是坚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既避免冒进，又防止保守，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经验。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充分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优越性，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

116.为什么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党怎样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是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之所以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

因为：

第一，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两条道路斗争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迫切愿望。全国土地改革的完成，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的个体私有制。广大农民生活有了改善，但仍然有许多困难。个体小农是一种分散的、落后的、不稳定的经济。由于生产条件的限制或遭受天灾人祸，有的贫下中农不得不出卖土地、借债，而一些生产条件较好的农民则开始雇工和放高利贷，成为新富农，农村很快出现了两极分化。为了避免重新遭受剥削的命运，克服生产上的困难，广大贫下中农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我们党必须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要求。个体农业经济是小块经营的，农具是古老的，收获量低，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无法兴修水利，采用新式技术，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有时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很难维持。这种小农经济，同广大人民和工业化对于粮食、棉花和其他原料日益增长的需要的矛盾，它的经营的分散性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也必须把分散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

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到一九五六年底，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它使几亿农民摆脱了几千年的私有制的束缚和被剥削的命运，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虽然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曾经出现了对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

单划一等缺点，但在这场涉及几亿人口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农民情绪高涨，农业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增产，这确实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它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中央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以及“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创造了一条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逐步过渡的形式。第一步，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这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只是人力、牲口和农具互相调剂，换工互助，还可积累些公积金，共同买牲畜，合伙开渠打井，办些一家一户所难以办到的事情，显示出互助组比单干的优越性。第二步，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它克服了互助组分散经营的缺点，有利于因地制宜地合理种植、推广新的技术。特别是实行了一定的按劳分配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还保留着土地分红，这就使一部分人可以凭借优越的生产资料而部分地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同发展生产仍有一定矛盾。第三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它取消了土地分红和工具分红，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一整套循序渐进，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步骤。它使个体农民比较自然地脱离了个体所有制，逐步地接受了集体所有制，从而避免了由于所有制的突然变化而可能引起的各种损失。

117.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及其巨大历史意义是什么？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在当时，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满足市场需要，培养技术人员，增加国家税收等方面，曾经发挥过某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的主要矛盾。这反映在我们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上，其表现为：（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可避免地要冲击和破坏国家的经济计划，削弱国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如，一九五三年资本主义工业自产自销部分，约占其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这一部分生产就是在同国营经济相竞争中而发展的。它或是同国营经济争夺原料、争夺市场；或者，在加工订货部分利用偷工减料，延期付货等办法，把国家分配的原料去制造产品自行销售，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并使社会主义经济无法控制。（二）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加紧对工人的剥削，破坏国家的劳动工资政策，束缚着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它同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起来。（三）资本主义为了追逐利润，必然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扰乱市场，助长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泛滥，同国家的经济政策相冲突，破坏农业和手

工业经济。事实说明，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在政治上，人民掌握着国家机器，不怕资产阶级造反。在经济上，强大的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民族资本不得不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着两面性。它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为此，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政治上团结、教育、改造和经济上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此外，建国以来，经过争夺市场领导权和“五反”运动等多次打击，使这个阶级的多数人认识到，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有出路。

我国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其中经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逐步实现的。一九五六年底，除台湾省以外，对全国八万户私营工业和二百万户私营商业，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失去了对企业的所有权、支配权和管理权，原企业的生产资料已归国家所有，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经营，并根据有利生产的原则进行了改造。同时，国家对工商业者在政治和人事上给予安排，在经济上定股定息。全国私股股额共二十四亿一千八百六十四万元，按年息百分之五给定息。从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算起，每年付定息一亿二千万元。国家“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37页）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缺点，

如由于划定资本家成分没有明确的标准，把一些无剥削的小商贩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也进行了改造，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界限；不适当地压缩了部分商业网点，给群众生活带来了不便；对一部分工商业者的安排和使用也不适当。但是，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第一，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成功地实现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彻底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剥削阶级。这种改造的方法、步骤和形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第二，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而未能实现的“和平赎买”。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把改造企业和改造人的任务相结合。这不仅避免了通常由于社会大变革时期难以避免的生产下降；反而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学说和过渡时期的理论。

118. 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发展生产、满足城乡人民需要以及供应出口贸易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九五二年底，手工业生产总值为七十三点一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点八。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为七百三十六万四千人。其中，个体户占百分之九十六点九。但

是，手工业经济同个体农业一样，都是分散经营，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的小生产。其中残存的封建师徒关系，束缚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个体手工业经济不仅满足不了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并出现了两极分化，而且与计划经济相矛盾。因此，必须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个体手工业者和农民一样，是小私有者，同时又是劳动者。对于个体手工业者，同样只能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和慎重的组织工作，引导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把个体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我国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组织形式上，采取了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逐步过渡的形式。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从业人员增加到六百五十八万三千人，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的百分之九十一·七。除了边远地区以外，全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与此同时，民间运输和小商小贩等个体劳动者也实现了合作化。

在手工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也曾出现了一些缺点。如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组社合并过大过多，减少了部分产品品种，对生产和群众生活带来了不便。但是，手工业合作化的完成，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它用新的社会主义互助合作关系代替了封建的和剥削的关系，打破了传统的行会观念和保守思想，鼓舞了劳动热情，从而为发掘手工业生产的巨大潜力，向生产现代化方向发展铺平了道路。第二，它使手工业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在手工业经济这个领域内摧毁了产生资本主义的

经济根源，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第三，它使广大手工业者摆脱了私有制的束缚，结束了几千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命运，使之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改善了生活和劳动条件。

119. 为什么说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是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尽管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但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因为：

第一，决定国家政权性质的不是它的组织形式，而是看它执行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从组织形式来看，是四个阶级联合的革命政权。但是，它们在这个政权中的地位 and 作用是不同的。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这个政权的基础。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体现无产阶级的意志，执行无产阶级的政策，完成无产阶级担负的历史使命。在推翻三大敌人反动统治后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建国初期，担负着彻底完成民主革命，恢复国民经济，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准备条件的艰巨任务。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人民民主专政又担负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它要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我国

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政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之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又担负着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伟大任务。这同样也是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意志及其担负的历史使命，反映了我国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必然是多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阶级和分子实行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但是，由于各个国家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条件、革命道路和民族传统各不相同，因而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组织形式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采取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这和我革命的历史特点也是分不开的。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无产阶级同它曾经建立了统一战线。因此，我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提出了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具体形式。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各民主党派，又都拥护我党提出的这一政治纲领，并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它们又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通过它继续保持统一战线的形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不仅符合我国的历史特点，而且也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是完全

符合我国国情的。

第三，既然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直接称它为无产阶级专政呢？这是因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比较更加清楚和全面地表达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内容。本来，无产阶级专政就其阶级内容和基本职能来说，就包含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民主，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从表面上来看，只有“专政”，没有“民主”，因而使人们不容易一目了然地了解它的全部内容。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不仅有“专政”，而且有“人民民主”，不只是提无产阶级，而是提人民，这就更加明确地反映了这个政权担负的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两方面的内容。而且这一提法一直为我党所沿用，并已为广大群众所熟悉和接受。因此，就称它为人民民主专政，只不过从实质上应当把它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之后，人民的范围相应地扩大了。因此，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不仅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也完全符合今后历史发展的进程。

120. 从我党同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斗争中应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在全国人民努力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我党同高岗、饶漱石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斗争。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他们分裂党的罪恶活动。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取得了这一斗争的重大胜利。

从党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活动中，应当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呢？

第一，必须坚决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高、饶反党事件说明，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全国胜利，成为执政党之后，一些思想不健康的党员很容易滋长骄傲情绪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们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的勤务员，而是追求高官厚禄，把自己看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甚至不惜采取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高岗、饶漱石最后走上反党的道路，就是由于在胜利面前，骄傲自大，权慾熏心，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高岗在东北工作期间，以功臣自居，自吹自擂，把东北做为他的独立王国。饶漱石在华东工作期间，也是不惜采用欺骗手段，企图独揽华东地区的大权。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他们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其反党活动更加猖狂。高岗认为党和政府的大权应该由他掌握，公然提出了他的改组中央和政府的方案，其反党野心达到了顶点。毛泽东在总结高饶反党事件的教训时指出，要认识骄傲的危险性，不要逞英雄，“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52页）

第二，要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同一切分裂党的活动进行斗争。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特别是在我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党担负着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艰巨任务，维护党的团结，对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更加具有重要意义。破坏党的团结，就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危害党的生命。高岗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采用挑拨离间的手段，打击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甚至散布反动的“军

党论”，把党分成所谓“根据地的党”和“白区的党”，胡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自封为“根据地和军队党的代表”，这说明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已经堕落到不惜分裂党的地步。这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一切共产党员，尤其党的高级干部，只有象爱护眼珠一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同一切分裂党的言论和行动作不调和的斗争，才能使党的事业永兴不衰。

第三，要警惕并同一切个人野心家、阴谋家进行坚决斗争。在党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高岗和饶漱石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又一个阴谋集团。这一集团的重要特点，就是他们从未提出过任何公开的纲领，而是以两面派的手法进行阴谋活动，企图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这一事件说明，在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一小撮野心家往往采取更加隐蔽和阴险的手法来实现他们的阴谋。这就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提高政治警觉性，善于识破他们的诡计；要在政治上坚持原则，光明正大，同那些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

121. 为什么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的。这是我党执政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零二十六人，代表着二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并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表现在：

第一，大会适时地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提出要把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伟大历史任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会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在新的条件下，虽然我们还必须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大会决定，今后党的工作重点要由阶级斗争为主转到主要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要依靠几亿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大会提出为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必须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经验教训，提出在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过程中，把各项计划指标放在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偏向，又要反

对不注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急躁冒进的偏向。根据这个方针，会议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促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巩固和扩大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第三，大会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会议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指出执政党地位很容易使党内意志薄弱的人滋长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以及沾染官僚主义的习气。会议还在充分肯定领袖作用的同时，提出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鉴于斯大林所犯错误的严重教训，应当继续坚决地反对个人崇拜。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深入发展，党的工作重点实现新的转变的条件下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会。它为我党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

122.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什么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是因为：

第一，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取得了政权，政治上得到解放之后，迫切要求改善物质和文化生活落后的状况。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为了实现工农群众的这种愿望，首先必须改变所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而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消灭私有制，必然遇到资产阶级的反抗，集中地表现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进行阶级斗争，才能顺利地实现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任务。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资产阶级便失去了赖以存在和产生的经济基础，作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随之解决。这时，落后的生产力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便突出起来，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为劳动人民改善经济文化生活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第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认真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才能解决其他各种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立即熄灭，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但是，无论是用专政手段镇压敌人，还是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国家的经济基础越强大，人民的生活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就会越巩固，物质文化生活越丰富，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就越有说服力。社会主义经济越发展，国防力量也越强大。由此可见，

大力发展生产力，认真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因而它就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从我国长远的历史任务来看，还面临着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尽管这个任务是将来的事，但是现在就应该为之创造条件。很显然，只有用现代化的工业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农业，才能为消灭工农差别创造条件；只有大力普及教育，提高全民的特别是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只有发展生产力，使社会财富达到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由此可见，只有认真解决国内这一主要矛盾，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123.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发表这篇讲话的历史条件和目的是：当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一套办法进行的。如何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成为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党中央于一九五六年三、四月间，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在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

在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建设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等十大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针政策，并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任务。

毛泽东论述的十大关系着重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些重要思想。

毛泽东总结了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而带来不良后果的教训，提出了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思想。毛泽东指出，这样做，一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积累，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及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指示。实践证明，这些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思想。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上，他强调要更多地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才能使国防建设有重大进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强调在统一领

导的前提下，多发挥地方积极性。这些指示至今仍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二，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十分强调在经济领域，要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发挥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调动两个积极性；在国家、集体、个人关系上，要统筹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政治领域，要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对待反革命要采取正确的政策等。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首先是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的统一战线的的作用，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和建设的大军，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提出了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的方针。

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85页）这个方

针既反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思想，强调要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以补自己之短，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时又反对崇洋媚外，一切照搬的错误思想，强调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有批判地学，批判外国一切腐朽的制度和思想作风。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九六六年四月)

124. 如何评价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工作？ 这期间我们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地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遭到过严重挫折，但是，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在这十年中，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第一，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

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

第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材和经济文化建设人才。这十年中，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几十万大学生，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经过整顿，教育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在这期间，我们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的科学技术部门，科技水平有很大提高，在某些领域，我们已经接近或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一九六四年，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导弹实验也不断取得成功。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第三，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党中央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观点，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等等。这些经验对指导当前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在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这主要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急于求成、急于过渡，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一九五九年在全党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严重的“左”的偏差，使我们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是，其中有些错误是暂时性

的，我们党一经发现，就很快做了纠正，如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的错误，一九六二年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甄别平反，为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帽子等。其中有些错误是局部性质的，如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并未成为全局性的错误。其中有的错误，如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指导思想是逐步发展的。应当指出，从一九六〇年以后，我们在经济工作上的方针是正确的，经济建设有了迅速发展。因此，必须把全局和局部、主流和支流加以区分，不可因工作中有过严重失误而否定党的工作中的主导方面。

125.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怎样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当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党和人民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一方面，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欢欣鼓舞，决心团结一致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另一方面，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熟悉，不适应，提出了究竟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等问题。为了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毛泽东发表了这个重要讲话。

第一，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

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仍然存在，但是大量的则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以及工农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等。人民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在我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敌我矛盾是在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

第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认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3）。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它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创了广阔的天地，但它又很不完善，还存在着资本

主义因素和个体私有制残余，这些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和国家机关中的某些官僚主义作风，又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所有这些，都应当不断地通过各方面的工作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日益完善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日益巩固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

第三，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指出，由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对于敌我矛盾，必须用专政的方法解决。而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即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事实证明，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企图用强制的方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没有效力，反而是有害的。对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应该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因为各党派之间互相提意见，作批评，可以经常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有利于共同进步。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应当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只有通过艺术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和科学上不同学派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当然，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都应当遵循六条标准，其中最重

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经济工作中应当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只有实行这一方针，才能恰当地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以及劳动者个人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才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更快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四，指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75页）。由于情况的变化，他要求全党必须学会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之一。讲话中提出的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它对于我国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126. 如何评价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从这次斗争中应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

一九五七年，党中央鉴于几年来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在党内有所滋长，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改进作风，决定开展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各地党组织也采取各种形式，请党内外人士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广大党员和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提出了许多善意的批评或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但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还不甘心，社会上还存在敌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势力。同时，在国际上，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出现了一股反共逆流，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整风的机会，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了进攻。他们攻击党的领导是“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要各党派“轮流坐庄”，有的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有的公然要为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平反”，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他们认为现在“共产党内部问题很大”，“形势十分严重”，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可能。这些右派分子的

言行表明，他们妄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很大。在他们的煽动和蒙蔽下，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人罢课闹事。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决定对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在全国科学文化、教育界、文艺界、新闻、体育界和民主党派内展开了反右派斗争。到一九五八年春，全国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上述情况表明，在当时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对于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采取适当的步骤进行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通过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大是大非，巩固了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了党的领导。

但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不适当地支持了党外人士提出的所谓“大鸣大放”，进而造成了全国紧张的动乱气氛，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在反击中，又采取了错误的斗争策略和政策，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表现在：第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把一大批说了错话，或者给党的领导人提了些意见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据统计，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达五十五万多人。第二，处理上过重。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普遍的降低工资，有的在本单位监督劳动，有的被开除公职，送到农村或回原籍劳动。第三，被错定为右派分子的同志中，许多人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科技人员。他们从反右派斗争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受到错误对待，未能发挥其专长。反右派斗争后，国家和党内民主生活

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这对于全党、全民和被错定为右派分子的个人，都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

第一，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它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必须坚决把工作重心由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变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来。

第二，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当社会上出现某种涉及人数众多的反动思潮的时候，尤其要采取慎重的态度。

第三，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广开言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正常进行。

127. 应当怎样全面地评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

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条总路线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党的八大精神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全国广大农村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热潮。与此同时，全国工业、科学、教育、卫生等各条战线也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新气象。我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明确地规定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集中地表达了全国人民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迫切要求，反映了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努力。它所提出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从这条总路线的形成来看，它是在“反冒进”过程中形成的。三大改造的胜利，使党内一部分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在经济建设上出现了不注意实际可能，只顾贪多求快的“左”的倾向。一九五六年，周恩来、陈云等曾纠正这种冒进倾向，妥善地安排了一九五七年的经济计划，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但是，毛泽东却在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连续错误地批评了“反冒进”，提出只许“反右倾”，这就使党内不注意客观经济规

律，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情绪滋长起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是在这种“左”倾情绪逐渐发展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内容只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要求，而没有提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它只提“多快好省”，而没有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此外，它还受了反右派斗争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左”的影响，提出了继续进行政治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这条总路线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夸大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不注意客观经济规律，不注意客观实际可能和经济效果的缺点。

第三，当时，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宣传上，许多文章把“高速度”说成是“总路线的灵魂”，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提遵循客观规律；强调“政治挂帅”，“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提按劳分配，夸大政治思想的反作用；强调“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企图用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方法搞经济建设等，这些都使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思想更加蔓延起来。特别是在这条总路线提出不久，就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28.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主要错误是什么？庐山会议前党中央是怎样领导全党纠正这些错误的？

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的“大跃进”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轻率地发动

起来的。其特点是脱离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主观地制定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在经济建设中大搞群众运动，企图实现不可能实现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其主要错误是：

第一，脱离实际可能，主观地提出生产高指标。在八届三中全会和南宁会议连续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许多地区已经开始提出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后，全国各条战线普遍提出了“跃进”计划，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同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对工农业生产形势估计非常乐观。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决定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即比一九五七年的钢产量翻一番。同时，对农业生产也提出了高指标，要求粮食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九百零一亿斤提高到七千亿斤。从此，各条战线都纷纷制定了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生产指标和“超英赶美”的“跃进”计划。

第二，违背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瞎指挥。北戴河会议以后，把钢产量翻一番作为全党全民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但是，由于一九五八年已经过去八个月，而钢的实际产量只完成了四百五十万吨，剩下四个月要完成六百二十万吨。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提出了全民大办钢铁的措施。从一九五八年九月下旬开始，在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九千万人参加了大办钢铁，完全打破了科学办钢铁的常规。为了确保“钢铁元帅升帐”，基本建设投资一年之内增加近一倍，职工也增加了两千万人，许多企业“停车让路”，再加上电力不足，许多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这样，国民经济的比例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不仅如此，当时正

值秋收季节，由于大办钢铁占用了大批劳动力，再加上抽调大批劳动力去搞深翻地，结果误了农时，造成丰产不丰收。

第三，浮夸风严重泛滥。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制定的高指标，本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由于在“反右倾”的政治压力下，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遭到空前破坏。各条战线纷纷竞放“卫星”，弄虚作假的现象普遍出现。“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唯心主义口号盛行，浮夸风之盛达到怵目惊心的地步。

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在北戴河会议后普遍开展的。它的主要错误是急于过渡，造成了“共产风”的泛滥。北戴河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在农村普遍建立工农兵学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并把这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看作即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到年底，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社，合并成两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一亿二千多万，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九，平均每个公社四千六百多户，有的甚至一个县成立一个公社。在公社内部，一切原农业社的公有财产，社员自留地、房基、牲畜、林木等统统归公社所有。公社、大队无偿地从下面抽调劳动力、资金、物资。不久，又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兴办公共食堂。这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闹得农民人心慌慌。杀鸡宰羊，瞒产私分，农具损坏，牲畜死亡现象普遍发生，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再加上高估产，多征购了二百亿斤粮食，这就使当年冬天个别地区发生了饥荒，一九五九年许多地方饥荒更加严重。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左”倾错误有所察觉，并领导全党对已经认识到的错误

加以纠正。为此，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九年三月，党中央连续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八届六中全会和第二次郑州会议等。其主要内容是：

（一）批评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思想，强调要划清这两种过渡的界限。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将来即使达到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就是共产主义。这两种过渡都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所需时间是相当长的。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党中央对目前人民公社的体制，规定为“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生产大队）为基础”。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并可以保留宅旁树木、小农具、小家畜等，还可以经营一些家庭副业。

（二）批评了陈伯达等鼓吹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主张，强调要纠正“共产风”。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既要发展直接满足本身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生产。那种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实行产品调拨，实质是要剥夺农民。第二次郑州会议又强调一定要清理“共产风”问题。

（三）肯定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第一次郑州会议批评了那种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指导下，否定按劳分配的主张，指出，等级制度的残余，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要破除；经济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要保护。八届六中全会也指出，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但是在这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是在坚持“大跃进”的前

提下，对某些“左”的政策和“左”的倾向进行纠正的，还没有认识到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毛泽东虽然批评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急于过渡”思想，但仍然主张“趁穷过渡”，设想三十年左右过渡到共产主义。因此，这个时期对“左”倾错误的纠正是不彻底的，而且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又对一九五九年的生产提出了高指标。

129. 应当如何评价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是党中央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到八月十六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会议的原定议题是继续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工作，纠正已经发现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把国民经济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同时他指出，不讲缺点，否认矛盾，就不能改正错误。他要求大家讨论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庐山会议前期力图纠正“左”倾错误，其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庐山会议的后期则是错误的。这表现在：

第一，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七月中旬，会议在讨论会议纪要时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纪要对一九五八年的严重“左”倾错误估计不足，有人则认为纪要没有反映鼓足干劲的面貌，问题写得太多。在此期间，彭德怀在西北组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十四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根据调查的材料，实事求是地陈述了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认为“大跃进”的速度太快，生产指标过高，人民公社办早

了，“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对这封信做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于十六日批发给会议讨论。七月二十三日，会议对彭德怀进行了错误地批判和斗争，指责他那封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八月一日，中央常委会又算了彭德怀的历史旧帐。会议由反“左”而急转为反右。

第二，会议还错误地批判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由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曾在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因而也受到批判，称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是所谓“军事俱乐部”。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庐山会议后，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了错误的处分决定。

第三，会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当时，凡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问题发表不同意见的同志，都受到追查，有些则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他们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打击。这场“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130. 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的内容是什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哪些经济成就？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由于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出现了严重困难。主要表现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建规模过大，粮食缺乏，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举行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

“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业内部、生产与基建、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充实那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塑料、化纤等新兴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

“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通过调整，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使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从一九六一年起，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了贯彻“八字”方针进行了艰苦的努力。调整工作首先从农业开始。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农村，对“共产风”、公共食堂以及人民公社体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

础上,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等。这一系列条例与“八字”方针相辅而行,使各项工作开始走向正规。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央政治局又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即中南海西楼会议),研究了调整工作的形势,确定了进一步发展农业,压缩基本建设,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到一九六二年八、九月间,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结束了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党的“八字”方针指导下,到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主要表现在:

(一)国民经济经过调整,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工农业生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水平。一九六五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

(二)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基本恢复正常。国民收入一九六五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二点七。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粮食、棉布、食油、猪肉的消费量接近一九五七年的水平。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高兴。

(三)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我们还清了苏联的全部债款和应付利息(主要是抗美援朝期间的军火债款)。

(四)文教、卫生、体育、科技、国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经过整顿,教育质量有很大提高。卫生、体育工作同时

期也有显著的进步。科学技术工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我们已经拥有一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些科研成果,被公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一九六五年五月,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二颗原子弹。

131. 怎样估计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是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人民解放军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因而又把这次会议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加强团结,以保证“八字”方针的贯彻,迅速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这次会议的主要成绩是:

第一,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在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讲了话。他在肯定各方面工作成绩的同时,指出了近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主要是: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太长,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不协调;农村人民公社实际工作中存在一些错误,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了不适当的过急的变动。

第二,会议结合近几年来的工作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系统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调了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极端重要性。他还就近几

年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央各部委、各大区、省委的负责同志，也都分别作了自我批评。会议还提出为“反右倾”中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了帽子。

这次会议由于历史的局限，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它没有从指导思想上认识和纠正“左”的错误，也没有承认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没有给这些同志平反。但是，总的说来，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它对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对统一全党的认识，加强党的团结，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132. 为什么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有了新的发展？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会议研究了经济工作和党的建设问题。会议认为国民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但目前还存在困难，需要全党团结一致，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继续调整国民经济。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商业工作、粮食问题以及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加强党的监察工作等几个文件。这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展国民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次会议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发展了“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

错误论断。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要求全党对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我国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第二，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当时有些农村地区曾经出现了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的作法。邓子恢进行调查后，批评了某些作法，肯定了农业集体经济应实行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即由生产队向作业组实行包工，同时把田间管理和一些不便集体劳动的技术活包到户，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但是，会议把这一巩固集体经济的正确主张，说成是“鼓吹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因而受到批判。这就给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损害。会议批判的“翻案风”，是指会前彭德怀按照组织原则对其错误决定提出的申诉，要求全会重新审查。但会议把这一正当行动，说成是“翻案活动”，并且成立专案委员会进行审查批判。这就使当时的甄别工作（纠正一九五九年反右倾错误）不能进行到底。

第三，会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开始引入文化思想领域。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小说《刘志丹》，武断地说这部小说是“为高岗作宣传的”，是“反党活动”。会议还批判了曾经支持过这部小说创作的习仲勋等，并成立了专案组。会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在意识形态领域便发展起来。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经济学界的一大批著作

和作者，被作为反党作品和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后果。

133. 应当怎样评价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在农村和城市少数基层单位开展的一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又称“四清”运动。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许多地方根据会议决议精神，向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有的地区结合具体情况，开展了以清账目、仓库、财物、工分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这对于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产生的经济混乱，某些社队干部中存在的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项工作却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而步入歧途。这表现在：

第一，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左”倾错误的估计。

一九六三年五月中旬，党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这个文件把阶级斗争的范围极力夸大，并把纠正“左”倾错误中实行的某些正确政策也误认为是资本主义，说“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并列举了九种表现。文件强调指出，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要求各地放手发动群众，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

九月下旬，中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中，虽然指出了在“四清”运动中必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对广大基层干部要一分为二；规定了“四清”运动必须同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等，但是，由于这个文件仍然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致使“左”倾错误又有发展。

第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一批基层干部。

在开展“四清”运动的社队，由上级派去工作队，搞“人海战术”。工作队到达后，抛开社队的党组织，使干部一律靠边站，人人“上楼洗澡”。特别是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错误地提出农村基层组织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致使各工作队普遍实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重新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等错误作法。在运动中，对干部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把一些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去处理。再加上许多材料是颠倒是非，通过逼供信搞出来的，因而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严重地打击和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第三，错误地提出了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文件虽然纠正了城乡社教运动中一些错误作法和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等错误，但是，它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左”的概念，并且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

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这就进一步发展了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

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的同时，在城市的部分工厂和一些单位也开展了社教运动。同样，由于对这些单位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扩大化的估计，并以“白银厂事件”为典型，推广了一套错误做法，结果都不同程度地犯了“左”倾错误。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仍限制在局部范围。全党的主要注意力仍放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生产上。

134.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产生失误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什么？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时期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都归咎于毛泽东个人。回顾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我们的主要错误，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急于过渡；二是经济建设方面的急于求成。发生这些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还缺乏经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都不可能不经过艰难曲折。到一九五八年，新中国成立不到十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各环节还很不完善，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对于如何依据中国国情进行建设，还在刚刚探索。在这种情况下发

生一些失误是难以避免的。

其次，在工作中违背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胜利，使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看得十分简单，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迅速解决。这就产生了不考虑实际可能，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

再次，党内政治生活和优良传统遭到破坏。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关系全局的大事，没有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全面铺开，许多重大措施，未经各级干部、专家和群众讨论和科学论证，就付诸实施，这就必然造成瞎指挥。再加上在经济建设中大搞群众运动，特别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这就增加了纠正错误的艰巨性。

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失误中，我们应当吸取的主要教训是：

第一，在经济建设中，一定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论革命或者建设，单凭主观愿望和热情是不够的。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掌握经济规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少走弯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第二，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那种脱离生产力实际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的急于过渡，那种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规模越大越好的错误想法，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反而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我国地广人多，情

况复杂，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决不能“一刀切”，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加以区别对待。

第三，经济发展的速度必须从客观实际可能出发。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人们希望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快摆脱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可能。事实证明，脱离客观实际可能，盲目追求所谓“大跃进”，必然欲速则不达，出现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造成困难，反而降低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九七六年十月)

135. 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一)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后，毛泽东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更进一步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在“四清”运动中，他又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错误观点。并且他认为，走资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从地方到中央的党政军各部门，都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本来“四清”运动已经打击了一大批基层干部，但在毛泽东看来，还没有触及省、市、中央的某些干部，因而认为“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种“左”倾错误观点，我们党都接受了，并且认为是~~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愈演愈烈，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

(二)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第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适用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现成的答案。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任务，只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加以解决。在探索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而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时，很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并且习惯于沿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对待，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第三，由于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使权力过分集中于个别领袖人物手中。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削弱和破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毛泽东在党、军队和人民中有无比崇高的威信，对毛泽东个人的过分颂扬逐渐出现，把他放在党和人民之上的错误宣传日益增多。他在胜利面前，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日益产生，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我国原是一个长时期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党对封建剥削制度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但是，没有对广泛存在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残余影

响进行系统的批判。“一言堂”、家长制、个人崇拜等封建主义遗毒还在影响着人民和党，甚至党的领袖。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我们又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缺乏应有的权威。这就使党和国家很难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136.为什么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三）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四）“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等等。历史已经证明，由这些主要论点构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第一，它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早就指出：“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

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10—111）这就是说，一切政治革命归根到底，都要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围绕着所有制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力的发展。而“文化大革命”则根本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因为这时政权不仅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手中，而且已经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已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我国的主要上层建筑——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是与经济基础基本相适应的。因此，“文化大革命”所要进行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它的经济基础，也不可能有政治基础，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革命，而是人为的一场大动乱。

当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仍然需要进行各方面的革命。因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直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但是，这种革命的客观条件根本不同了，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和经济命脉；所要解决的矛盾的性质根本不同了，在消灭阶级后，虽然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国家的中心任务已经是发展生产力。这些革命不能也不应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应该在党和国家政权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

级的革命，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

第二，它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一）他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分析，并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策略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这实际上否认了建国十七年来大量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伟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否定了毛泽东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混淆。“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等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走资派”，都是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和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在发动和依靠群众，实际上是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组织生活，党长期所依靠的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和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而只能造成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事业的破坏，造成党风、社会风气的破坏，给党、国家、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由上可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137. 为什么把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作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一九六六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五月十六日，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错误地宣布撤销由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重新设立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于同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召开的。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未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会议决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调整，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领导人降为第八位；林彪被提为第二位，会后还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为什么把这两次会议作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呢？这是由于：

第一，这两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集中体现了毛泽东一整套“左”倾错误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首先，它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主观臆断。《通知》把我国社会主义现实描绘得一团漆黑。说从中央各机关到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军和文化界，都混进了一

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把党领导下的意识形态领域，说成是“社会上一切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把当时的“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十三个方面”（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说成是“黑线统治”。这些分析根本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党的方针、政策和广大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绩。其次，《通知》规定的革命对象是当时根本不存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十六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明确地提出“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再次，规定了一整套错误的斗争方针与方法。《通知》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把同被批判者的关系，说成“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要实行“独裁”、“清洗”，“夺取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实行对“各个文化领域里的专政”等。《十六条》提出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法。由此可见，这两个文件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

第二，五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所谓“中央文革小组”。五月二十八日即宣布由陈伯达任组长（不久由江青代理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为副组长。这个小组名义上是“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但实际上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夺取了处理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

大权，成为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一个特殊机构。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林彪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增长了他在中央的权力。这就给林彪、江青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以可乘之机。

第三，在两次会议的错误理论和方针的指导下，开始了全国的大动乱。五月政治局会议后不久，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首先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称它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宣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反”，发生许多混乱现象。一场全面性的，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便发动起来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到处揪斗“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全国内乱日益严重。

138. 怎样评价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尚未成立，一大批革命老干部被打倒，绝大多数党员尚未恢复组织生活的不正常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名，代表党员约二千二百万人。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并讲了话。大会的主要议程是，林彪代

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这次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它表现在：

第一，大会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的肯定。

在政治报告中，极力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对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强加了许多罪名，硬说“文化大革命”“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了我们的党”，大肆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报告还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贡献”。党的九大通过了政治报告，这就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第二，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它的总纲部分不仅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完全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尤其严重地是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完全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是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完全不相容的，也是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此外，它还砍掉了党员的权利以及八大党章中关于坚持群众路线、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坚持集体领导等正确思想。

第三，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中央的地位。九大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二百七十九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五十三人，不到总数

的五分之一（不到原八届中央委员一百六十三人的三分之一）。林彪、江青一伙的不少亲信和骨干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野心家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江青及其同伙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也都进入政治局，掌握了实际权力。他们在政治局中占了半数以上。不少老同志如李富春、陈云、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以外。这就使在此以后对“左”倾错误的斗争更加艰难。

139. 我党是怎样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的？

林彪是一个靠鼓吹“现代迷信”起家的野心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死党，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互勾结。他们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并篡夺了部分军队领导权。在党的九大，他又被定为“接班人”。接着，林彪一伙便进行了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我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同林彪一伙进行了坚决地斗争，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第一，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粉碎了林彪一伙抢班夺权的阴谋。

党的九大后，林彪并不满足于党章规定他为“接班人”的地位，实行自然接班。他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可能超过自己，因此乘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进行了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林彪为了抢班夺权，曾经企图通过“合法的手段”即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先成为国家主席，然后

再窃取党的主席。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本人也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一伙见其阴谋不能实现，便大造“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舆论。林彪于四月十一日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被毛泽东否定。接着，陈伯达在林彪的支持下，到华北各地进行反革命游说，扩大他们的反革命力量。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和黄、吴、叶、李、邱多次密商。他们的基本策略是：以称颂毛泽东为“天才”的办法继续骗取信任，实现抢班夺权。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为了实现其抢班夺权的野心，在开幕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大讲毛泽东是“天才”，要设国家主席。同时，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也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编选、经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陈伯达并抢先发出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他们煽风点火，制造谣言，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人反对提毛主席是天才”，从而制造了一场混乱。二十五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二十三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戳穿了陈伯达炮制《论天才》，“称天才”的野心，给林彪一伙以沉重的打击。至此，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遭到失败。这次会议成为林彪集团阴谋破产的开始。

第二，粉碎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

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宣布了中央改组华北军区的决定。一九七一年一月下旬华北会议结束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各种形式，对黄、吴、叶、李、邱等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改邪归正。但是，党的严肃批评和耐心挽救，并没有改变林彪一伙的反动本质。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就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三月二十二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策划武装政变，谋杀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三月底，林立果建立了实施《“571工程”纪要》的指挥班子。党中央决定在一九七一年国庆节前后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工作由周恩来统筹安排。林彪一伙认为，“三中全会可能把林彪端出来，那就是摊牌了”。九月初，林彪终于撕下了一切伪装，悍然制定了实现其反革命阴谋的具体计划：（一）杀害南巡途中的毛泽东，以“接班人”身分宣布“接班”；（二）如第一项阴谋不成，即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发动内战；（三）或北逃苏联，待机再起。

八月中旬到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九月五日、六日，林彪、叶群从他们的党羽的密报中获悉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内容，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八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此时，毛泽东在杭州已警觉到情况异常，因而采取了

果断措施，改变原来的行动路线计划，使林立果一伙决定在上海谋杀的计划破产。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回到北京。这一消息使林彪一伙十分震惊，连忙准备实施第二个阴谋计划。林彪准备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并将256号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等使用。但由于党中央对林彪一伙的异常活动已有察觉，在周恩来的主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追查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又一次打乱了他们的预谋。林彪眼看阴谋败露，惊慌失措，于十三日凌晨，带着妻儿及个别死党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终于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被粉碎，其意义在于：（一）它使我国避免了一场历史的大倒退，使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这是我党的重大胜利。（二）它使我们党和国家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特殊情况下，林彪一伙野心家的反革命活动遭到可耻的失败，这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是不可动摇的。

140. 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提出了哪些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正确主张和措施？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协助毛泽东在全党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组织上，清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中的大小“舰队”，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一部分军权。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了纠正“文化大

革命”错误的正确意见，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首先，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实际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一九七三年八、九月间，周恩来在多次讲话中提出：

“左”的批不透，右的还会来。根据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于十月十四日发表的《无政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斥责了林彪以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鼓吹的形形色色的极“左”论调。在当时，对于极“左”思潮的批判，虽然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它已接触到“左”倾错误。经过批“左”，逐步澄清了一些是非，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左”的影响，因而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同。

其次，周恩来着重抓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生产工作。针对“左”倾思潮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和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一九七二年四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正确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的文章，批判了抓生产就是“生产第一”，业务抓多了就是“业务挂帅”等谬论，明确指出：“生产和业务，不但要抓，而且要抓紧，这是毫无疑义的”。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各项经济政策，表达了周恩来恢复党的八大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接着，他又提出了一系列整顿国民经济的措施。主要有：（一）强调提高产品质量。（二）提出在农业生产中要

坚持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提出“不要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三）强调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特别要注意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四）重申了人民公社六十条仍然有效，重新制定了“工业十条”。由于各地执行了上述正确的政策，使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一九七三年，钢产量达二千五百万吨，结束了十年徘徊的局面，粮食产量达到四千八百亿斤。

第三，抓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政策，进行了干部的解放工作，对一些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对一些尚未解放、尚未工作的干部进行了安排。一九七三年四月，曾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邓小平复任副总理。一九七四年九月，中央发出通知，为贺龙恢复名誉。周恩来带着重病参加了追悼会，并为贺龙致悼词。

第四，抓了教育、科研工作，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的教育和研究。一九七二年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这对于扭转当时只要劳动、不要学习，只要批判“走资派”，不要学习理论的“左”倾做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时期，全国大、中、小学都着重抓了基础理论的学习，教育质量有了一定提高。

在周恩来主持下所实行的上述政策，使各项工作都收到一定成效。江青一伙拚命攻击这些做法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便指使《文汇报》以上海工人名义召开座谈会，攻击《人民日报》的文章是“大毒草”，并整理成材料上报毛泽东。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随后《人民日报》内部开展了批判“右倾回潮”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接着，江青一伙在经济战线上开展了所谓“反复辟”的斗争。对于恢复一些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他们攻击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不能正确对待”。对于教育科研领域里加强基础理论的正确主张，他们大肆追查后台，大搞“反回潮”斗争。这样，各条战线刚刚出现的转机又遭到了摧残。

141. 怎样评价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大于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二百四十九人，代表二千八百万党员。毛泽东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

第一，大会错误地肯定了九大的路线，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在政治报告中认为，“九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

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因而得出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错误结论。在十大通过的新党章中也完全肯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文化大革命”。不仅如此，这个党章还增加了一些新的错误，如提出“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要求党员具有“反潮流”精神等。这就使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第二，政治报告揭露、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报告指出，林彪一伙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但是，由于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再加上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不许批极“左”，这就使“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和揭露，也没有真正从根本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第三，大会虽然清除了林彪集团的一批成员，但在组织上又使一大批“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混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特别是让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在中央领导机构中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并且几乎控制了全部舆论工具。这就为“四人帮”准备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造成了条件。当然，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也选进了一批久经考验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和打击的老同志，这也增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力量。

142. 什么是“批林批孔”运动？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这一运动中搞了哪些阴谋活动？

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实际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实行正确措施的猖狂反扑，是“四人帮”一伙为打击周恩来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阴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重要步骤。

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正确措施，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对此，江青集团恨之入骨。一九七三年秋冬，江青利用深入批林的时机，下令编写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经毛泽东批准，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一号文件下发。从此，“批林批孔”运动就在全中国城乡开展起来。江青一伙在这一运动的阴谋活动主要是：

第一，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讲话，对中央领导同志进行诬蔑。江青在大会前后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亲信到某部防化连送材料，煽风点火，妄图搞乱部队。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大搞影射史学。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的写作班子写的反动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他们极力叫嚷法家主张革新、进步、爱国，儒家主张倒退、复辟、卖国，借批判孔

子的“克己复礼”，含沙射影地把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所实行的纠正“左”倾错误的政策和措施，攻击为“复辟”

“倒退”。他们借批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解放干部，重新安排工作的部分老干部，影射为“逸民”。

“四人帮”还把我国的历史歪曲为“儒法斗争史”，胡说“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将来”。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随后江青去天津，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还指使亲信写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此后，他们猖狂地大批“周公”，批判“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在军队里大搞“放火烧荒”，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叶剑英和其他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

第二，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大造反革命舆论。当时，党中央正酝酿召开四届“人大”。“四人帮”一伙把这次会议看作窃国篡权的极好机会。于是，他们以“法家领导集团”和“正确路线代表”自居，为其上台大造舆论。六月，江青连续三次跑到天津，拚命吹捧吕后、武则天，并露骨地宣称：“在原始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充分暴露了她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

毛泽东对于江青一伙的篡权活动，曾多次进行了批评。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

问题。毛泽东还严厉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帽子”，打击了“四人帮”的篡权反党活动。

143. 我党怎样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组阁”阴谋？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为在最近期间召开四届人大发出通知。蓄谋已久进行窃国篡权的“四人帮”一伙认为时机已到，为了实现其“组阁”阴谋，在此前后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鉴于周恩来因病住院，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给江青一伙企图在四届人大“组阁”夺权设置了一大障碍。十月十七日，“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对邓小平进行攻击。他们借口“风庆轮问题”抢先发难。“风庆轮”是国产的一条万吨轮。它战胜艰险，远航欧洲，胜利归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四人帮”却别有用心地利用用船部门在验收过程中同造船部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无限上纲，诬蔑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是“瞧不起国产的东西”的“崇洋公司”，宣称“背后有中央的人”，要追“后台”，大闹政治局。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恶毒诬蔑周恩来和邓小平搞“卖国主义”，是“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高级走资派”等，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北京钓鱼台密谋策划。十八日，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他们诬蔑“周总理住院并不是养病”，“而是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

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他们还造谣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诬蔑周恩来、邓小平等象林彪在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一样搞篡权活动。

王洪文的一派胡言，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警告王洪文不要同他们混在一起，回去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四人帮”这一阴谋失败后，又由江青出马，给毛泽东写信告状。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亲笔批示，告诫江青：“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并指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再一次严肃指出：“江青，一、不要出风头。二、不要乱批东西。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你们看她有没有野心？我看有。”江青受到批评后，气急败坏，但野心不死，于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时，又托人向毛泽东要官，她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再次揭露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的批评，又一次严重地挫败了江青一伙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重病中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出

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组阁”阴谋彻底破产。

144. 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是怎样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

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四届人大闭幕后，周恩来病重，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他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第一，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批林批孔”运动煽动无政府主义，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再一次遭到破坏，交通堵塞，生产下降，财政收支出现赤字。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根据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相继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对各条战线进行了整顿。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首先进行整顿的徐州铁路局，经过一个多月，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他各条战线和地区，也根据文件精神开始了整顿工作。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反复强调：各企业、各单位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等。整顿工作迅速收到了效果，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

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

第二，努力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为了使整顿工作有所遵循，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先后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汇报提纲》。这些草案指明了各项工作整顿的重要性以及应采取的政策和措施；针对“四人帮”的种种谬论，论证了革命和生产、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政治和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红与专、理论和实践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证关系。这些工作是继周恩来一九七二年进行整顿工作后作的又一次努力，实际上就是要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从而着手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

第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多次批评。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并强调指出：“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针对“四人帮”摧残党的文艺事业的罪行，毛泽东在七月十四日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者来信写了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些指示，有力地挫败了“四人帮”利用影片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阴谋。

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初，毛泽东对于他采取的一些整顿措施是支持的。但是，当邓小平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时，他就不能容忍了。八月到十月，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给毛主席两次写信，揭露“四人帮”亲信，原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的问题，由邓小平转交。这些信的内容属实，方式也是对的，但却被毛泽东认为是针对他的，有“深刻的政治背景”，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十一月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清华大学发表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文章，从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开展起来。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会议提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文章，对邓小平展开了围攻。他们诬陷邓小平抓生产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硬说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是“翻案复辟的组织措施”，“全面整顿就是全面复辟”。他们极力攻击《论总纲》、《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汇报提纲》是三株“大毒草”，硬加上“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等等大帽子。“四人帮”还炮制了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纲领，鼓吹“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由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是一般客观规律”，硬是把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打成“不肯改

悔的走资派”、“还乡团”，并在全国科技、教育、卫生等各条战线掀起层层掀“正在走的走资派”的恶浪，鼓吹专政机关要“镇压走资派”、军内“要揪出走资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展，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145. 怎样认识天安门事件的伟大意义？

天安门事件，是一九七六年四月清明节前后，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又称“四五”运动。它是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人民革命运动。

第一，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无比仇恨和坚决反抗不可遏止的总爆发。

天安门事件以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为主要内容，并不是偶然的。广大人民群众从实践中认识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周总理，一生为党和国家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并为尽量减少损失，保护党内外广大干部尽了最大的努力，因而受到全党全民的无限崇敬。周总理病重之后，邓小平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许多成绩。而“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祸国殃民，早已激起天怒人怨。广大群众经过思索，认识到他们鼓吹的“社会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他们所谓的“高举”、“革命”，只不过是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遮羞布。因而，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后，当“四人帮”悍然通知各地不许进行悼念活动，并含沙

射影地对周总理进行攻击时，广大群众再也不能容忍了。一场反对“四人帮”的人民斗争，在上海、南京、福州、武汉、太原、西安、郑州、杭州等城市陆续发生。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和抗议活动，则是这场伟大斗争的总爆发。

第二，天安门事件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作为一次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其规模之巨大，声势之浩大，在中外历史上是罕见的。仅四月四日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二百万人次。其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和家庭妇女。在这里，既没有谁来号召、动员和组织，也没有谁来事先确定斗争的目标和纲领，几百万素不相识的人们，汇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们以各式各样的醒目的花圈，投枪匕首般的诗文，铿锵有力的演说为武器，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四人帮”。在这里，原来曾经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挑动和分裂，长期陷于派性的人们，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团结起来；原来曾受林彪、“四人帮”反动宣传所迷惑，一度上当受骗的人们，也分清了敌我，幡然醒悟；过去曾暂时陷于徬徨、悲观的人们，从这里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汲取了继续战斗的力量。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虽然由于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这一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逮捕了二百多人，并宣布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职务，但是，天安门广场的诗文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在流传。这一事件在全国越来越多的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运动，在实际上成为决定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胜负的群众力量的一次演习。它为十月的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群众基

础。

146. 为什么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建国后党内隐藏最深、欺骗性最大的一伙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一伙相互勾结，凭借窃取的部分权力，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破坏活动，使我们党和国家陷入危难之中。

在思想上，他们完全颠倒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他们大肆鼓吹可以随心所欲地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变革和改造，宣传天才决定论，阶级斗争永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把人们的生产活动诬蔑为所谓“唯生产力论”等等。这样，他们就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冒充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用封建法西斯主义冒充社会主义，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在政治上，他们捏造“阶级关系新变化”的谬论，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继续革命”的对象，把人民民主专政当作“旧国家”彻底砸烂。他们全面否定建国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辛勤劳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们依靠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投机分子为骨干，对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夺权，向全体人民实行“全面专政”，造成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极端反常的政治局面。

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用阶级斗争代替

生产斗争。他们攻击实现四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把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攻击为“崇洋媚外”。他们煽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用平均主义代替按劳分配，鼓吹“穷过渡”，导致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破坏。

在文化上，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地毁灭文化。他们鼓吹文化领域里的“全面专政”，取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消了人民的言论，出版、教学、科研、创作、表演的自由。他们鼓吹“知识愈多愈反动”，吹捧“白卷英雄”，消灭历史文化遗产，破坏社会主义文化。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

在组织上，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机构。他们煽动派性，使派性活动在党内和军内合法化，建立他们的帮派体系。这就造成了党、政、军和群众中的分裂，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总之，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是妄图从根本上搞垮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国家，建立封建法西斯统治。特别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一伙认为时机已到，急于发难。九月十一日，他们背着中央，私自通知各地，重大问题要向他们请示报告，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十月初，张春桥提出要“镇反”、“杀人”。他们在上海下发了大批武器弹药，制定了“武装应变”计划。他们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公开发出了推翻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

措施，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47.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教训，永远引以为戒。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特别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除非发生国外敌人大规模的入侵，决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干扰而离开我们的工作重点。

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一定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因此，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决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更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进行党内斗争。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

禁止对党的领袖的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取得胜利，没有自己的领袖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但是，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这些领袖人物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要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他们的威信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和形成的。对任何领袖人物都不应当加以神化，把他放到党和群众之上，不恰当的宣传个人，搞个人崇拜，对党和人民事业，对领袖都是极其有害的。必须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在各级组织，特别是党的中央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少数人说了算，“一言堂”、家长制、个人独断专行。

第四，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全体人民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不同形式的所有权、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对于这个政治原则的背离，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律体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统一意志和根本利益。任何人，不论职位多高，都不允许破坏法律。建国以后，由于没有重视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结果使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148. “文化大革命”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党员和群众是怎样进行抵制和斗争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他们篡夺的权力，对广大党员和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但是，党和

人民并没有沉默。他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十分困难而又极其复杂的环境中，采取不同方式进行了各种抵制和斗争。尽管这些斗争没有能够扭转整个形势，其中大多数都受到挫折，但是，它表现了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纠正“左”倾错误，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二月，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表示强烈不满，特别是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但是，这场正义斗争却被“四人帮”诬为“二月逆流”。从一九七〇年九届二中全会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党和人民同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权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此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提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采取措施，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重新工作后，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

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也通过不同方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他们在困难的环境里坚持本职工作，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全国内乱日益严重，不少党员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抵制和斗争更加发展了。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从一九六八年起，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刘少奇受迫害鸣不平，提出党的领导者的“左”倾错误，揭露和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残害干部、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惨遭杀害。她是在特殊条件下党员群众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一个突出代表。其他很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信赖而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也经过不同曲折的道路而觉悟过来，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怀疑、观望和抵制的态度，许多人也因此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伟大的“四五”运动的爆发，正是人民对“四人帮”的抵制和斗争。

第三，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等

等。人民解放军在国家动乱情况下，仍然坚决执行命令，英勇捍卫着祖国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总之，正是由于党和人民的种种抵制和斗争，使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正是由于党和人民的斗争，最终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149. 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既不是革命，也不是社会进步，而是一场在特殊条件下发生的内乱。

（一）“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革命的含义是指下述两种情况：一是指先进的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改变腐朽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指政治革命。一是指变革，用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如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等。这两种意义革命的结果，都是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十分明显，“文化大革命”既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政治革命，也不是其他意义上的革命。它不是对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而是起了破坏作用。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的检

验说明：在政治上，党、政府各级领导干部都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府视为“旧政府”进行夺权，其结果是破坏和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普及，而是“左”倾思想大泛滥；不是繁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而是使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受到空前的摧残，不是破四旧立四新，而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沉渣的大泛滥。从组织上看：不是培养了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迫害摧残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耽误了年富力强的一代人的大好时光；严重地毒害了年轻的一代。从经济上看：不是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而是使我国国民经济受到一次空前的破坏。因此，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

（二）“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反革命。虽然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然而，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上看，它是党的全局性的严重“左”倾错误，而不是反革命。因为：第一，“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在他的错误理论思想指导下，并由党中央正式通过的错误决定，公开号召和进行的。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不是少数反革命分子阴谋策划的产物。这种错误又在我们党的努力下得到了纠正。第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反抗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第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确实利用了毛泽东的错

误，窃取了很大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我们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是他们终究没有夺得最高权力。经过党和人民的艰巨复杂的斗争，终于粉碎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我们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的性质都没有改变。这充分说明不能笼统地把“文化大革命”称之为反革命。

（三）“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由于对一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批斗，各种反革命分子、野心家、阴谋分子乘机破坏，敌我颠倒，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由于建国以来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了，封建主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由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受冲击、改组，混淆了是非和矛盾的性质，采取了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方法去解决非对抗性矛盾，派性发作，武斗不止，自己整自己，造成了组织上的混乱。由于党纪、国法、规章制度遭到破坏，打砸抢成风，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生活秩序受到极大冲击，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

总之，“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造成这种内乱的原因，一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一整套错误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二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而更加加剧。我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粉碎了两个反革命集团，这才消除了内乱，真正达到了安定团结。

150. 为什么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这是因为：

第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导致的。毛泽东经常提出要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他担心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为了“反修防修”最后他下决心要搞“文化大革命”。但是，由于他晚年对客观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错误估计，夸大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混淆了敌我，并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和方法，产生了不幸的后果。尽管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但他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第二，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例如，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他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党的领导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只要发现是冤、假、错案，就给予纠正。如他为“二月逆流”、贺龙、罗瑞卿、“杨、余、傅”事件等平反。

第三，毛泽东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

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对我们党后来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大国霸权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外交政策，提出划分“三个世界”和“永远不称霸”的正确理论和战略思想，建立和发展了反霸统一战线，作出了中美、中日建交的重大决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始

(一九七六年十月——)

151. 怎样认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两年工作？为什么在党的工作中又出现了“左”的错误？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中，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

首先，在政治思想上，全党和全国人民掀起了一场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群众运动。全国各条战线，根据党中央的部署，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着重揭露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

其次，在组织上，夺回了被“四人帮”篡夺的一部分权力，对党和国家的组织进行了整顿。在揭批查的同时，也开始部分地平反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恢复和安排了一些被迫害的老干部的领导职务。

第三，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推动了国民经济和

科学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从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七年五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抓了农业、工业、煤炭、铁路等各条战线的恢复和整顿工作，使国民经济扭转了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倒退的局面。科学和文化教育战线的同志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的反动谬论，砸碎了束缚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

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却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在党和国家的某些工作中又出现了“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在政治领域里，（一）邓小平等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诬陷打击的革命老干部的工作，迟迟得不到恢复。（二）不仅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工作受到阻挠，而且一九七七年四月在纪念“四五”运动一周年期间，又抓了人，继续制造了新的冤案。（三）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又出现了对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新的个人崇拜。（四）“文化大革命”中广为流传的“左”的理论和口号，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仍然在中央的报告和文件中继续沿用，一些长期以来实行的“左”的政策得不到纠正。

在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左”的冒进错误。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对于动员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不切实际地强调“争时间，抢速度”，提出了要建设一百二十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等等指标。后来又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些”。如果按照这个计划执行，势必造成积累率过高（一九七八年的积累率已达百分之三十六），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再加上不适当地引进外国大型设备，远远超出国民经济的负担能力，这就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潜伏着更大的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左”的错误呢？这一方面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坚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就不能不影响党的整个工作，使过去许多“左”的错误和政策得不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理论得不到清理。在经济工作上出现的求成过急，他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因而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头两年中，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出现了徘徊前进的局面。

152. 怎样评价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一千五百一十人，代表着三千五百多万党员。华国锋主持了这次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

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中央委员会。

大会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揭露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阐述了毛泽东对“四人帮”反党活动的多次严肃批评和警告，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以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化”等反动谬论。叶剑英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在闭幕词中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总之，这次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继续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各项工作。这样，党的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和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153. 为什么说“两个凡是”的方针是错误的？

所谓“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提法最早于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正式提出。

这个方针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幌子，实际上是继续坚持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从思想路线来说，它同“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是一脉相承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

首先，“两个凡是”的方针，背离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对客观事物进行周密的、细致的研究，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两个凡是”的方针不是从实际出发，是从理论原则出发，并把革命导师的语录作为包医百病的药方，因而它是一条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

其次，“两个凡是”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言论（包括他们的一系列著作）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中有些是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科学地揭示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有些是对一些革命工作和运动的总结，以及对某些具体人物和事件的分析 and 论断。在个别情况下，由于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的认识不免也会出现某些偏差甚至失误。因而革命导师从来要求人们对于他们的著作，不要作为教条，而要领会其精神实质，作为行动的指南。“两个凡是”的方针则违背这一要求。他们以引用革命导师的某些语录为满足。认为凡是他们说过的话，甚至某些过了时的具体结论和错误的论断，都必须作为不可移易的绝对真理，一概照办。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必然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再次，“两个凡是”的方针，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恶果。在这一错误方针指导下，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华国锋继续认为“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仍然认为“继续批邓”的口号是完全正确的，拒绝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他就继续坚持了毛泽东在晚年的“左”倾错误，影响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开展，阻碍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事实证明，“两个凡是”的方针，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154.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为了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而开展起来的。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强调指出：“任何思想，任何理论，都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第一，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

长期以来，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极力神化革命领袖，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宗教教义和僵死的教条，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它使人们想问题，办事情，往往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以语录为依据。认为凡是革命领袖说过的话，不管

情况如何，也不管正确与否，必须“句句照办”，似乎这就是“紧跟”、“高举”，否则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通过这场讨论，使大家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它的基本原理，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必须坚持。对它的个别原理和结论，却可以而且应该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改变。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他们有时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也会产生失误。因此，决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决不能提倡盲从，搞“两个凡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和这一革命理论永葆青春。

第二，它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开始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作了理论上的准备。由此，党牢牢地掌握了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主动权。许多过去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被划为禁区的理论观点、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都陆续作了改变，正确地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的重大战略决策，实事求是地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落实了各项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三，它促进了思想解放，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为之一扫，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过去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方针政策得到纠正；过去是正确的却遭到批判的政策重新得到了肯定和恢复；党中央还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大胆地提出了许多新的方针政策。

总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将作为继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又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而载入史册。

155. 为什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它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指出，毛泽东在长期斗争中立下的功勋是不可

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还在黑暗中苦斗。但是，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的崇高任务，就是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第二，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它重申了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特别是在解决了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以后，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生活。长期以来，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由于党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在工作指导上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妨碍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三中全会总结了这个历史教训，正确地指出了阶级斗争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第三，全会规定了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方针，使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会议指出，只有保持社会政治安定，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使国民经济高速度地稳定地发展，否则就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会议要

求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两个文件，要求全党切实把农业抓上去，全面落实党的农业政策，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第四，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会议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澄清了许多被颠倒了的是非，改正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其中包括“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以及平反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系列问题。会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坚持集体领导，少宣传个人，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全会决定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5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

在三中全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导下，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许多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实际生活中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

一、党内外思想解放，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一九七九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讨论了过去被划为禁区的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如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

正确，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建国以来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右还是“左”等，为在理论上拨乱反正，肃清“左”的影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即将结束时，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八〇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任务。同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促进了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发展。

二、提出新的八字方针，认真清理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影响。一九七九年四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党采取措施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工业战线，加快了轻工业的发展，工业内部结构正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恢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财政分级管理等在内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三、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有关政策。一九八〇年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强加给刘少奇的一切错误决议。在此前后，还为遭受冤屈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各族各界的领袖人物恢复了名誉；对一九五七年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了彻底改正工作；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

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上述各项政策的落实，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恢复和提高了党的威望。

四、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设。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举行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县以上人代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以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县级和县级以上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正在普遍实行。恢复、制定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根据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特别检查厅和特别法庭，于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依法进行公开审判。上述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

五、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主要表现在：

（1）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增补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有力地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党的各级组织也都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实行领导人员的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

（2）制定党的法规，成立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后，各级党组织都陆续建立了纪律检查机构，审理了一大批案件，增强了全党遵纪守法的观念。（3）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实行党政分工。一九八〇年八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4）纠正不

正之风。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在中纪委第三次座谈会上，陈云强调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了纠正不正之风，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同时从制度上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等作了规定，取消各种特权。

总之，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蒸蒸日上，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高。

157. 为什么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四人，列席五十三人。这次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这次会议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这是因为：

第一，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可以说，三中全会为六中全会的召开和它的成功准备了条件，六中全会则

是三中全会开始的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继续和发展。

第二，党的六中全会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定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六中全会所总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要点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必须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建设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等等。六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就是在统一全党对建国以来历史问题认识的基础上，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六中全会提出的上述各点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它是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总结，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统一全党思想奠定了基础。

此外，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和增选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

158. 怎样正确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的一生，是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和他在中

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不仅关系到毛泽东个人，而且关系到我们的党、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前途的重大政治问题。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这主要表现在：（一）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并为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作了艰苦的努力。（二）他在中国革命的历次紧急关头，无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关键时刻，还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生死关头，他都是力挽危局，并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三）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步地改变了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四）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五）他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他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为我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总之，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

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做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巨人的伟大功勋，是永垂史册不可磨灭的。

159.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它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毛泽东思想，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等曾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这时我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还缺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自觉性。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他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具体条件，创造了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红色政权理论，并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问题。这时，教条主义倾向在党内盛行。毛泽东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

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第21、24页）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斗争中，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系统地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他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的经验教训，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接着他又写了《实践论》、《矛盾论》批判了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这以后，毛泽东一面领导抗战，一面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先后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的矛盾、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以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问题，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做了全面展开，使毛泽东思想具有了完备的形态，达到了成熟。

毛泽东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了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阐明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战术思想。他所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等等，都在各个不同领域为毛泽东思想增加了充实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他的战友们一道，继续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不断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关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关于从我国国情出发实行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为序以及“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理论，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等等，都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表明，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指针。

160. 毛泽东思想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这个革命完全不同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的，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进而转变为社会主义，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二）中国革命要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来担任。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作为自己最可靠的同盟军，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大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但是，当中国革命主要针对某一个帝国主义时，依附于其他帝国主义的买办集团也可以参加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对于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活

动，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三）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必须走建立农村根据地，在农村中长期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一）根据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多种过渡形式把几亿农民引向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三）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and 政策，提出了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政治上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等。（四）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如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农轻重为序，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企业内部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等。

第三，关于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

（一）毛泽东规定了人民军队必须成为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执行党的纲领、路线的武装集团，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为唯一宗旨，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参加生产三项任务，以及在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

（二）提出了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军队为主体，充分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采取各种斗争形式，共同对敌作战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以及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弱小的红军如何战胜强大的敌人这个最困难的课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三）建国以后，他在新的条件下又提出了许多建设现代化人民军队的重要思想。

第四，关于政策和策略。

（一）论述了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它将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党的存亡。（二）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如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策略；对于被打倒的反动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服法，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了争取同盟者，不仅要领导他们与敌人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而且要给予物质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三）指出在执行政策时，必须时刻牢记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必须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必须善于把政策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

第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

（一）强调只有加强党的政治工作，才能保证红军的战斗力，完成各项革命任务。建国后又提出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二）强调了文化工作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强调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要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繁荣文化艺术的方针。（三）强调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等。

第六，关于党的建设。

（一）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在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艰巨任务。他特别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二）他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把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作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三）创造了整风运动的形式来解决党内矛盾，提出了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四）围绕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要全体党员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等思想。

161.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什么？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学风。（一）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他提倡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求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老老实实的态度。（二）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基础，强调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社会实践是无穷的，人们的认识也是无穷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它只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客观世界充满着矛盾，要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存在的矛盾。不仅要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尤其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第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一）毛泽东强调必须树立坚强的群众观点，坚决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二）他论述了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也就是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

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三）他倡导必须树立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战争的艰苦年代，他要求共产党人同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鱼水相依，血肉相连。建国后，他反复提醒全党，必须警惕由于执政党的地位，而可能产生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要求全体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作人民的公仆，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虚心向群众学习，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第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必须把方针建立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条件的基础上。

（一）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革命事业搞好。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党坚信人民群众具有无穷智慧和力量的表现，是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强决心的体现。正是由于坚持这一方针，中国人民才创造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我们需要争取外援，特别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但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点。对待任何大国、强国、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

心和自信心，决不容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是互相联系的。实事求是，是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而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现，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事求是是最基本的，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共同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如何在中国条件下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

162. 为什么不能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中？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这就是说，不能把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中。为什么呢？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而逐步形成的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它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因而能够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例如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在“四清”运动中提出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的观点，以及在“文化大革命”被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

论”等，既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实际，并不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不是科学的指导思想，当然不能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中。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我们党的行动指南，就在于它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的，又经过长期革命实践反复检验了的客观真理。它既总结了中国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挫折和失败的教训，是对我们党长期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例如，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等。历史经验已反复证明，遵循它，革命就能胜利；违背它，革命就要失败。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科学的抽象，不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客观规律的反映。它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不幸的后果，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因而不能成为党的科学指导思想，不能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中。

第三，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的区别开来，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理解为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错误理论的凑合，那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这就可能或者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毛泽东思想中包含错误的东西，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定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否定毛泽东思想是我党的行动指南，抛弃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的十分宝贵的科学成果；或者由于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一切照抄照搬，仍然坚持毛泽东

晚年错误的东西。这些，都只能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危害。

163.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长期以来，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国家的主人。也正是有了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同广大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必然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这不仅会断送中国革命的成果，而且也失去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条件。

第二，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指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我们所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批评和克服一切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这只有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做到。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为了实现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但是，它不能脱离实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孤立地进行。高度的社会主

义民主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是我们重要的奋斗目标，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同时，我们是在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这就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十分明显，如果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能够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修正错误，实现正确的领导。我们已经有了三十多年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过严重的失误。但是，我们党是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掌握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有勇气、有能力依靠党和群众的亲密合作，认识和纠正前进中的缺点和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就使我们党提高了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任何因为党曾经犯过错误而企图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相信，只要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就一定能够实现。

164. 为什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必然取得胜利，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曾经领导过多次革命运动。他们企图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解救苦难的中华民族的出路，但是都一一失败了。这不仅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而且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决定了企图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是一种幻想。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锐利武器，才提出了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继而转入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英勇奋斗，终于把这个伟大的理想变为现实。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和中国近百年来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而得出的结论。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人民建国以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之一。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全面建立起来。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仅成为国家的主人，实现了广泛的人民民主，而且还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劳动人民摆脱了剥削，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人和人之间建立了平等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全国人民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我们实行了计划经济，保证国民经济能够高速度地发展。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曾经出现过曲折，包括曾经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

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但是，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战胜困难，这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因此，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全国人民从建国三十几年来的实践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第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我国人民摆脱贫困落后状况的根本途径。但是，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不是任何其他的现代化，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为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不仅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而且它只能是少数剥削者的天堂，而广大劳动人民必将再次陷入被剥削被压迫的贫困境地，我国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牺牲而取得的革命成果必将丧失，这当然是全国人民所不能允许的。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保证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真正改变我国贫困落后的面貌，才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165. 既然剥削阶级在我国已经消灭，为什么还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由于阶级斗争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反抗和破坏需要镇压；虽然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和平斗争的形式进行的，但它仍然是一场激烈的

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是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在目前，尽管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仍然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因为：

第一，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是因为历史上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各方面的遗毒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干净；我国经济和文化还比较落后，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不可能完全防止某些社会成员和某些党员发生腐化变质的现象，不可能杜绝极少数剥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产生。因此，对极少数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必须实行有效的专政，才能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担负着组织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能。人民民主专政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坚持集中统一领导，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高速度的向前发展，才可以大规模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对广大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逐步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提高共产主义觉悟，以便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和精神的条件。特别是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一职能将显得更加重要。可以说，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第三，人民民主专政还担负着保卫社会主义，反对外部敌人侵略的重要任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国际存在

阶级斗争的环境下进行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侵略活动，威胁我国的安全。它们经常派遣特务，收买民族败类，进行情报和捣乱活动，并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腐蚀人心，败坏风气。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国防力量，随时歼灭来犯之敌，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独立和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还要积极开展各种外交活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积极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以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总之，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的情况下，夸大阶级斗争，混淆两类矛盾，滥用专政，是不对的。但是忽视阶级斗争，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可以削弱，也是错误的。

166.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是因为：

第一，在我国剥削阶级虽然已经消灭，但是还有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分子，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新剥削分子以及继续进行破坏的旧剥削分子。这些敌对分子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活

动。同时，在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仍然存在。这些地方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也会利用交往的扩大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广大人民同这些敌对分子之间的斗争，仍然是一种阶级斗争。

第二，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并没有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而完全清除。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思想及其影响还会长期存在。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方的剥削阶级，外国的剥削阶级，还经常通过各种渠道，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有些人就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腐蚀下，利用我国管理制度上的缺陷和薄弱环节，进行经济犯罪，堕落为新剥削分子的。

第三，国际阶级斗争的影响。我国现在还处于国际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同我们进行公开的或隐蔽的斗争。一些国家虽然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这些国家统治阶级中敌视我国的反动分子和集团，不断利用派遣间谍，培植和收买代理人等方式进行破坏。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国内的阶级斗争。

由上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同剥削阶级消灭之前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阶级斗争的对象来看，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前，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同整个剥削阶级的斗争。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则表现为同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的斗争。这些敌对分子已经失去了过去剥削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阶级，因而这是一种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从总的趋势来看，这些敌对分子的数量将逐渐削减。但是，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社会主义社会

的阶级斗争也不会在短期内消灭，必须作好长期斗争的精神准备。

第二，从阶级斗争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即在我国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它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是，这种阶级斗争还将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表现出来，因而必须在社会各个领域加强对敌对分子的防范和斗争。

第三，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来看，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公开的完整的剥削阶级，这些敌对分子不仅来源于旧的剥削分子，而且还大量来源于其他社会成员。他们往往又以各种假象伪装自己，活动十分隐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去观察各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现象，同各种敌对分子进行斗争。

第四，从处理的方法来看，由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因而不需要也不应当象过去那样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制的作用，通过司法程序加以解决。

167. 我党提出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及其重要意义是什么？

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是我党一贯采取的方针，并为实现这一目的做出了长期的努力。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叶剑英同志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重要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一) 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二) 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三) 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四) 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五) 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六) 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七) 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八) 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九) 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我党提出的上述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表达了祖国大陆各族人民的迫切要求，也反映了台湾各族人民、海外侨胞的迫切愿望。实现和平统一，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力量汇合一起，振兴中华，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统一，才能使祖国富强；分裂，只能带来痛苦；和平解决，对彼此都有好处。因而我

党提出的九条，得到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广大海外侨胞的热烈拥护。

第二，它表明我党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坚定的决心和具体方法上的灵活性。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应当力争和平统一，这是我党一贯的立场。在实现统一的步骤和方法上，我党又充分尊重台湾的现实，考虑台湾当局的处境以及台湾各界人士的利益，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这充分表明我党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是从实际出发的，提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愿望是真诚的，办法是切实可行的，因而为祖国和平统一铺平了道路。

168. 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总任务是什么？怎样完整地理解它的基本内容？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六百名，代表三千九百万党员。胡耀邦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通过对过去六年历史性胜利的总结，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总结，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方针任务。这次代表大会是党的七大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怎样理解它的基本内容呢？

第一，新时期的总任务是我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坚定不移的总路线。

首先，这条总路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深刻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由于我国的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坚定不移地实行战略转移，因而在政治上造成了严重恶果，在经济建设上也失去了许多宝贵时间。沉痛的教训使全党认识到，今后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我们再不能离开这个重点了。十二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的。

其次，十二大提出了今后二十年内把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任务。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目标和奋斗纲领。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但是，到那时，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还是比较低的，同先进国家比较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将成为我党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纲领。

第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时期总任务的核心，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是总的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的历史时期总任务中，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因为不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缺乏赖以巩固的强大物质基础，人民的生活就不能较快地得到提高，就没有强大的国防保卫祖国的安全，也就没有条件迅速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等事

业，人们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和共产主义风尚的发扬，也要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决不仅仅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还要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重要的任务。因为物质文明固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对物质文明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还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二者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保证和重要条件。只有切实保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力，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才能对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高度民主，同样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没有高度的民主，也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实现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本方针。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基本方针。因为中国的事情要依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只有坚持这一方针，才能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当然不能搞闭关自守，要学习外国的一切有用的东西，加强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但是必须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自己

的立足点，在对外交往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一切腐朽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时期总任务的顺利实现。

169. 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什么说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战略方针问题？

精神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指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改造自然界中所取得的物质成果，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是指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在社会的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教育、科学和文化知识，一是指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纪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核心是共产主义思想。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需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为什么呢？

第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以及与此经济、政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的。同样，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也是通过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反映社会主义性质和特征的，不能只归结为经济制度（当然这是主要的），还有政治制度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

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实行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而且还表现在精神文明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但是，由于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理想和道德标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各种美德，如热爱劳动、助人为乐、公而忘私、为人民英勇献身、遵守纪律等，逐步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表现出来。这种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同样是任何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所不可比拟的。如果在社会主义特征问题上陷入片面性，就会使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遭受损失。

第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并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密不可分，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不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有较大的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觉悟的提高，都会受到影响。但是，精神文明又对物质文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反作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完善和发展，按劳分配的正确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都离不开马列主义的指导，离不开共产主义思想的保证。由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会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自发的发展，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存在，如果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的追求，人们就会因失去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抵抗力而走向邪路，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来看，在革命战争

年代，尽管当时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广大党员和革命战士，具有崇高的理想、高度的觉悟和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革命同志间建立了崭新的关系，人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因而使整个革命队伍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献身精神，从一个重要方面保证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在我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党大力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发扬革命的传统作风，不断洗刷旧社会的思想影响，不仅使全国人民感受到新中国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而且也受到世界进步人士的景仰。而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遭到极大摧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不仅使物质文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在党风、社会风尚方面所遭到的巨大破坏，更是人所共知的。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我党在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要彻底医治“文化大革命”在精神文明方面所造成的创伤，仍然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蒸蒸日上，否则，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要受到影响。

170. 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为什么说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就是全体人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利。具体说，就是全体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织人民的政府，管理国家的各项

事务；享有言论、出版、通信、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利，监督国家工作人员；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自由权利、人身安全等受到法律保护。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所谓民主，只不过是少数剥削分子的民主，广大人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的新型民主，它是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当前，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更好地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逐步把人民民主权利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党和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为什么呢？

第一，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坚定不移的政治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确保和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使人民充分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对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监督，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利益、意志和愿望。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标志和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破坏，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损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政权的根本性质来说，我国人民民主，是任何资本主义民主所不可比拟的。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国家，缺乏民主传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又忽视了民主制度的建设，因而我国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还不够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搞封建法西斯

斯专政，使我国不够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又遭到空前破坏。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我们在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今后，只有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更加充分地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证。

当前，我们面临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步伐。而人民群众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赖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因为只有发扬民主，才能使人民增强主人翁责任感，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主动地创造性地完成各项任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在高度集中指导下进行的。而社会主义事业越是高度集中，也就越需要高度的人民民主。因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使领导机关了解下情，制定出合乎实际的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有计划地向前发展。

第三，只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已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充分发挥国家的专政职能作用，仍然是今后一项长期的任务。为了有效地打击阶级敌人，必须实行专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没有专政机关的工作，固然不能打击敌人；而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

支持，专政的职能作用也不易有效地发挥。为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有赖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发展。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防止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以能篡夺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猖狂一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不完备，存在缺陷和漏洞。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重演，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设更加完备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编 后 记

本书是为了适应广大干部和青年朋友学习中共党史的需要而编写的。它对于大专院校学生学习中共党史、研究生考试，也是一本参考读物。本书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线索，采取问答的形式，对于学习中共党史时应当了解和掌握的主要问题，一一作了解释，并对其中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全书分八个时期，一百七十个问题，各个问题基本是按照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顺序排列的。

在编写本书时，我们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文件的精神，以及《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为依据，参照了教育部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在我们编写过程中，还参考和吸收了有关高等院校和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

本书是集体编写的。由王照琨主编。参加编写的有：黄昌西、刘铮然、武桂兰、张琇、索普一、关英民、霍烽、陈景福。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马云同志的帮助。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本书难免有不当之处，恳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一九八三年六月